

目 录

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专辑

乌克兰问题

- 3 葛汉文 / 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
23 杨恕 朱倍德 / 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42 赵永华 刘佳莹 / 政治新闻架构中的画框隐喻——基于《纽约时报》对乌克兰“橙色革命”报道的框架分析

大国地区外交

- 61 梁强 /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1940-1945）
87 孙德刚 / 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
120 曾向红 / 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
164 徐刚 / 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谈判：背景、进程与展望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3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Гэ Ханьвэнь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Украины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3)

Ян Шу, Чжу Бэйдэ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23)

Чжао Юнхуа, Лю Цзяин

Метафора кадра в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овостей--На основе анализа архитектуры сообщения «Нью-Йорк таймс» об «оранже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Украине.....(42)

Лян Цян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опрос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61)

Сунь Дэган

Анализ мотивации развёртывания военных баз СССР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87)

Цэн Сянхун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и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20)

Сюй Ган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ербией и Косово: Фон, процесс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164)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Ge Hanwe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Cold War Ukraine (3)

Yang Shu, Zhu Beide

Histor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 Russia-Ukrain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ost-Soviet Era..... (23)

Zhao Yonghua, Liu Jiaying

Framework Metaphor und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News: Framework Analysis based on Reports of New York Times regarding Ukraine “Orange Revolution” (42)

Liang Qia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ransylvania Issue in the WWII: from 1940 till 1945 (61)

Sun Degang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 (Russian)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in Syria... (87)

Zeng Xianghong

Con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Shaping: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U.S. Central Asian policies..... (120)

Xu Gang

Background, Evolution and Prospects: Negotiations between Serbia and Kosovo.....(164)

乌克兰问题

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

葛汉文**

【内容提要】冷战后的乌克兰地缘政治研究，着力论说冷战后乌国内地缘政治的形态与特征。乌国内各地区在历史记忆、社会心理上的巨大裂痕是其研究的重点，但在如何弥合国内各地区族群在政治认同方面的分裂现状问题上，却较少提出较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主张。在对外地缘战略取向上，乌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根据其不同的思想立场，分别得出了倾向各异的政策谋划，对冷战后的乌对外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 地缘政治思想 乌克兰 冷战后 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 D73/77(511.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3)05-0003-(20)

从字面上理解，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①。这一名称形象地反映出乌克兰民族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诸多苦难。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领土处于分裂状态，分别为不同的帝国所占据。在政治形态上则表现为是这个或那个帝国的边陲地带：17至18世纪，乌克兰处于俄罗斯帝国、波兰—立陶宛邦联（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19世纪时，沙俄帝国和奥匈帝国占据着乌克兰的领土；尽管在

*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后世界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其国际政治意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2CGJ022）的阶段性成果。

** 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Stephen Rudnitsky,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Its Geography*, New York: Rand McNally, 1918, p.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暂时期里，乌克兰处于原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领土赢得了一小段时间的独立，但稍后不久即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加入了苏联，而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领土则被归并于新独立不久的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乌克兰领土的回归，作为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至少在名义上实现了领土的统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以 1991 年宣布独立为标志，乌克兰领土部分或全部隶属于异族统治的历史终于宣告结束。

作为一个虽具久远民族文化遗产，但在历史上却几乎从未真正独立过的国家，刚刚独立的乌克兰在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实践方面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与冷战后部分学者对乌克兰地缘政治作用的极高期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独立以来的 20 余年时间里，乌克兰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国内外问题丝毫未见缓解的迹象：政治争斗不休，经济发展乏力，社会转型进程艰难，地区离心倾向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乌克兰不得不在外部大国的压力下左右徘徊，在一些事关本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进退失据。面对这一异常困难的国内外局势，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很多乌克兰学者在回顾乌克兰民族发展历程、反思乌克兰民族文化传统、审视乌克兰地缘政治形态的基础上，开始重塑乌克兰民众对于自身及所处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他们希望以此作为乌克兰国内治理与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从而为乌克兰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襄助。这些学者的探索与思考，反映出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国内社会意识的巨大转型，同时也反映出乌克兰民众在认识判断自身政治—文化—地理身份上的深刻分歧，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地缘政治话语模式，对当今乌克兰内外政策发挥着日渐显著的影响。

一、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思想渊源

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部分乌克兰学者的相关论述。在致力于唤醒乌克兰民族精神、争取乌克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乌克兰实现民族独立的短暂时期里，以米哈伊洛·赫鲁什维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斯捷潘·鲁德涅斯基（Stepan Rudnitsky）、尤里·利帕（Yuri Lypa）和米哈伊洛·德拉

霍曼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等人为代表，部分乌克兰学者企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发掘乌克兰精神与其领土空间的紧密联系，分析和反思长期被异族（特别是俄罗斯帝国）统治的根源，从而为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国家构建以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战略指导。

这部分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证乌克兰实现民族独立的正当性和可能性。乌克兰近现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赫鲁什维斯基早就主张，乌克兰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早自它与邻近的摩尔多瓦、匈牙利、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民族相分离时，就已经在黑海北部广阔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定居，这里周边被黑海、喀尔巴阡山脉、高加索山脉南部、波兰的沼泽和森林地带所环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单独成片且具有独立内聚力的地理区域，构成了乌克兰人世代繁衍的民族家园。^①历史学家米哈伊洛·德拉霍曼诺夫和尤里·利帕也认为，与历史上曾先后统治乌克兰的波兰和俄罗斯帝国相比，乌克兰民族家园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黑海在物质和精神上通过自北向南的自然水系将乌克兰的领土连接了起来。它连同流向黑海的诸多河流是乌克兰民族古老的、便捷的高速公路，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的中枢神经’”。正是借助这个巨大水系所构成的网络，“乌克兰最终形成了一个单一习俗、语言和宗教的领土”。与之相比，波兰与俄罗斯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属性：“波兰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而非黑海国家；莫斯科大公国也主要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和里海国家，只是莫斯科大公国沿顿河方向的扩张使它最终来到了黑海”。^②从这个角度说，尽管乌克兰民族在很长的时期内均处于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统治之下，但乌克兰与后两者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属性，为其争取独立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自然与历史证据。

在充分肯定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的基础上，这些学者也明确意识到乌在自然地理上存在的巨大缺陷。乌克兰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鲁德涅斯基不无遗憾地看到，与其他许多早已独立的民族和国家相比，乌克兰在北部、

① Oleksandr Saltovsk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Oleksandr Derhachov, ed., *Ukrainian Statehoo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Kyiv: Political Thought, 1996, p.83.

② Ibid, p.84.

东南部和东部均没有可靠的自然边界：除了其南部濒临的黑海及其向西一度曾经达到的喀尔巴阡山脉之外，乌克兰领土周边明显缺少一些由高山或河流构成的自然疆界。正是由于缺乏地理屏障的保护，导致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政治边界一直不稳定，其领土也并不完整”。这正是乌民族在历史上极难保持民族的自由独立、相反却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的重要原因。^①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期时，乌克兰著名诗人叶甫根尼·格瑞比昂卡（Yevhen Hrebinka）就曾特别鲜明地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如果有人能够围绕乌克兰设下由海洋和高山组成的封锁线的话，乌克兰就可能赢得独立；但现在她就像一棵路边的柳树，不断地被所有经过的人所践踏。”^②

这些学者特别重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地缘政治形态的塑造与影响。尤里·利帕就指出，由于乌克兰相对不利的地理条件，自中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便逐步占据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但俄罗斯帝国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它一直在乌克兰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推行的严厉的同化政策，使其从来未能真正拥有乌克兰。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俄罗斯人不是主要种族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中亚等），而且甚至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些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俄罗斯近代以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俄帝国的中央权威与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之间越来越残酷的斗争的过程”。但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俄罗斯庞大的幅员早已证明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实践上的无效，但这个持续不断的斗争却一直未曾中断，并且每次都付出越来越多生命为代价。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俄罗斯工业中心和通讯线路的地理特点、加上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治理不善，使得俄帝国分崩离析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分裂已经是俄罗斯帝国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只是一个何时和怎样发生、以多少生命为代价的问题”。^③

这些学者同时警告，永远不要低估俄罗斯在乌克兰维持统治的决心，也

① Stephen Rudnitsky,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Its Geography*, p.220.

② Oleksandr Saltovski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4.

③ Ibid, p.88.

不要低估乌克兰从俄罗斯统治下赢得和维持独立或自治的巨大难度。鲁德涅斯基就指出，那种指望俄罗斯实现了民主化后便会赞同乌克兰独立的想法无疑是极端幼稚的：“鉴于乌克兰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即使是一个已经实现了革新和民主的俄罗斯，它也必将继续推行沙皇俄国在乌克兰的压迫和同化政策，这就是乌克兰人民必须尽最大努力永远不要再次落入莫斯科奴役的原因。”^①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学者大多将乌克兰摆脱俄帝国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放在不得不争取来自外国的可能的帮助上。为此，他们特别注意探讨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在乌克兰民族精神塑造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他们看来，主要由于乌克兰在东西方贸易中关键的地理位置，乌克兰民族精神与外来文化一向有着紧密的关系：希腊文化、拜占庭文化、特别是中世纪晚期以后的西欧文化，都对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②尽管第聂伯河东岸乌克兰与俄罗斯于 1654 年的合并严重损害了乌克兰与西欧的传统关系，但西方文化对乌克兰在思想和宗教上的影响却从未中断：“乌克兰民族、乌克兰人民的精神，依然向往着西方”^③。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中，乌克兰人民、特别是第聂伯河西岸人民与西方文化的紧密关系，将有望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乌克兰摆脱“野蛮文明”数百年的统治和压迫提供帮助。而如果乌克兰能够充满技巧地推动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独立的话，乌克兰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得益的可能性极大。

这些学者深为感慨地指出，国际关系的逻辑早已证明了地理状况对于一个国家历史命运的重大影响。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和前途也注定要由乌克兰人聚居区域的地理人文性质所决定。但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乌克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以及在 20 世纪初乌克兰取得民族独立的短暂时期里，“乌克兰的政治家不仅没能很好地理解乌克兰领土的位置、形态及其作用，甚至

① Oleksandr Saltovsk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9.

② Stephen Rudnitsky,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Its Geography*, p.14.

③ Oleksandr Saltovsk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91.

也没有一种对乌克兰领土自然地理状态的确切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利用乌克兰在欧洲东南部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地位为乌克兰服务。”^①在他们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乌克兰政治家们对于乌克兰地理形态认识的严重不足，已经对乌克兰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构成了致命的损害，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数度证实。

二、分裂国家的地缘政治

以1991年8月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言、正式脱离苏联为标志，乌克兰结束了337年和俄罗斯结盟、并事实上接受后者统治的历史，首度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在此情势下，如何巩固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进而寻求未来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乌克兰学者和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对乌克兰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及其与乌克兰当前领土边界现状的关系的研究，也因此而成为乌克兰当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②

面对独立之初乌克兰国内普遍洋溢着的乐观氛围，乌克兰当代学者列昂尼德·什克利亚尔（Leonid Shklyar）冷静地评论道：虽然乌克兰在20世纪临近结束之时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但由于乌克兰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缺乏较为成熟的独立民族观念，乌克兰民众和政治精英对于乌克兰民族世代生存繁衍的土地家园及其地缘政治意义显然都不甚了解，对于乌克兰领土构成和政治—文化—地理状态同样知之不详。^③学者伊戈尔·赫列斯廷（Igor Khrestin）也同样认为，尽管自19世纪末期以来，以赫鲁什维斯基为代表的部分乌克兰学者就致力于鼓吹传播乌克兰民族与其历史家园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长期以来乌克兰民众对于自身民族发展的认识依然极为欠缺，

① Oleksandr Saltovski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3.

② John O’Loughlin, “Geopolitical Visions of Central Europe”, in M. Pagnini, V. Kolossov and M. Antonsich, eds.,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Vol. II*, Rome: Societa Geografica Italiana, 2001, p.608.

③ Leonid Shklyar, “The Ethnopolitical Dimension of Statehood”, in Oleksandr Derhachov, ed., *Ukrainian Statehoo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p.343.

对于自己的领土边界也缺乏明确的概念。^①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当今乌克兰很大一部分民众和族群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缺乏清楚认识,妨碍了在其领土边界范围内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政治认同^②,对乌克兰国家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这些学者格外担忧地看到,乌克兰在实现独立之后,其所继承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地理—文化实体,而仅是一幅由乌克兰人、俄罗斯裔、犹太人、白俄罗斯裔、波兰裔、鞑靼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裔定居地拼接而成的五彩斑斓的地图。他们不无沮丧地发现,在独立以来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乌国内各族群聚集地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上存在的巨大裂痕并没有消融的迹象,反而益发扩大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乌克兰独立17年后的2008年,仍有12.5%的乌克兰公民并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同时有31.5%的人并不以自己的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③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面对这一局面,乌学者维克托·斯捷潘尼科(Victor Stepanenko)指出,尽管在1991年的全民公决中有超过90%的乌克兰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但现在看来,这一结果的出现显然更多的是出自社会和经济考虑,而不是争取乌克兰民族独立观念的胜利。^④

部分乌克兰学者指出,独立后的乌克兰之所以没有能够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根源在于不同地区的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分歧。乌学者维亚切斯拉夫·尼库林(Vyacheslav Nikulin)借助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尼库林指出,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断层线一直贯穿着乌克兰领土,独立后的乌

① Igor Khrestin, "Constructing a Common Ukrainian Ident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Vol.7, No.1, 2002, p.57.

② 关于乌克兰的民族认同问题,可参见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人文透视——读《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有感”,《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20页。

③ Gorshenin Institute, *Annual 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Program: Ukrainian Statehood*, Kyiv: Gorshenin Institute, 2009, pp.2-3.

④ Igor Khrestin, "Constructing a Common Ukrainian Ident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p.57-58.

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①在历史上，乌克兰西部几度归属波兰—立陶宛或奥匈帝国，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西乌克兰人是东仪天主教信徒，讲乌克兰语，具有较强烈的乌克兰民族观念。而东乌克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讲俄语，格外关注与俄罗斯在历史、种族和文化上的传统联系。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地区，该地区直到 1954 年前仍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只是在 1954 年为庆祝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 300 周年，赫鲁晓夫才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的。出于不同的历史记忆和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地区的乌克兰人在认识判断“自我—他者”、“敌人—伙伴”时往往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在那些生活在克里米亚和东部俄语区的乌克兰人看来，“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兄弟，两者属于共同的家庭”。但那些生活在乌克兰西部，在历史上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着密切联系的乌克兰人，却视自己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原本就属于欧洲”^②。

在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看来，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独立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民众在政治—地理—文化身份上的观念冲突仍在继续，甚至不断激化。乌学者在这方面的忧虑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东西地区在历史、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直以政治斗争的形式集中显现，乌国内各地区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分界线大致上与政治上的分界线相重合。早在 1994 年的总统选举中，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获得了西部 13 个州的多数选票，而其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则在东部各州获得了支持。在 2010 年的选举当中，乌克兰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橙色革命的主要领导者、著名亲西方政治家尤莉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而东部选民则支持来自东部顿涅茨克州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而上述这些政治人物在国内治理、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也基本反映出乌克兰东西部地区民众在上述问题上政策态度的尖锐对立和互不妥协。正是在这种政治对

① Vyacheslav Nikulin and Nataliya Selyutina, “Geo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Ukrainian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Electoral Campaign of 2006”,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8, No.4, 2007, p.544.

② Olesia Oleshko, “In Search of Ukraine’s Identity”, *The New Presence*, Vol.12, No.3, 2009, p.30.

立长期未有丝毫缓解、地区离心倾向显著增强的局面下，很多乌克兰民众开始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也在暗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赢得独立仅仅 20 年的乌克兰，“很快就会分裂为两个国家”^①。

出于以上原因，在独立后的乌克兰，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过程仍远远未能完成，如何融合乌克兰国内各族群及其聚居地之间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深刻裂痕，构筑一个具有足够包容性、兼顾国内各族群历史文化考量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依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都对该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相关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得出了一些较具解释力的结论，但总体上，他们论说的描述性内容多于规范性概念，其中的悲观论调也远远多过提出一些较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意义的政策主张。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精神格调和政策主张的实用性上，冷战后乌克兰学者对于乌国内地缘政治的考察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那些着力争取民族解放、鼓吹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学者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三、融入欧洲：指向西方的地缘政治选择

乌克兰国内地缘政治在地区规模上的严重分裂，直接影响到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想象在乌国内社会的形成。其结果使得不同地区的乌克兰民众、政治家和学者在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对乌克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也成为乌对外政策长期以来在不同的战略方向上摇摆不定的要因。这一点，诚如当代地缘政治学者保罗·丹尼拉（Paul D’Anieri）所言，“乌克兰的国家认同依然没有塑造成形，分歧严重，而对外政策就是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领域”^②。

① George Friedman, “Geopolitical Journey: Ukraine”,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01129_geopolitical_journey_part_6_ukraine

② Eric A. Miller, “The Changing Face of Eurasia: Russian and Ukrain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2, No.4, 2003, p.382.

对于乌克兰中西部民众和学者而言，他们对于加入欧盟进而融入欧洲的热情是毋庸置疑的。早在 1993 年，便有学者在首都基辅著名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都是欧洲人》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con）的话：“从历史上看，16、17 世纪时存在三个欧洲：第一个是较为富裕的欧洲，它从马德里经伦敦、巴黎、罗马、柏林延伸到维也纳；第二个是较为贫困的欧洲，它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瑞典和匈牙利也是这个欧洲的一部分；第三个欧洲是俄罗斯帝国，它更为贫困，在地理上更为偏僻，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则更为野蛮。”^①此文章发表后，其极强的话语影响力立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很多乌克兰民众都将此作为乌克兰属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历史证据。

冷战后很多乌克兰学者还着力探寻乌在历史上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波兰的紧密联系，借此强调乌克兰具有欧洲属性。赫鲁什维斯基早就指出，西欧文化对乌克兰所发挥的巨大影响，“最早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Kingdom of Galicia Volhynia）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并在波兰统治乌克兰的时期里得到了加强。……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经由波兰对乌克兰的统治，深刻地渗入到了乌克兰的民族精神当中”。^②与赫鲁什维斯基的观点一脉相承，很多当代乌克兰学者都将波兰—立陶宛邦联统治乌克兰的历史，视为波兰等欧洲国家的文化对乌克兰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打上深刻烙印的过程，认为早自那个时候开始，“乌克兰归属欧洲的观念就被一代又一代乌克兰人传承和牢记”。^③这部分学者还特别强调乌克兰在地理上具有的无可辩驳的欧洲特性。他们频繁引用 1911 年维也纳地理学会关于欧洲地理中心的有关决议，该决议确认欧洲的中心位于西乌克兰境内。这些学者争论道，既然土耳其、摩洛哥等在地理上明显不属于欧洲的国家都在力争加入欧盟，在地理归属上毫无任何争议的乌克兰，重回“欧洲

① John O'Loughlin, "Geopolitical Visions of Central Europe", in M. Pagnini, V. Kolossov and M. Antonsich, eds.,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Vol. II, p.608.

② Oleksandr Saltovski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6.

③ Olesia Oleszko, "In Search of Ukraine's Identity", *The New Presence*, p.30.

大家庭”就更具有不容置疑的现实理由。^①

部分归因于上述思想的推动，独立后的乌克兰积极谋求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并将寻求加入欧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1994年，乌克兰成为第一个与欧盟签署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独联体成员国。两年后，时任总统库奇马即宣布，将加入欧盟、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作为乌克兰的“既定选择和战略目标”^②。1998年，乌正式提出《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战略》，提出在法律、经济、国家安全、政治民主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主要得到一些欧盟新成员国，如波兰、立陶宛和捷克这些在历史上与乌克兰有着广泛联系的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在2004年橙色革命后上台的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总统的全力推动下，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明显加快：乌与欧盟签订了“欧盟—乌克兰行动计划”，希望尽快满足欧盟提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争取在2008年前加入欧盟。2010年，普遍被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就职不到一周，就访问了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表示欧洲依然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方向，乌克兰将继续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以期达到欧盟的标准。经大力推动，2011年乌克兰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入盟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与早期主要受到中西部地区民众大力支持不同，加入欧盟现已得到乌克兰多数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赞同，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已经成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尽管如此，乌克兰在国内政治民主化程度、国内社会转型进程、经济市场化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人权保障程度等方面仍饱受欧盟各国指责，乌克兰似乎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欧盟提出的近乎苛刻的政治经济改革标准，乌入盟进程也因此而屡受挫折。特别是近年来，围绕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和前总理季莫申科被控告及最后被判入狱一事，严重恶化了乌克兰与欧盟各成员国（如德国、捷克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借此抵制出席在基辅举行的2012年欧洲杯决赛及最后的闭幕式。在乌国内普遍的失望氛围中，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回应说，“这些举动把我们从欧洲推开。……如果欧洲不把我们视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就在乌克兰重建一个欧

^① Kataryna Wolczuk, “Integration without Europeanization: Ukraine and its Policy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No. 2004/15, p.6.

^② Ibid.

洲。”^①

与此同时，乌克兰长期以来力争尽快加入欧盟的政策，在乌国内也并非毫无争议。200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39.7%的乌克兰民众支持立即加入欧盟，而反对者占22.5%，另有38%的人没有明确态度。^②特别是，在那些居住在乌克兰东部的不少民众和部分政治精英看来，那种要求加速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尽快满足欧盟标准从而加入欧盟的政策，完全是西方诡计的产物。从宏观上讲，此举的目的在于通过将乌克兰推向西方国家，彻底割断乌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使两个兄弟民族相互对立敌视；从微观上讲，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自由市场旗号下，利用比较优势扼杀乌克兰东部重工业，彻底解除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对西方强国的潜在威胁，从而将乌克兰完全纳入其主导之下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骗局。一些更为激进的民众，甚至将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建国都视为西方邪恶阴谋的一部分，是“加利西亚分离主义阴谋”的当代延续。^③

在对待另一大西方国际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上，大多数乌克兰学者和政治家更是持谨慎立场。尽管近年来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有所发展，北约—乌克兰协商委员会得以成立，乌克兰也已成为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国，但甚至是那些对俄罗斯怀有最大敌意的政治家和学者，都认识到将乌克兰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北约身上是不大现实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乌克兰争取民族解放之时，乌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Vyacheslav Lypynsky）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乌广袤的领土、不小的人口基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工业潜力，乌克兰在欧洲东南部具有无与伦比的、足以颠覆欧洲权势平衡的战略价值，因此“在欧洲没有人想要一个强大的乌克兰国家。相反，许多欧洲强国实际上是对一个没有、或者是尽可能弱小的乌克兰的欧洲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恢复民族传统、实现独立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接受外来帮助上的原因。……外

① “A Threatened Boycott of Euro 2012 Matches puts Ukraine’s President in a Foul Mood”, *Times*, June 25, 2012, p.12.

② Gorshenin Institute, *Project “Ukrainian Statehood”: Annual 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Program*, Kiev: Gorshenin Institute, 2008, pp.11-12.

③ Olexiy Hara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rospects for Ukrainian Foreign Policy Choic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1, No.4, 1998, p.6.

部强国充其量只会帮助乌克兰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①

出于同样的思路，尽管北约被普遍视为一个具有庞大军事力量 and 在欧洲有强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但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对加入北约是否能够维护乌克兰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对此举必将引发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表示担忧。与此同时，他们对北约在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时的表现也表示忧虑，唯恐成为北约成员国后会招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例如，来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乌社会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莫罗兹（Alexander Moroz）就指出，乌克兰不应加入任何军事同盟，而北约东扩也完全是个错误。在新的安全挑战面前，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结构以确保欧洲的安全。而另一些激进的学者更认为，北约是一个强有力的、野心勃勃的政治集团，是一个反俄的军事联盟，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如本国国防工业面临垮台、国防费用陡然剧增、先进国防技术和技术人员大量流失以及军工贸易严重损失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会进一步增加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并对乌俄关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②相关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有 43.6% 的乌克兰民众认为乌不应加入北约，赞同者仅为 19.2%，另 38% 的人没有明确态度。^③在此问题上，乌国内地区差异同样有所体现，克里米亚等东乌克兰地区的被调查者大多将北约视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武装军事集团”；而过半数的中西部乌克兰被调查者一般都对北约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将其视为一个具有防御性质的西方国家联盟体系，而加入北约还可能意味着对乌融入欧洲政策有所助益。^④

① Oleksandr Saltovsk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90-91.

② Vyacheslav Nikulin and Nataliya Selyutina, “Geo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Ukrainian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Electoral Campaign of 2006”,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pp.553-554.

③ Gorshenin Institute, *Annual 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Program “Ukrainian Statehood,”* pp.11-12.

④ Oleksandr Potekhin, “The NATO-Ukraine Partnership: Problems, Achie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in Kurt R. Spillmann, Andreas Wenger and Derek Müller, ed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158.

四、俄罗斯：地缘政治机遇还是地缘政治难题？

作为乌克兰民族发展历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俄罗斯在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话语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与俄罗斯结盟、并在事实上接受后者统治的历史之后，对乌俄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描述或预测，是冷战后乌克兰学者特别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

在当今乌克兰，即使是最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并不否认乌克兰维持与俄罗斯联邦关系的必要性。冷战结束至今，绝大多数乌学者存在着这样的共识，即：乌克兰在经济发展上不能失去俄罗斯的帮助，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它不能不高度依赖俄罗斯。^①这些学者还警告说，与俄罗斯反目成仇，极有可能造成俄罗斯族占多数的乌东部和南部地区从乌克兰国家分裂出去。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乌著名的民族主义组织“讲乌克兰语者联盟”的领导人沃洛德米尔·比利斯科伊（Volodymyr Biletskiy）1996年在乌克兰东部最主要的俄罗斯族聚居区顿涅茨克说，尽管在历史上俄罗斯给乌克兰带来了许多痛苦的回忆，尽管乌克兰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中欧国家”，但他仍然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并打消俄罗斯对乌克兰外交政策的疑虑，“应当将乌克兰之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作用，视为加拿大之于美国一样”。^②

而乌克兰东部的学者和民众，更是格外重视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紧密联系。这部分具有明显的亲俄地缘政治倾向的学者和民众，大多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兄弟国家、战略伙伴和乌克兰最亲密的邻国。这部分学者尤其反对橙色革命后上台的亲西方政府对乌俄关系的“破坏性政策”，认为这引发了乌俄关系的紧张和地区危机的出现，严重损害了乌国家利益。他们大多支持乌克兰在国际事务中持中立立场，不加入任何军事政治集团，并认为唯有这种状态最能保障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这些学者并不完全反对乌克兰与北约进行可能的合作，但他们主张这种合作必须取决于乌克兰自身的国家利益，且不能损害乌克兰与其邻国、特别是俄罗斯的关系。在对乌克兰

① 乌克兰 90%的石油需从俄罗斯进口，80%的天然气需从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进口。

② John O'Loughlin, "Geopolitical Visions of Central Europe", in M. Pagnini, V. Kolossov and M. Antonsich, eds., *Europe Betwee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Vol. II, p.620.

兰国家发展的未来规划方面，这些学者大多支持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的互利关系，在能源、经贸、技术等方面加强彼此合作。这些学者当中最极端的人士甚至坦言，他们的最终目标在于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欧亚联盟，乌克兰应与俄罗斯等国家一道团结起来，排除美国和北约在欧亚大陆上日益扩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

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历届政府大都高度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在经历了独立初期因债务问题所引发的不快后，乌俄关系于 2000 年重新步上正轨并逐渐升温。尽管 2004 年橙色革命的爆发和亲西方政治人物的上台，使乌俄关系出现严重的动荡，但 2010 年大选亲俄人士重新掌握权力后，乌俄关系日益改善。乌现总统亚努科维奇就称，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信仰，乌克兰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恢复和保持与俄联邦的平等和友好关系，俄罗斯是乌克兰主要的邻居和战略伙伴。“毫无疑问，俄罗斯现在是、也一直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①他还在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保证俄语在乌的地位、延长俄黑海舰队驻乌基地租期以及两国在能源、航空航天、经济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作出了相应的承诺。

但正如融入西方政策会引发乌克兰东部民众的反感一样，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建议实际上也一直引起乌克兰中西部具有较为强烈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民众、学者和政治家们的疑虑。如上文所述，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时，乌克兰部分学者便开始致力于描述乌克兰在乌俄结盟后所蒙受的不公正对待，分析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民族性格、地理特点、生活方式和政治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力图以此作为乌克兰要求改善自身待遇、甚至摆脱俄罗斯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理论依据。自上世纪 90 年代实现了国家独立以后，那些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观念和致力于巩固国家主权独立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一直“敏感而恐惧”地关注着俄罗斯任何试图重新恢复苏联的企图。他们特别担心 90 年代有关加强独联体机构建设的建议，认为此举定将严重损及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使其变成下一个事事均需经过莫斯科的白

① Olesia Oleshko, “In Search of Ukraine’s Identity”, *The New Presence*, p.30.

俄罗斯，结果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卷土重来”。^①近年来，随着乌克兰独立地位日益巩固，不少乌克兰学者开始承认，至少从目前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目的，或许仅仅在于力图恢复俄罗斯在当地的传统影响或对乌克兰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以确保后者不落入其敌对势力（如北约）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俄罗斯似乎已经对付出巨大代价来重新恢复其历史上一度拥有的庞大帝国失去了兴趣，它甚至不愿再为乌克兰或其他国家承担安全和军事义务。在此情况下，这些学者对于“俄罗斯试图再度吞并乌克兰的阴谋”的恐惧方才有所降低。

五、评价和展望

乌克兰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地位之重要，向来得到诸多地缘政治研究大家的充分肯定。“地缘政治”一词的发明者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等，在其著述中均提到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和欧洲局势的重要影响。一战前后德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也曾着重指出过乌克兰在他所筹划的所谓“中欧”（Mitteleuropa）中可能发挥的作用。^②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当代著名战略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更是高度关注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他宣称，“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 5200 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③美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也指出，

① Taras Kuzo, “Slavophiles versus Westernizer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in Ukraine”, in Kurt R. Spillmann, Andreas Wenger and Derek Müller, ed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Independent Ukrain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68.

② Vadym Levandovsky, “Ukraine in Geopolitical Concepts in the First Thir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Oleksandr Derhachov, ed., *Ukrainian Statehoo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p.129.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长久以来，乌克兰之于俄罗斯的意义，相当于得克萨斯之于美国，苏格兰之于英国的意义。此地如陷于敌手，则将对上述国家构成现实的威胁。在被俄罗斯统治时，乌克兰将俄罗斯的权势延伸至极难被突破和渗透的喀尔巴阡山脉；但如果乌克兰处于西方强权的影响或控制之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南部平原至少在地理上无险可守。因此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关乎国家的基本安全；而对西方强权来说，乌克兰对于遏制乃至击败俄罗斯也极具价值。^①

尽管身具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但乌克兰在其独立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自身战略作用发挥的效应仍是十分可疑的。独立以来的乌克兰长期受困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地区差异等问题，国家政治认同的塑造仍然远远谈不上成功。国内不同地区的民众和学者各具迥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想象和指向完全相反的话语倾向。绝大多数政治精英也正是以此为依据进行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践，以迎合不同地区普通民众的集体心态或心理预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独立以来乌克兰的国内治理和对外行为长期摇摆不定。随着掌权政治势力的不同，可能显现出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张。从这一点看，普通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想象，直接影响着乌克兰政策规划、外交实践等“高级政治”问题的萌生和定型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集中体现出冷战后乌国内社会政治势力、学术精英、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在反映、理解和传播地理知识上复杂且微妙的互动反馈过程。

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对国内地缘政治问题的敏感关注和精细考察。经典地缘政治研究一般将研究重点放在关注全球规模和地区规模的地缘政治形态的发展演进上，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强国之间的空间增减和权势斗争关系是理论考虑的首要内容。在现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除了“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曾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国内领土空间开发态势有所涉及、二战后巴西地缘政治研究对巴西国内社会和经济给予高度重视外，对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的研究一向有所欠缺，对一个国家国内社会地缘政治想象的塑造和发展进程的

^① George Friedman, “Geopolitical Journey: Ukraine”,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01129_geopolitical_journey_part_6_ukraine

分析考察更是有限。^①而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研究则有所不同。正是意识到乌克兰独立后异常复杂、危机四伏的国内社会状况，乌学者并没有将其研究重点集中到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形态的发展演进上。相反，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乌克兰国内各地区民众的历史记忆、集体心态，以及思想倾向的判读和分析上。在他们的努力下，冷战后乌国内地缘政治运行的现有态势和发展趋势都得到了较为细致、较贴合实际的梳理和归纳，为进一步认识理解当代乌国内社会的真实状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也为当代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这正是冷战后乌地缘政治思想的长处和优势所在。

然而也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尽管在国内地缘政治的“区域性分裂”等问题上存在共识，并对该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分析，但却鲜有提出一些足以妥善解决或成功弥合国内各地区族群在历史文化心理上的巨大裂痕的政策主张。相反，这些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在分析谋划乌克兰应有的地缘战略和对外政策时，有很多是从自身的思想立场出发，有意无意地迎合乌部分民众的心理，所得出的结论也很难称得上中立和客观。这一点集中印证了很多秉持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学者的观点——在地缘政治研究当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研究者也不是超然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立场之上独立存在的，其理论反映必然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存在论、世界

① 有关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介绍，可参见 Wolfgang Natter, “Geopolitics in Germany, 1919-1945: Karl Haushofer and the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 in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aróid Ó Tuathai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 pp.187-203.有关二战后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介绍，参见葛汉文：“‘安全与发展’：巴西的地缘政治思想（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9-38页。

②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1.

观和价值取向的强烈影响，无法做到真正客观和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①这一点在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研究中得到了尤为鲜明的体现。

可能也正是在此类地缘政治话语的引导下，当代乌克兰国内社会对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存在很多问题。有学者评论道：“乌克兰人曾长期渴望独立，但并没有意识到独立所带来的后果”。当前不少乌克兰人虽然已经完全认识到乌国内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难题，却似乎并不急于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措施加强国内治理，解决自身问题。“他们好像过于注意莫斯科、华沙或布鲁塞尔而不是基辅，最关心的是如何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进行选择”。^②但格外令乌克兰民众矛盾的是，他们目前并不清楚欧盟和俄罗斯谁更需要乌克兰：欧盟由于金融危机正处于极度虚弱当中，乌距欧盟提出的政治经济标准还相差甚远，其加入欧盟的目标短期内不会实现；而俄罗斯似乎也仅仅希望乌克兰不被敌对势力控制，使其不成为自己的一个威胁，却不愿为其承担更多的安全和经济责任。

尽管在乌克兰国内目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乌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但乌克兰凭借其面积位居欧洲第二的领土幅员、价值突出的战略位置、相对丰厚的自然资源，加上已自成体系的工业实力，历史上对地区地缘政治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未来其依然将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这一点，或许正如乌当代学者奥列克山大·萨尔托夫斯基（Oleksandr Saltovsky）所预计的那样，“乌克兰土地不是被上帝遗弃的地区。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贸易机会，曾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当今世界，乌克兰的重要地位还会继续增长”^③。而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学者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对当代乌克兰国内地缘政治的精细描绘，也必将对乌摆脱当前国内困境、巩固民族国家、进而展

①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Harlow: Longman, 2000, p.34;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5-6; Yves Lacoste, “Rivalries for Territory”, in Jacques Lé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152.

② George Friedman, “Geopolitical Journey: Ukraine”,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01129_geopolitical_journey_part_6_ukraine

③ Oleksandr Saltovsky, “The Geopolitical Component of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Thought: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95.

现民族抱负提供难得的理论支撑。

【Abstract】 Domestic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remain the main topic of post-Cold War geopolitical studies in Ukraine, which emphasize the big gap in historical memory and social mentality among different parts of Ukraine. However, there are just few targeted and practical policies and advocates regarding how to bridge the gap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political identities. Contradictory foreign strategies have been designed by contemporary Ukrainian geopolitical scholar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 and has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s on Ukrainian post-Cold War foreign policies.

【Key Words】 Geopolitical thoughts, Ukraine, Post-Cold War, Foreign Policy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ки Украины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на описании формы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и огром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сколы в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ах Украины находится в центре внимания та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о в вопросе,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статус-кво раздел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этнических группах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страны,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ало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и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В вопросе внешней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украинские учёные-геополитик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и различным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позициями обрисовали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что оказа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Украины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Украина,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杨 恕 朱倍德*

【内容提要】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同源于东斯拉夫人，双方在宗教、文化上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别。西乌克兰由于受波兰长期统治，在文化上与俄罗斯的差别就更大。300多年来，乌克兰曾是俄国与苏联的一部分，经历了“俄罗斯化”过程，同时也有苏联时期大清洗、大饥荒等痛苦的经历，卫国战争期间，一些乌克兰人还曾与德国合作反对苏联。这些历史、文化因素使乌克兰东西部在对俄关系上有明显差异，也在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引起了一系列争议甚至冲突。

【关键词】俄乌关系 乌克兰东西部 争议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5-0023-(19)

独立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的摩擦和争议不断，不仅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地区问题的热点。在一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上，如克里米亚的归属、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赁、天然气供应等，两国唇枪舌战，政府、议会、公众、媒体都卷入其间。但这些问题的激化程度有限，持续时间不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两国之间关于历史文化的争议和冲突。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东斯拉夫民族，在文化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而且有300多年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双方在文化上也有不少差异，在同

*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朱倍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

一个国家的历史经历中又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问题随着两国的独立，一下子爆发出来。客观地讲，争议主要是由乌克兰方面提出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乌克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差别，以说明它们是不同的，而不是相近的；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质疑和新的解释，认为帝俄、苏联时期所编写的历史叙述没有反映乌克兰真实的历史，乌克兰在帝俄和苏联时期处于不平等地位，中央政权对乌克兰实行了多方面的不平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政策，乌克兰的历史必须重新编写，等等。这些观点广泛出现在学术研究成果、媒体乃至官方文件中，形成了一股重新塑造乌克兰历史的社会潮流。为了首先在青少年中建立新的历史-文化观，乌克兰政府在独立伊始就开始编写新的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上述观点成为主导思想。应该指出，这一过程及其生产产品明显具有反俄罗斯、否定苏联的特征，成为乌克兰相关内外政策的文化支撑，并在乌克兰的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就对这一情况做一概要的分析。

一、乌克兰东西部不同的历史—文化进程

公元 9 世纪由古斯拉夫部落建立的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起源。那时的古斯拉夫部落还没有分化，因此可以把基辅罗斯的居民称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

在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时期，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昌盛，由此奠定了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将基督教正教定为国教，此举确定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归属，它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明的摇篮是基辅罗斯，而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则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个历史里程碑。

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文明的起源贡献巨大，它所使用的“古教会斯拉夫语”及相应的文字，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最早使用的文字。迄今为止最早记载俄罗斯历史的文献《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就是用这种语言

的文字写成的。此外，俄罗斯最早的文学、艺术以及法律等等，都是在东正教会的推动下出现的。由于基辅罗斯对于俄罗斯文明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人把乌克兰的基辅视为俄罗斯文明的起源，称基辅为“俄罗斯诸城之母”。

12至13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基辅罗斯逐渐灭亡，在其地域内兴起了两个中心，一个是罗斯西南的加利西亚^①-沃伦公国，另一个则是罗斯东北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13世纪20年代，蒙古人打进了东欧，使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征服了包括罗斯人在内的斯拉夫人，但罗斯西南部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并没有被征服。“‘在这个强大的公国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它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继续着古罗斯的传统。”^②因此，从政治与文化传统延续的意义上讲，加利西亚-沃伦公国成了基辅罗斯的直接延伸。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乌克兰进入领土-文化分裂的时期：乌克兰西部（即加利西亚-沃伦）已和罗斯其他地方（包括东乌克兰）在政治文化上开始有了差别。东部逐渐受到蒙古-鞑靼人越来越深的影响，而西部则较多地保留了古罗斯的政治文化。1340年，波兰入侵加利西亚，使乌克兰逐渐沦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一部分，此后波兰对乌克兰的统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过程中，波兰统治下的西乌克兰是天主教的领地，而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立深化了东西乌克兰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④

1648年春天，乌克兰人首领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反对波兰统治的大起义。在经历了数年的战争而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以赫梅利尼茨基为首的乌克兰上层，选择了与俄罗斯联合以摆脱波兰人统治的道路。1654年1月，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实现了合并。尽管有关《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目的、内容、结果等，目前在俄乌双方之间进行着

① 加利西亚地区，包括现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3个州，其首府为利沃夫市。

② Mikhail Molchanov.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2-63.

③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66页。

④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Украины. <http://rozvalua.livejournal.com/248796.html>（上网时间2013-08-25）

激烈的争论^①，但是，协议之后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却无法否定，这成为乌克兰历史和俄乌关系中最重大的转折点。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十多年之后，1667年1月，莫斯科公国和波兰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将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正式划归波兰统治，而东岸则划给了俄罗斯。两岸乌克兰人各有自己的首领—盖特曼，但分别由波兰和俄罗斯批准。乌克兰的这一次领土-政治分裂，使乌克兰的文化失去了统一的空间，东西乌克兰在文化上分别受俄罗斯和波兰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乌克兰南部虽和东部一样有着亲俄情结，但二者的历史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历史上说，今日乌克兰的南部沿海地区从来都不是乌克兰人的“历史活动区域”。18世纪末之前，这一地区一直被克里米亚汗国所占据。18世纪末，俄国通过战争兼并了这一区域，占领了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广大黑海沿岸地区，并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来此地定居。这使南部的敖德萨州、尼古拉耶夫州、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以及克里米亚共和国的人民在今天仍保持着对俄罗斯的亲近之情，也使他们在2010年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对主张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亚努科维奇的支持率平均高达70%以上^②。

1793年，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波多利、沃伦、布拉茨拉夫和基辅等四个省）被划入俄国。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又得到了东部沃伦。此时，俄国已控制了乌克兰土地的80%，但乌克兰最西部（现今乌克兰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外喀尔巴阡、布科维纳5个州）仍然在俄国的疆土之外。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境内的乌克兰失去了以前沙俄所领有的沃伦和罗夫诺地区（这些西乌克兰领土被波兰占据），而奥匈帝国以前所占领的乌克兰最西部领土则处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的控制之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中旬，苏联按照之前与德国的秘密协定，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也就是现乌克兰的最西部，包括利沃夫、沃伦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逮捕了原政权、

① 沈莉华：“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恩怨解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数据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Ukrainian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0

政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限制其活动。苏联和德国一同瓜分波兰的做法，激起了西乌克兰人的愤怒和反抗。应该指出，苏联对西乌克兰西部（波兰东部）的占领，使乌克兰基本处于了一个国家之内。但是，由于此前历史上领土分裂而造成的东乌克兰、西乌克兰以及西乌克兰西部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却不可能因领土合并而消失。苏联时期，它就逐渐有所表现，至苏联解体以及乌克兰独立后，更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总之，历史上乌克兰民族的生活地域长期处于分割状态，西部主要受波兰的影响，欧洲文化从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进入西乌克兰，而东部主要受俄罗斯的影响。这使东西乌克兰不仅在文化上出现差异，而且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这一情况使乌克兰在独立后重建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面临重大挑战，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成为问题的核心。下面就对此进行分析。

二、乌克兰东西部对俄罗斯态度的差异

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中更为基础和持久性的构成因素^①。但对乌克兰来说，由于其东西部经历了几乎完全不同的历史，因此乌克兰到现在都还没有铸造出较为统一的民族凝聚力，而其间俄罗斯又起了决定作用。这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乌东西部对俄所持的不同态度上，西部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波兰统治，但一直对波兰人当年的压迫记忆犹新；而经历了长时间俄国统治的东部却一直有着明显的俄罗斯情结。

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刚刚取得独立、在别人的统治下生活了 700 多年的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确立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民族认同和精神。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需要重建。而现实是，俄罗斯文化在东乌克兰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对于乌克兰这一新独立、且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有不少恩怨的国家来说，减少或清除俄罗斯的文化影响（主要在东、南部）是可以理解的，这有利于确立乌克兰独立的民族-文化精神。当今世界，文化在国际

^① 骆郁廷等著：《文化软实力：战略、结构与路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往大国赖以崛起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国家硬实力相对而言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文化、制度及政策等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在世界舞台拓展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那些独立时间不长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确立自己的文化优势，不要让自己的国民仍被其他文化所吸引。乌克兰的做法是普遍的，而不是个案。

（一）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俄乌自 1654 年合并以来，俄罗斯人和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人，已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了 300 多年。300 年来，俄罗斯在文化上力图使乌克兰人用俄语，并有大批俄罗斯人移民到乌克兰；苏联时期的中央政府更是在“民族融合”、“创建苏联人民”的口号下在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而共同的历史记忆更使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怀有深深的“兄弟之情”。总之，这一切都在如今的东乌克兰刻下了浓重的俄罗斯痕迹。

在乌克兰东部，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土地，甚至在历史上就直接由俄罗斯来管辖。乌克兰东北的哈尔科夫就是一个例子：哈尔科夫地区原本就是莫斯科公国的西南边疆。从 16 世纪末开始，乌克兰人为躲避战乱及波兰地主的压迫开始迁入此地，使之在 1796 年成为斯洛博达乌克兰。也就是说，这一地区虽大部由乌克兰人居住，但原本就不归乌克兰盖特曼管辖，而是受俄国控制。因此该地虽属于乌克兰并且大多居民是乌克兰人，但缺少乌克兰民族主义。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反应也说明了东部地区对俄罗斯的信任。在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普遍发生了农民骚动。单就乌克兰来说，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冲突较多较广，在东岸和南部则相对较少。这说明，由于俄国在西岸长期依赖原来的波兰贵族进行统治，造成西岸乌克兰人对俄认同程度不高；而东岸和南部的乌克兰人由于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对俄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认同。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在乌克兰地区遭受惨败，但东乌克兰人（指 1939 年之前苏维埃乌克兰版图上的乌克兰人）没有向德国人投降，他们在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对德国法西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抵抗，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的忠诚，这与西乌克兰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

另外，即使到了苏联行将解体时，东乌克兰人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独立愿望。到 1989 年末，大部分乌克兰人也并不支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①。当时在顿巴斯虽然也发生了罢工，但工人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经济方面的，他们对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即“鲁赫”^②）的一些代表是非常不信任的。1990 年 1 月，“鲁赫”号召乌克兰人仿效波罗的海国家，手拉手组成人链进行抗议，结果，45 万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汇聚到连接利沃夫和基辅的道路上，^③但链条没有向东继续延伸。这说明东乌克兰人在当时仍倾向于与俄罗斯组成联盟，对独立运动并不支持。

在现今乌克兰的 4600 多万人口中，俄罗斯族占 17.3%，人口约为 800 多万，他们大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并且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戚。可以说，如果苏联不解体，那持续了 300 年的俄乌一体化还会以更高的水平在乌东、南部发展下去，但苏联的崩溃使得这一进程戛然而止。300 年的俄罗斯化使俄语在乌克兰东部尤其是东南一些州的使用率为 20%-50%。在 1954 年才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俄罗斯人所占比例高达 58.5%（2001 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更是达到 77%（2001 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④。

独立以后，为了重建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广乌克兰语，同时限制俄语的使用，这无疑削弱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在独联体国家中，尽管乌克兰俄罗斯人最多，使用俄语的人口最多，但俄语却没有国家语言的地位。这种状况对于东、南部人，尤其是那些俄罗斯族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用乌克兰语替代俄语。乌克兰政府去俄罗斯化的语言-文化政策，受到俄罗斯及乌国内相当一

①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颜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143-144 页。

② 鲁赫（Народный Рух України）：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1989 年成立。

③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第 146 页。

④ 数据来源：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http://2001.ukrcensus.gov.ua/eng/results/general/language/Crimea/>

部分人的反对^①。经过讲俄语居民多年的争取，乌克兰议会迟至 2012 年 7 月才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规定在俄罗斯族人不低于人口 10% 的地区，俄语具有地区语言（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地位，这样的州在乌克兰 27 个州中有 13 个。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政府应该认识到，“真正完整、和谐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愿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拥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单独缔造、单独拥有的国家。”^②现实说明，东乌克兰的文化倾向影响着该地区居民的政治选择。如前文所述，在历次选举中，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投票支持亲俄的地区党，可以说是地区党稳固的“票仓”。总之，历史-文化差异严重影响着东西部居民的政治选择。表 1 是一项对乌克兰西、中、南、东四个地区居民地缘政治选择的调查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亲俄倾向自西向东递增，而亲欧倾向递减，明显表现出历史-文化差异的作用。

表 1 乌克兰居民地缘政治取向的地区差异 (%)

您对下列观点：		乌克兰各地区			
		西部	中部	南部	东部
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	强烈反对	54.7	30.6	7.5	8.5
	难以回答	18.3	22.0	8.6	11.0
	强烈支持	26.9	47.5	83.6	80.6
乌克兰加入欧盟	强烈反对	11.7	13.9	24.8	24.8
	难以回答	28.1	37.7	41.8	39.0
	强烈支持	60.2	48.4	33.4	36.3

资料来源：Шульга М.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краины. Киев: ООО «Друкарня «Бізнесполіграф», 2009. С.57.略有删节。

（二）西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18 世纪末俄国合并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不包括乌最西部的加利西亚）后，波兰地主仍保留着庄园与地位，在官方机构中仍使用波兰语，甚至许多

^① 例如在九十年代中期，乌克兰政府的语言政策使得西乌克兰俄语族群的父母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俄语教育。于是，加利西亚的这些俄语族群就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家长委员会”，他们要求政府兑现少数族裔可用自己的母语教育孩子的权利。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51 页。

官员也还是波兰人，帝俄并未在这里实行俄罗斯化。直到 1830 年波兰起义后，俄国政府才意识到波兰民族意识的“危险性”^①，并开始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但当时波兰人在西乌克兰的影响力已经根深蒂固。19 世纪 30 年代，西乌克兰有四百多万乌克兰农奴和近十万人特权阶层，即贵族和神职人员，其中大多数为小地主、大地主庄园的管家、土地承租人等，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是波兰人^②。也就是说，尽管西乌克兰在当时已并入俄国 50 多年，但此地的管理阶层几乎仍是波兰人，这使得西乌克兰人的俄罗斯化并不明显。由于没有尽快确立俄罗斯文化对于西乌克兰人的优势，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认同感至今没有东部强。

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奥地利统治下的西乌克兰西部，即加利西亚地区。当时，这里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亲俄派，他们认为，奥地利正持续衰落，加利西亚总有一天会落入俄国之手。因此，和俄国结盟才是上策。19 世纪中后期，在东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中，曾经一度出现过一股不强的亲俄力量。例如，在 1907 年加利西亚地区的选举中，亲俄罗斯派曾获得 2 个席位（乌克兰政党赢得了 22 个席位），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一战初期，俄军攻入乌克兰最西部，在加利西亚破坏乌克兰人的社会和文化，并将许多民族主义者流放西伯利亚，这使西乌人对俄罗斯的那一点好感完全消失。随着一战后乌克兰最西部归入波兰，波兰的反苏倾向又给予这里的乌克兰人很大影响。1939 年，该地区被苏联吞并，由于苏联的错误政策，许多西乌克兰人在 1941 年欢迎德军的到来，希望能获得比苏联统治更好的境遇。1943 年，有不少于 7 万的加利西亚青年进入德国党卫军的志愿军团“加利茨亚”（Галиция）。同时，一支为抗击苏军而组织的队伍——乌克兰起义军（UPA）也首先在沃伦成立。而在二战即将结束、苏军就要重返

① 这种“危险性”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上。由于长期受波兰统治，许多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人转而信奉具有浓厚东正教色彩的天主教——东仪天主教。但 1830 年，该教派上层领导了波兰民族大起义。在起义被镇压后，俄查封了东仪天主教会，并将其教区转交给俄罗斯东正教会。资料来源：Анисимов В,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 Дятлов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атолицизм в Украине (Краткая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 Україн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25.06.2004.

②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第 228 页。

乌克兰最西部时，许多西乌克兰人跟随着德国人向西撤退。总之，两次世界大战使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恶感急剧增加，再加上西乌克兰本身所处的西方文化环境与俄国完全不同，这些都使得现今许多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苏联-俄罗斯怀有一种仇恨和蔑视的心理。基辅和西乌克兰的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认为，俄国和俄国人在文化上属于外国，在政治上则属于敌对一方，这种思想在加利西亚尤其明显^①。在加利西亚，游行示威者常常打出“打倒莫斯科佬（Moskals，一种对俄罗斯人的蔑称）”、“从乌克兰的学校里清除俄语！”这类标语。西乌克兰最极端的反俄情绪则集中表现在 2011 年的二战纪念日上：5 月 9 日，在利沃夫的卫国战争纪念碑前，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撕毁了俄罗斯国旗、国徽以及花圈，并与老战士发生冲突。该市市长甚至称卫国战争老战士是“俄罗斯的法西斯”，这引起了俄罗斯官方的正式抗议。此事说明了该地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情感取向。^②

二战后，加利西亚地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州）并入苏联，但并没有大量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地区，这使当地保留了乌克兰语的学校和媒体，并成为苏联境内“苏联色彩最淡”和“俄罗斯人最少和俄罗斯化最低”的地区。^③总之，今天的西乌克兰西部是乌克兰最为欧化、同时也是对俄罗斯最不认同的地区；而东部那些与俄国经历了三百多年共同历史的乌克兰人则与此明显不同。

三、俄乌之间的外交-文化冲突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的差别，又成为乌克兰东西部差异的标志之一。伴随着乌克兰独立，乌克兰民族文化复兴也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被称为“负面”的因素成

① Mikhail Molchanov,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pp.207-208.

② Беспорядки во Львове в День Победы: реакция, комментарии. http://ria.ru/trend/lvov_vandalism_20110510/?ria=qdt06u5a4oa62pb423cgddsop3n8tacr

③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第 127 页。

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引发了双方的一系列争议甚至冲突。

总体来说，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争议的内容，大致可以以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对于并入之前，争议主要涉及基辅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关系；《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等相关文献的内容、作用；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环境、目的、后果等。这些问题的争议主要在学术界，但其民族情绪和表达也在官方、公众和媒体中广泛存在。双方学者还召开学术会议进行讨论。例如，2008年4月3-5日，俄科学院欧洲所召开了俄乌关系史会议，俄乌学者就双方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研讨。^①以后莫斯科大学等也参与进来。虽进行了诸多争论，但分歧并未减少。对于并入之后，也就是处于帝俄及苏联一个国家内的历史文化过程，争议的内容则广泛得多，而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官方成为争议的参与主体。客观而论，争议是由乌方主动引发的，俄方主要是应对式的反应。由于双方争议内容相当复杂，笔者无意对它做详细论述，这里以外交领域为主做概略的介绍和分析。

乌克兰独立后就开始把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文化问题纳入到法律、政策范围加以处理，同时使其进入到外交领域。双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编写、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论文，同时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以宣传自己的观点，扩大影响，并确立学术地位。在所有争议中，有关大饥荒的表达最为强烈，乌克兰政府和一些学者多次发表意见，认为它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геноцид）。2005年尤先科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6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呼吁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要求俄罗斯为此道歉^②。大饥荒是1932-1933年在全苏范围内发生的一次灾难，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多的。问题是，乌克兰为什么选择大饥荒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

①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Украина и Россия: история и образ истории. <http://ru.znatock.com/docs/index-4578.html>（上网时间2013-9-28）

② Ющенко требует от России извинений за "голодомор" 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 в 1932-33 гг. А почему не у Грузии?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126888380>（上网时间2013-10-03）

发起对俄罗斯的责难呢？关于这一点，乌克兰官方甚至学术界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在大饥荒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宣传大饥荒容易引起全民族范围内的共鸣；第二，把大饥荒塑造为“种族灭绝”可以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进而否定俄乌之间的文化-精神联系；第三，大饥荒是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制造舆论有利于在国际上赢得同情；第四，由于大饥荒发生在斯大林时期，可以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体制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实例，更易在西方得到支持，有助于乌克兰融入西方。

大家知道，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体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其中，大清洗、大饥饿这类疮疤更成为首选的靶子。此时，美国官方开始关注大饥荒，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散居群体在这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①。1958年，基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国内安全法案和其他国内安全法执行状况调查分委员会的质询，出台了题为《苏维埃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对种族灭绝的研究，歧视和越权》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乌克兰人为的饥饿中有480万到800万人死亡^②。1984年9月，参议院开始制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法案和两个决议，类似的工作也在众议院进行，并建议成立政府委员会，以搞清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中的作用，并使舆论界了解情况。初期计划要求委员会由21人组成，工作期限3年，从政府预算中拨款300万美元。1984年10月，委员会成立，成员减少为15人，工作期限减为2年，拨款减到40万美元。委员会成员中，参议员2人，众议员4人，政府部门代表3人，以及乌克兰社团代表6人，委员会主席为詹姆斯·梅斯（James E. Mace）。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大规模死亡是由人为的饥饿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实施了针对乌克兰

① Украина отмечает День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Голодомора. <http://www.rbc.ua/rus/top/show/ukraina-otmechaet-den-pamyati-zhertv-golodomora-24112012080000> (上网时间 2013-11-17)

② “The Soviet empire: prison house of nations and races; a study in genocide, discrimination, and abuse of power”,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by Joseph G. Whelan, analyst in Eastern European affairs]. Washington: Govt. Print. Off., 1958.

人的种族灭绝^①。1984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根据美国111届国会决议，宣布1984年11月4日为“乌克兰1933年大饥荒纪念日”。1986年，出版了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书《痛苦的收获—苏联的集体化和恐怖的饥饿》(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书中对大饥荒作了全面介绍，认为它是人为的，目的是打击民族主义和粉碎农民反对集体化的意图^②。类似美国的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文论述，于此不赘。

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大饥荒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独立后更是波及更大的范围。历届乌克兰领导人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这在尤先科时期表现得最突出。尤先科执政期间，乌克兰外交政策更加西倾，对俄罗斯(苏联)的指责也更加激烈，大饥荒被工具化就更为明显。尤先科以大饥荒为起因，在全国举行题为《乌克兰应记住，世界应承认》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有：

1.创作相关记忆(历史)的国家书籍。在乌克兰所有遭受过饥荒的州，在州和区国家机关的领导下成立协调小组，收集1932-1933年由于饥饿受难和死亡的证据。这些协调小组指导着数以万计的地方小组的活动，它们在各地、首先是农村搜集证据。参加人有教师、大学生、中小學生、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地方志学者、俱乐部主任等。

2.举办群众纪念活动“点燃蜡烛”、“不灭的蜡烛”等，举办悼念集会和演出，组织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竞赛、学生作文竞赛，献花圈和鲜花，在中小学开办纪念课程，建立纪念地，在博物馆、学校和图书馆办展览，设置十字架、纪念标志、纪念塚，植树、建立综合纪念物等。

3.用立法手段确定大饥荒为种族灭绝，禁止对它做任何其他的解释。

4.通过国家出版基金，鼓励出版内容为1932-1933年大饥荒的学术研究

① Commission on the Ukraine famine: Report to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vestigation of the Ukrainian Famine 1932-193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pp. vi-viii.

② Роберт Конквест. Жатва скорби. Советск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террор голодом.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ыбидь, 1991. С.476-478.

成果。^①

此外，尤先科还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国际场所发言，宣传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乌克兰官方也在国外会议和国际组织开展承认 1932-1933 年大饥荒的活动，例如：

2003 年 9 月，库奇马总统在 58 届联大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倡议，纪念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时乌克兰外交部和政府准备了 58 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草案，内容是谴责大饥荒并承认它为种族灭绝行动。后经大会辩论，最后通过了有美国等 25 国签署的《关于乌克兰 1932-1933 年大饥荒 70 周年的联合声明》。声明没有承认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而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剧”，同时表达了对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前苏联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的纪念（联大第三委员会文件，俄文版 A/C.3/58/9）。之后又有 11 个国家在该声明上签字（同前，A/C.3/58/9/Add.1）^②。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莫斯科参加独联体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乌克兰外长鲍里斯·塔拉修克（Борис Тарасюк）提议，把承认 1932-1933 年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列入会议日程，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即提出反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投了反对票，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弃权，古阿姆的四个成员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投了赞成票^③。

2007 年 11 月 1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4 届大会上，193 个国家通过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牺牲者》的决议，但它没有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④。

2008 年 9 月 24 日，由于没有获得支持，乌克兰代表团被迫在联合国人

① Георгий Касьяно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и в Украине. Из книг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I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Фалька Бомсдорфа и Геннадия Бордюгова. Москва: Фонд Фридриха Науманна. 2009. С.121-122.

② Сигизмунд С. Миронин. Сталинский порядок (разоблачая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ие мифы). 2007. С.85. http://www.greatstalin.ru/files/books/StalinKniga_Miron.pdf (上网时间 2013-11-10)

③ Дмитрий Ё-Бондаренко, Ольга Ё-Березинцев. Бориса Тарасюка расстроил правопреемник// Коммерсантъ Украина. №.70 (189). 25.04.2006.

④ ЮНЕСКО отказалась признать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РИА «Новости». 01.11.2007.

权委员会正式撤消了它此前提出的《纪念 1932-1933 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决议草案^①。

2008 年 10 月 23 日，欧洲议会通过非法律性质的决议《以大饥荒周年活动纪念乌克兰 1932-1933 年人为饥荒》(P6_TA-PROV(2008)0523)，同时呼吁乌克兰人民和有关国家寻找档案，进行深入研究^②。该决议同样没有承认种族灭绝。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乌克兰政府力图把大饥荒是种族灭绝推向世界范围，但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可，这对一些乌克兰人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俄情绪无疑是一种否定。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乌各地区对大饥荒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有研究指出，在西部、中部和北部，认为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超过 80%，东部约 50%，而南部和顿巴斯则约为 40%^③。

以上我们介绍了乌克兰官方在大饥荒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显然，这是针对俄罗斯的。俄罗斯一直强烈反对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2008 年 4 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关于纪念苏联境内 1930 年代大饥荒死亡者的声明，认为大饥荒是全苏联人民的灾难，它“没有，也不会有国际社会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的特征，不应成为当前政治投机的对象”^④。2009 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七个国家级档案馆联合出版了《1929-1934 年苏联的饥荒：新文献》一书（俄文名：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英文名：Famine in the USSR 1929-1934.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该书编者的主要观点是：30 年代的大饥荒不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中央和地方当局的政策错误，强制集体化，在出现灾情后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严格限

①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МЗС не коментує «провал заїї України щодо голодомору». 25.09.2008. <http://human-rights.unian.net/ukr/detail/188441> (上网时间 2013-11-10)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3 October 2008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Holodomor, the Ukraine artificial famine (1932-1933).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ta/23/10/2008-%200523/p6_ta-prov\(2008\)0523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ta/23/10/2008-%200523/p6_ta-prov(2008)0523_en.pdf) (上网时间 2013-11-10)

③ Голодомор 1932-33 гг был геноцидом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рмя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1.11.2013.

④ Госдума России: Голодомор-не геноцид. <http://www.delfi.ua/news/daily/society/gosduma-rossii-golodomor-ne-genocid.d?id=149931> (上网时间 2013-10-07)

制灾民外逃等；苏共中央在了解到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后，采取非常措施停止了粮食出口，并向灾区提供大量粮食援助。^①俄罗斯这种以历史档案来说明事实真相的做法，表现出其态度的客观性。可以和俄罗斯的情况相比的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大饥荒中死亡了 150 万人，但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民众认为大饥荒是苏维埃政权的错误，没有把罪过归于俄罗斯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出席“1932-1933 年大饥荒纪念碑揭幕仪式”时，要求人们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②。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虽然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了不少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官方和精英层面。在对待俄罗斯及相关问题的态度方面，乌克兰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来说，有多少人反对或支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介绍了诸多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负面态度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有必要指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这种联系无论现在还是今后，都还会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2010 年 4 月亚努科维奇总统宣布不能认为 30 年代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就是一个证明。除此之外，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卫国战争、30 年代的大清洗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争议^③。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①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рхивное агенство и др. – М., 2009 [Компакт-диск], pp.15-18.<http://www.rusarchives.ru/publication/famine/famine-ussr.pdf>（上网时间 2013-8-12）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 открытии Монумент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голода 1932-1933 гг. <http://www.akorda.kz/pda.php?r=page/view&sefname=vystuple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khstan-nursultana-nazarbaeva-na-otkrytii-monumenta-pamyati-zhertv-goloda&language=ru>（上网时间 2013-7-13）

③ 以卫国战争为例，乌克兰人有两种的观点：一派是以东部的苏军老兵及其后代为主力，他们的说法接近于苏联对战争的正统解释；另一派则以西乌克兰和基辅的一些民族主义人士（他们至少曾短暂地协助过德国国防军）为代表，他们持反对苏联的观点，把卫国战争中民族主义者抗击苏联的行为看作是“英雄般的斗争”，并无条件地将这当作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就曾将“乌克兰英雄”奖章，颁给了卫国战争时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在 2011 年 5 月利沃夫发生了“胜利日风波”后，俄罗斯对上述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详见 Mark Von Hagen, “Does Ukraine have a history?”, *Slavic Review*, Vol.54, Autumn 1995, p.672; Mikhail Molchanov,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pp. 84; 沈莉华：“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恩怨解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 年第 1 期，等。

四、结束语

民族国家在获得独立的一刻，就面临着确立自己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任务，乌克兰也是如此。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确立，一方面需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语言，确定所信仰宗教的地位，规定有标志意义的国旗、国徽、国歌等等；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专门的文化政策，对本民族的历史做出官方描述，对语言、宗教的发展做出规划，确定本民族稳定的文化认同。然而，要完成这一使命，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前文所述，由于乌克兰历史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又与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乌克兰在许多问题上必须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对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首先应该建立一种非政治化的民族认同，这需要在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建立共识，而不是把政治选择当做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文化问题政治化，不仅不利于民族认同的确立，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甚至加重民族的分裂。乌克兰是一个在历史、文化方面被割裂的民族，在如何重建民族认同方面，需要更多的思考。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同的民族起源和几百年的共同历史使俄乌两族在各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但乌克兰由于西部长期受欧洲影响，又常常表现出反俄情绪。另外，由于选举政治、“回归欧洲”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乌克兰国内总是有一股“全面否定俄罗斯”的思潮，这已经对乌克兰人民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影响。但这种思潮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歪曲历史、夸大俄乌关系中的民族因素，已对俄乌关系造成了危害。在国家关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各种国际行为体也都在做出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来讲，国家关系中的问题可以划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几个层次。比较而言，文化层次的矛盾最难解决，因为它形成的时间久，参与者范围广——从精英到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往往带有“全民”的特点。文化又涉及传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造成了文化冲突的难解性和长期性。从前文的分析可

以看出，尽管，乌克兰人，特别是东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是不会被轻易否定掉的，而且这种联系仍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以负面形态进入乌俄关系，并不断扩大影响。如果双方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并共同采取措施加以消减，那么可以断言，俄乌关系的良性发展就会变成不可期待的目标，并有可能发展到两国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更多的麻烦。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及其作用值得持续关注。

【Abstract】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both belong to Eastern Slavs. Both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spite of few differences. Dominated by Polan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est Ukraine differs more in culture from Russia. During the past over 300 years, Ukraine has been part of Tsaris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ot only experiencing the “Russification” but also suffering from the Great Purge and Holodomor. As a result, some Ukrainians were accused of collaborating with Germany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Patriotic War. All these histor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have led to different attitudes of East and West Ukraine towards Russia. Moreover, it also arouses many disput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relation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Relationship, East and West Ukraine, disputes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а происходят от восточных славян, у обеих стран много общего в религ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но есть и много различий. 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 из-за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Польши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сфере си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Росс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300 лет Украина была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шла процесс «русификации», испытала советские чистки, голод и другие болезненные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украинцы также

сотрудничали с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Э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привели к тому, что в вопрос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востоке и западе Украины существу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вопрос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эти явления вызвали серию споров и даже конфликт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Восточная и 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 спор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政治新闻架构中的画框隐喻——基于《纽约时报》 对乌克兰“橙色革命”报道的框架分析*

赵永华 刘佳莹**

【内容提要】被称为“主流媒体范本”的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的过程中的相关报道，值得作为样本加以研究。采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常用的框架分析法，从表层框架与深层框架两个维度入手，梳理该报对于“橙色革命”相关议题关注程度及态度评价的嬗变过程，并着重分析该报在建构政治领导人、乌克兰及其利益攸关国的形象问题上所使用的手法与报道框架，从而加深对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运作规律的认识，挖掘其在“柔性”干预别国内政中所使用的手段与策略。

【关键词】《纽约时报》 乌克兰 橙色革命 框架分析

【中图分类号】D73/77(51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5-0042-(19)

在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整个过程中，西方媒体的表现与最终产生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当时，美国两党异口同声地将尤先科捧为英雄，并把乌克兰奉为全世界的民主样板。借助美国媒体强大的传播力量，这些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传播与接受，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一时间成了“民主”

* 本研究受到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计划（项目批准号：NCET-11-050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10XNJ006）的支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6CXW005）、亚洲研究中心科研基金（项目批准号：2005007）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的疏漏由作者负责。

** 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刘佳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博格传播学院博士生。

与“自由”的化身。为了加深对西方媒体在建构乌克兰“橙色革命”事件上所使用的手法与报道框架的认识，本研究选择被称为“主流媒体范本”^①的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的过程中的相关报道为样本，采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常用的框架分析法，梳理该报对于“橙色革命”相关议题关注程度及态度评价的嬗变过程，挖掘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运作规律及其在“柔性”干预别国内政中所使用的手段与策略。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本文主要采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常用的框架分析法，力求对美国媒体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的行为与表现作出全面、客观的评析。框架分析法最早由美国学者高夫曼(Goffman)提出。“框架”这一概念系从社会学借用而来，是指人们在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认知框架，并按照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期望值。高夫曼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的形成一方面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则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②加姆桑(Gammson)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框限，这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据此，新闻报道的框架可被分解为外显形态的表层框架以及传递文本内蕴意义的深层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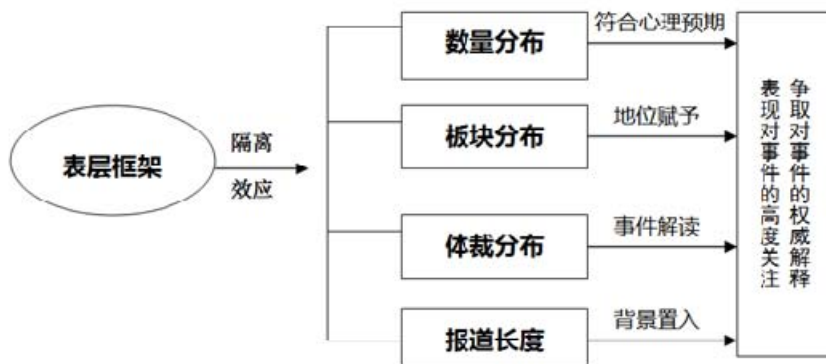
表层框架类似于加姆桑曾经提出的对框架概念的第一层理解：“框限”(boundary)。框限即是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即新闻本源或报道客体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要素和侧面。因此，表层框架即是指外显形态的框架。^③ 将表

① 喻国明：“一个主流媒体的范本——〈纽约时报 100 年〉读后”，<http://peopledaily.com.cn/GB/14677/22100/26521/26522/269910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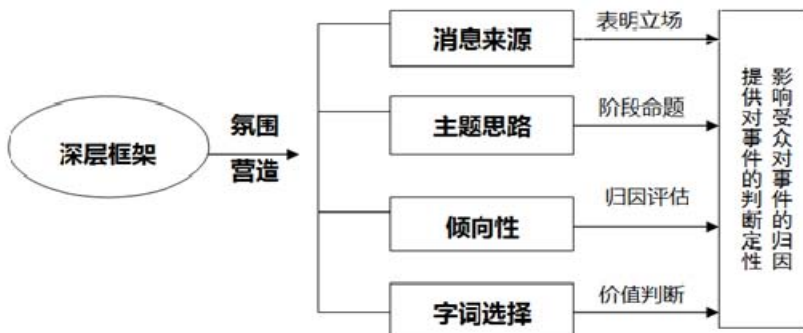
② 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0 期，第 89 页。

③ 李成：《北京奥运会的美国映像——对 Newsweek 北京奥运会报道的框架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11 页。

层框架及其细分框架的关系用图进行表示，得到表层框架建构图，如图 1 所示：



深层框架类似于加姆桑曾经提出的对框架概念的第二层理解：“架构”（building frame）。架构是一种意义的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包含静态的预存判断、动态的新闻叙事方法：描述、判断、解释的修辞和逻辑结构。将深层框架及其细分框架的关系用图进行表示，得到深层框架建构图，如图 2：



本文将从表层框架与深层框架这两个维度，对《纽约时报》乌克兰“橙色革命”报道的框架建构进行分析。

（二）抽样设计

本研究所有样本通过LexisNexis Academic学术大全文数据库^①抽取，并以《纽约时报》网络版的报道作为样本来源。对于“橙色革命”的报道，本研究选取该报2004年10月31日（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至2005年1月23日（尤先科入职总统）全文（Anywhere in the document）中含有“Ukraine”的所有报道作为样本，共得到238篇文章。

表1 “橙色革命”议题数量统计表

一级议题	政 治 人 物						地 缘 政 治	国 家 政 府 形 象			社 会 生 活				国 内 情 况			选 举			西 方 支 持			文 化、 体 育、 科 技、 教 育	
	尤先科	库奇马	亚努科维奇	季莫申科	普京	布什		乌克兰	俄罗斯	美国	人民生活	经济水平	油气资源	民主人权	国内非政府组织	国内媒体	抗议游行	舞弊	选民	骚动	政治培训	西方非政府组织	西方媒体		资金支持
报道数量	54	41	51	4	27	12	43	34	25	29	9	12	8	43	2	13	39	57	38	20	1	10	3	14	22
总计	189						43	88			72				54			115			28			22	

由于样本数量较大，笔者对此阶段的238篇文章实施系统抽样，因事件发生发展的急剧性，设置抽样间距为2，从按时序排列后的第一篇文章开始抽取样本，共得到样本119篇。在此时间段内，又依据两次第二轮投票的时间点作了更加细致的三段式划分：（1）第一轮投票日至第二轮投票日：2004年10月31日-2004年11月21日；（2）第二轮投票后至重选投票日：2004年11月22日-2004年12月26日；（3）重选投票后至尤先科入职：2004年12月27日-2005年1月23日。

（三）编码设计

对报道的编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报道基本情况，二是报道内容中所涉

^① 该库是世界上收录学科比较齐全的新闻、商业和法律等人文学科的综合型全文事实和数值型联机数据库之一。网址为：<http://origin-www.lexisnexis.com/us/lacademic>

及的八个一级主题。

报道基本情况分为：

(1) 报道日期；(2) 刊载板块；(3) 报道体裁；(4) 报道长度；(5) 引用消息源

八个一级主题分别是：

(1) 政治人物；(2) 国家政府形象；(3) 地缘政治；(4) 社会经济生活；(5) 国内情况；(6) 选举；(7) 西方支持；(8) 文化、科技、体育、教育。

以上是对所有议题的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一篇文章中可能包含多个议题，所以本研究分析的议题总数是累加数目。根据上述的议题分类标准，得到《纽约时报》“橙色革命”议题数量统计表，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数据分析

(一)《纽约时报》“橙色革命”报道表层框架分析

1、从报道数量来看，对突发国际事件作出快速指向与信息抵达，以争取受众心理期待。对 119 篇报道样本按照选举阶段进行统计，得到各阶段报道量分布，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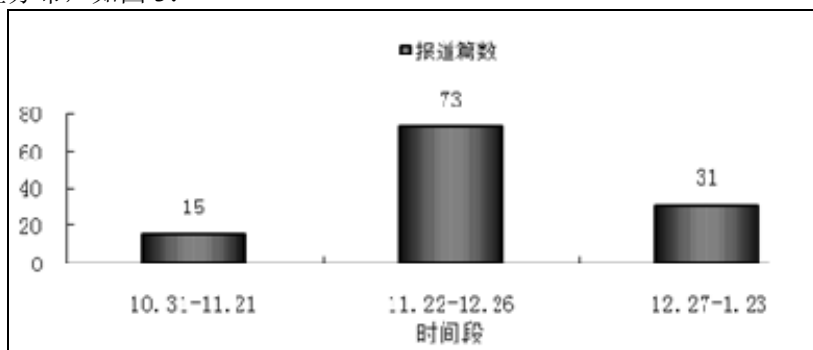


图 3 “橙色革命”分时段报道篇数统计

由图 3 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橙色革命”的报道数量在 2004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6 日时间段内出现了激增。由于 11 月 22 日为第二轮投票后乌克兰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统计结果的日子，而 12 月 26 日则是乌克兰

最高法院判决进行重新选举的日期，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橙色革命”的高潮时期，因此报道量达到峰值。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作为西方媒体中的主流大报，《纽约时报》对“橙色革命”这样一个突发性的国际事件，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快速的指向与信息抵达。在心理上，受众在明确了关注对象后，将会进一步关注事件相关信息，产生更多的期待。为了争取受众的心理依赖及信任，夺取话语权的制高点，同时也为了符合受众对于知晓事件进展的心理期待，《纽约时报》通过加大报道量，将“橙色革命”事件从众多其他的国际报道中剥离出来，也同时从众多关于乌克兰其他方面的报道中剥离出来，显示出对事件的高度重视，也保持了与受众心理期待的高度统一。

2、从板块分布看，赋予国际版头条地位强化文本内容的价值判断。

对“橙色革命”报道所刊载板块的统计显示，《纽约时报》对乌克兰的报道集中于国际版，其次是都市版，而科技版、周末版、旅游版没有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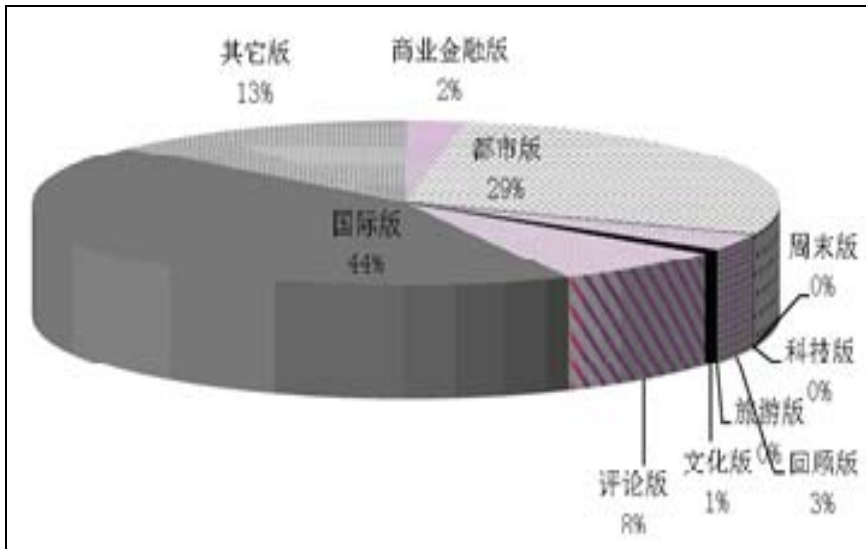


图4 “橙色革命”报道板块分布情况统计

由图4可知，《纽约时报》对于乌克兰的报道中有44%的文章，即119篇文章中有52篇刊登于国际版。《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主要用于刊登国际新闻，世界各国的重要政治新闻都在此汇聚，是该报的一个主要板块。在为期

约 60 天的革命情势急剧发展的时间段内，有 52 篇关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发稿密度较高。使用数据库“Search within results”（在结果中搜索）的功能，对国际版作进一步的限定性搜索发现，所有在国际版上的关于乌克兰的报道，位于“Section A”（头条）的文章数达到了 39 篇。不难看出，在这一段时间内，“橙色革命”在该报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对新闻报道所刊登的板块及位置的框架，实则是对文本内容在形式上提供了附加信息，它体现了该报的新闻价值判断，而这将引导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进行强化、削弱抑或改变。《纽约时报》将关于“橙色革命”的报道刊登在显赫的版面及栏目，实际上是对此事件赋予了较高的地位。这不仅表明了《纽约时报》对该事件的重视，同时也隐晦地向受众传递了一种价值判断信息，这在形式上对引导受众强化对事件的关注、固化受众对该报对事件定性的认同等方面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3、从报道体裁看，更多地借助深度报道以争夺对事件的解释权。

本研究共列出五种报道体裁：分别是消息、评论、深度报道、人物专访及其他。根据对“橙色革命”报道的体裁统计显示，《纽约时报》采用的体裁以深度报道居多，其次是消息，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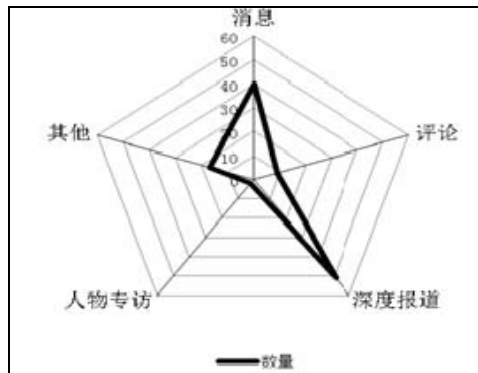


图 5 “橙色革命”报道体裁统计雷达图

综观《纽约时报》对“橙色革命”的报道所使用的体裁不难看出，深度报道占据了最大的比重，这体现了该报对事件解释权的争夺。在这个体裁的框架内，《纽约时报》对“橙色革命”中的事件按照其希望引导受众达致的

方向进行描述，且借助深度报道体裁全面、综合、细致等特点，该报便于将此事件与其他事件进行关联暗涉，进而给出评估，还可以作出对事件未来趋势的预计等。

较为典型的一篇深度报道是刊登在 2004 年 11 月 29 日的《静坐抗议在乌克兰激起轩然大波》（《A Silent Act of Rebellion Raises a Din in Ukraine》）。这篇文章以深度报道的方式描述了乌克兰境内媒体状况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该报道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等其他前苏联国家一样，国家对媒体拥有所有权以及控制权；特别是在电视领域，在政治竞选时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乌克兰国家对媒体报道的操控成为欧洲一些观察员认为 11 月 21 日选举不公的原因之一。^①可以看出，西方媒体运用深度报道综合、冷静、揭示本质等特点，向受众描绘了一个西方眼中的乌克兰媒体生态。

4、从报道篇幅看，多用长篇报道向受众提供背景信息及嵌入意见。

根据 LexisNexis Academic 学术全文数据库中给出的“Length”（篇幅）数据，对“橙色革命”报道所有样本按照三次投票划分时间段，进行字数长度历时性统计发现，以 1000-2000 字的报道为最多，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在第二轮选举至重选之间的时间段内，1000-2000 字篇幅的报道篇数达到峰值，如图 6。

由图 6 可知，（1）在第一轮投票至第二轮投票这段时间内，由于事态常规化发展，因此 500-1000 字的报道较多，主要用于陈述大选进展情况等。在这一阶段内 200 字以下的短消息也占有较大比重，多为对时事的即时更新。1000-2000 字的报道比重虽不占最多，但是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而 2000 字以上的大型详细报道几乎没有；（2）在第二轮投票后至重选举行期间，也即是“橙色革命”的高潮时间段，通过折线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出，1000-2000 字的报道所占比重急速上升，可见《纽约时报》在这一阶段对乌克兰国内形势极其关注，剖析认真详尽，热度很高。在这一阶段，由于多有重大事件发生，字数较少的消息无法交代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字数低于 1000 字的报道所占比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3）在重选结束至尤先科入职总统这一阶段，由于“橙色革命”获得了成功，舆论高潮已经过去，

^① *New York Times*, 29 Nov, 2004.

在这一阶段，1000-2000 字的报道攻势有所下降，常规化、字数较短的新闻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2000 字以上的长文章开始出现。这主要是由于“橙色革命”的高潮部分结束，《纽约时报》开始刊发对于整个“革命”的反思性、沉淀性与总结性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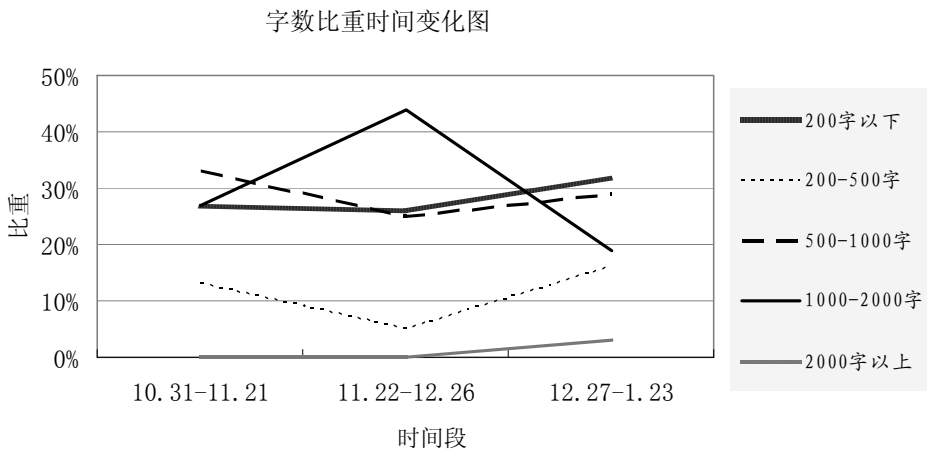


图6 “橙色革命”报道字数比重时间变化图

可以看出，在“橙色革命”中《纽约时报》运用了大量的长篇报道，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表面上对于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于乌克兰国内情况的指责、背景信息的提供，篇幅较长的报道有利于展现这些图景。在“橙色革命”中，《纽约时报》以运用大量长篇报道作为手段之一，来实现建构对于该事件的总体框架的目的。

（二）《纽约时报》“橙色革命”报道深层框架分析

1、从消息来源看，引用亲西方信源在事件陈述中隐含媒体倾向与判断。

根据对“橙色革命”报道样本中消息来源及其所持态度的统计，按从左到右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得到表2如下：

表 2 “橙色革命”报道引用消息源统计表

消息来源	国际通讯社			抗议群众	尤先科竞选团	青年学生		鲍威尔	国际观察员		西方学者	布什	普京	独立媒体	东部矿工	亚氏竞选团
	美联社	路透社	塔斯社			支持尤先科	支持亚氏		欧洲	独联体						
频数	15	11	2	26	19	15	1	15	11	4	14	10	8	8	6	4
比例	9%	6%	1%	15%	11%	9%	1%	9%	6%	2%	8%	6%	5%	5%	4%	2%

消息来源的选择，往往可以体现出媒体报道的基本态度和政治倾向，是新闻框架建构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选择信源，媒体的倾向和观点往往能够隐含其中。观察表 2 可以发现，《纽约时报》援引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占总量的 18%，在所有消息来源中占据了最高的比例。其中，援引美国的美联社及英国的路透社的比例远高于俄罗斯的塔斯社。

此外，基辅街头的抗议群众所说的话也成为高频出现的消息来源。我们知道，在“橙色革命”的高潮阶段，涌上基辅街头的抗议者基本上都是尤先科的支持者，因此引用该消息源具有极大的倾向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刊登于 2004 年 12 月 4 日的 *It Was Dec. 3, but in Kiev, New Year Began Yesterday*（《基辅的新年提前来临》）。这篇报道描述了法院宣判亚努科维奇胜出无效之后基辅街头抗议人群的表现，一位游行队伍中的妇女成了消息源。由于她是坚定的反对派拥护者，因此整篇文章透露出的是对尤先科阵营的支持与赞扬的感情。报道这样描写道：

今年 37 岁的拉里莎哭了。泪水从她的脸庞滚落，沾湿了衣襟。她哭着说：“这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天。我们曾经被压迫，我们遭到非人的待遇。但是上帝帮助了我们，我们终于生存了下来。”^①

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亚努科维奇竞选阵营及其支持者的引语和描写。可以看出，在《纽约时报》关于“橙色革命”的报道中，对亲西

① *New York Times*, 04 Dec, 2004.

方立场的信源引用居多，事件的真实情况及人们的观点态度被平面化和单一化。通过信源的引用，记者早已在事件陈述中含蓄地埋设了隐含的倾向和判断。

2、从主题思路的调整与迁移看，通过有逻辑的衔接与串联，达到阶段命题目的，从而影响受众认知。

“橙色革命”从发生到结束，虽然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但纵观《纽约时报》在此期间的报道，却可以发现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根据对议题内容的梳理，大致可将所有报道样本分为八类：政治人物、国家政府形象、地缘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国内情况、选举、西方支持、文化科技体育教育。各类议题数量分布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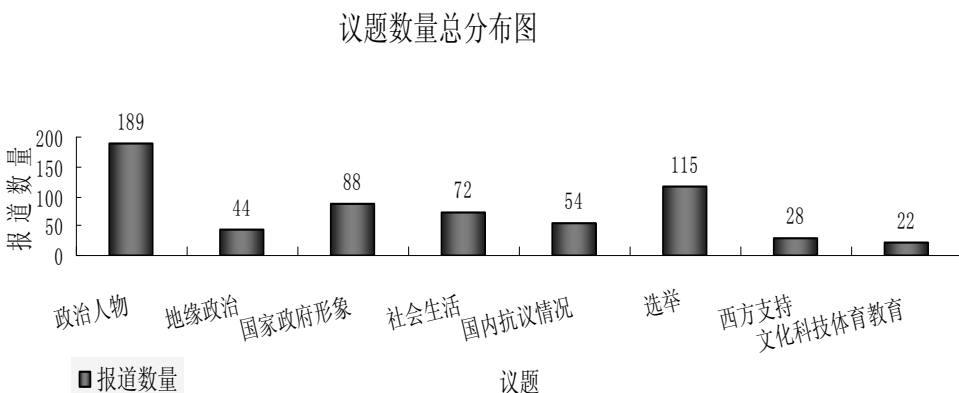


图 7 “橙色革命”报道各类议题数量分布图

由图 7 可知，政治人物和选举分列议题数量的前两位，可以看出在“橙色革命”期间，《纽约时报》对乌克兰的报道主要是围绕三次选举投票的情况以及政治人物的活动展开的，侧重于对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的关注。由于政治人物活动及选举情况对受众而言是与“革命”最直接相关的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描述及媒体定性，能够最大程度地左右舆论走向，并进一步作用于“革命”的发展态势。

为了对《纽约时报》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的议题设置作进一步的考察，笔者又按照三次投票时间，将“革命”时期更加细化为三个阶段，对

议题在各阶段的分布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量，如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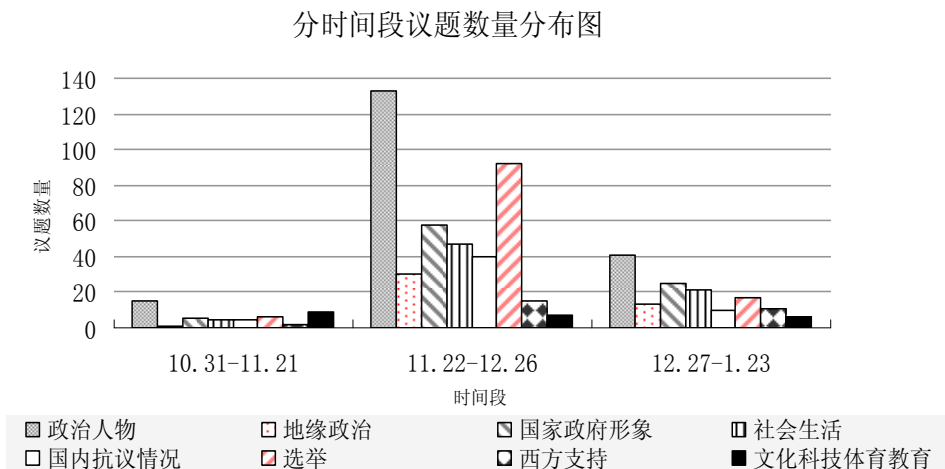


图 8 “橙色革命”报道分时段议题数量分布图

由图 8 可以看出，在“革命”进行的三个阶段中，政治人物议题始终占据了最高的比重。然而，除此议题之外的报道重点在三个阶段却有所不同。第一阶段中，文化类议题占据了较高的比重；第二阶段，有 92 篇文章涉及了选举议题，使其成为除政治人物之外最大的关注点；重选结束后至尤先科入职总统时间段内，关于国家政府形象问题的报道又增长至第二位。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橙色革命”中的报道根据不同时段的特点和目的，经历了一个主题思路的调整与变化过程，现将不同时间段的主题框架及诠释总结如下，如表 3。

表 3 “橙色革命”报道分时段主题分析

报道时段	报道主题举例	主题诠释
2004.10.31 至 2004.11.21	•乌克兰总统大选成为平局，需要在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间进行决选 ^① ； (涉及议题：政治人物、选举)	主题框架：(1) 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将会举行下一轮决选；(2) 亚努科维奇得到库奇马的支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反对派候选人尤先科在首轮投票中领先库奇马所支持的总理亚努科维奇^①；（涉及议题：政治人物、选举） •一名乌克兰人的回忆录：曾被士兵用鞭与枪驱赶^②（涉及议题：文化类） 	<p>（3）库奇马政府实行黑暗统治 隐喻：尤先科支持民主并坚决反对库奇马的暴政，而亚努科维奇或许将延续库奇马的严酷政策，民众应该知道如何投下自己的一票</p>
2004.11.22至 2004.12.2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亚努科维奇通过舞弊手段在决选中胜出^③；（涉及议题：政治人物、选举） •亚努科维奇阵营使用了如威胁选民、提供墨迹隐形的水笔等荒诞的舞弊手法^④；（涉及议题：政治人物、选举） •尤先科被下毒毁容^⑤；（涉及议题：政治人物） •基辅街头愤怒的群众举行抗议游行反对选举结果^⑥（涉及议题：选举） 	<p>主题框架：（1）亚努科维奇在决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2）亚氏在选举中极尽怪诞肮脏的舞弊手段，且有重大的毒害尤先科的嫌疑；（3）群情激愤，选民纷纷涌上街头抗议，场面浩大 隐喻：亚努科维奇的胜出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是违背民意的，因此重选是绝对必要的</p>
2004.12.27至 2005.1.2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重选中尤先科胜出，当选乌克兰总统^⑦；（涉及议题：政治人物、选举） •亚努科维奇起诉，遭遇失败^⑧；（涉及议题：政治人物） •人民欢呼，受库奇马政府黑暗统治十年之久的乌克兰终于看到希望^⑨；（涉及议题：政治人物、国家政府形象） •尤先科将带领乌克兰人民走向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⑩（涉及议题：政治人物、国家政府形象） 	<p>主题框架：（1）尤先科在“公平有效”的重选中胜出；（2）库奇马政府的严酷统治使乌克兰的社会经济情况、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都非常糟糕；（3）尤先科将奉行亲西方政策，用民主与自由的方式管理乌克兰 隐喻：这是“民主自由”在乌克兰的胜利，美国以及欧洲的帮助将乌克兰人民从黑暗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乌克兰将拥有美好的未来</p>

① “Ukraine Vote For President In Virtual Tie”; “Runoff Is Due”, *New York Times*, 2 Nov, 2004.
② “Ukraine: Opposition Candidate Tops Prime Minister”, *New York Times*, 11 Nov, 2004.
③ “Less and Less Speech”, *New York Times*, 31 Oct, 2004.
④ “Premier Claims he’s the winner in Ukraine vote”, *New York Times*, 23 Nov, 2004.
⑤ “Ukraine Awaits Presidential Runoff Result”, *New York Times*, 22 Nov, 2004.
⑥ “Ukrainian Candidate Returns to Hospital for Testing”, *New York Times*, 11 Dec, 2004.
⑦ “Protests Grow as Ukraine Vote Crisis Deepens”, *New York Times*, 24 Nov, 2004.
⑧ “Yushchenko Wins 52% of Vote; Rival Vows a Challenge”, *New York Times*, 28 Dec, 2004.
⑨ “Premier in Ukraine Quits, Giving Way To Opposition Rule”, *New York Times*, 01 Jan, 2005.
⑩ “Finding a Kind of Wealth After Poverty in Ukraine”, *New York Times*, 04 Jan, 2005.
⑪ “Pro-west leader appears to win Ukraine election”, *New York Times*, 27 Dec, 2004.

3、从对政治人物的评价看，选择形容词及描述性语句表达倾向性意见，进行价值判断及归因评估。

虽然《纽约时报》在乌克兰“橙色革命”过程中对不同议题的报道数量一直在根据每个时段的报道重心进行调整，然而政治人物这个议题却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是报道的热点与核心。本研究根据报道中提及某特定政治人物时所使用的形容词及描述性语句的感情色彩，为《纽约时报》对政治人物评价的倾向性进行赋值，“1”为正面评价，“2”为中性评价，“3”为负面评价，统计后得出各政治人物平均得分比较情况，如表 4：

表 4 政治人物评价倾向性得分

领导人	尤先科	亚努科维奇	库奇马	季莫申科	普京	布什
倾向性得分	1.5	2.4	2.7	2	2.7	1.9

由表 4 可知，尤先科的得分最偏向于正面评价或者中性评价，而库奇马与普京的得分则显示出，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几乎都以负面形象出现。

通过考察原始的新闻文本可知，在《纽约时报》对“橙色革命”的所有报道中，该报对尤先科的定性近乎完美。较为多见的形容与描述有“采取平衡外交策略的政治家”（more balanced approach）、“忍辱负重”（deprived of equal media coverage and pressured by the resources of the Ukrainian state）、“抗议群众的英雄”（demonstrators' hero）等等。在 119 篇报道中，仅有 2 篇文章对他的评价偏向于负面。

亚努科维奇亲俄的立场使得他在《纽约时报》上呈现出来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纽约时报》在“橙色革命”报道中将他描绘为一个“急于求成的作弊者”（being touted as the winner in a faulty election）、“尴尬的失败者”（awkward loser）、“不得民心的孤独者”（increasingly isolated, abandoned）、“卑鄙的暗杀计划共犯”（implicated in the unsolved killing of a journalist）等形象的综合体。

对所有提及库奇马的“橙色革命”报道样本进行观察发现，对他的描述

多以“集权腐败”(centralized control and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非法武器交易”(illegal arms dealing)、“前苏联的独裁主义”(post-Soviet authoritarianism)、“暗杀记者”(ordering the murder of Georgy Gongadze)等极端负面的词语进行形容。

季莫申科在此次“橙色革命”中一直是尤先科的忠实拥护者，在煽动民众方面战功赫赫。她虽然也曾被指与乌克兰前总理洗钱案有关联以及贿赂俄罗斯国防部官员等，但是“橙色革命”过程中《纽约时报》的报道却丝毫没有提及季莫申科的去，而是用一种客观中性的语气对她进行描述。所有提及季莫申科的去，对她的去的评价的倾向性都为中性。

从上述的统计得分结果可以看出，普京与库奇马并列“差评”的第一位。“操纵媒体”(state's control over the media)、“干涉别国内政”(meddling in the affair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借反恐名义实行集权统治”(used terrorist attacks as a pretext to centralize power)、“对内镇压迫害”(crackdown on dissent, the prosecution of business leaders)、“民主法治的巨大威胁”(menace to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在《纽约时报》上成了普京及其统治的代名词。在多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该报对普京进行的丑化戏谑描写，如在描述普京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滔滔不绝讲话的场面时称：

在 1 小时 45 分钟后，一个助手试图结束这场发布会，但是普京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并开始自己叫记者起来提问。在两个半小时后，他说他会最后再回答 5 个问题。事实上他最后又回答了多达 11 个问题。^①

从表 4 可以看出，尽管布什在此次乌克兰大选中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对乌克兰施压，并大力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甚至向乌克兰派出了数百名“竞选问题专家”，为亲西方的反对派领袖尤先科出谋划策，但是《纽约时报》从未像评价普京那样指责布什“干涉别国内政”，反而评价布什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言行保持一致的人”(a very decent man and a consistent man)。

① “Getting Personal, Putin Voices Defiance of Critics Abroad”, *New York Times*, 24 Dec, 2004.

三、结 论

坦卡特（Tankard）曾经对框架的这些用法作过一个关于画框的隐喻。他认为，画框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某种材料（material）隔离起来并引起注意。当一幅画被置于画框当中时，不仅可以把画剥离出来，同时也可以暗示观画的氛围。比如一个精心刻做的木制画框和一个大众化的金属框架所引起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同样，新闻媒介通过框架的选择，也可以设置这样的氛围。站在这样的角度，所谓的“框限”自然相当于“画框”的隔离效应。而“架构”一说，显然可以划归为画框的“氛围”隐喻之中。“框限”与“架构”犹如画框的“隔离”和“氛围”作用一样，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一个主内，针对人的认识结构而言；一个主外，以信息交换和互动为意向。前者为后者设置了大致的边界范围，后者又会引领前者如何取舍景象。^①这便是新闻报道框架关于画框的隐喻。它在结构和意义上搭建了公众的认知模式与路径，并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

如果说前述分析在建构的意义上讨论了《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报道框架，那么从横向上看，在主旨内容的意义上仍然有规律可循：《纽约时报》在报道“橙色革命”的过程中运用了“冲突”框架对“革命”事态进行解读。通过提炼“橙色革命”发生过程中的报道主题可以看到，“冲突”作为贯穿于国际政治的一大主题，在《纽约时报》对乌克兰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成为一个较为固定的主题框架，只不过在新闻报道的意义上更加强调如何以“事实”的名义来说服不同的社会群体采取行动。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对“冲突”的核心——政治人物的倾向性历时变化，我们也可以发现，“冲突”框架所力图架构出来的图景以及受众对世界的想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媒体发现“冲突”的其中一方，甚至有可能是媒体支持的一方，很难再调动公众支持、并突破了“冲突”框架为其预设的角色时，媒体也将显著地在保持“冲突”主题不变的情况下调整架构，改变其观点态度，以另外的方式对图景进行描述。例如尤先科在“橙色革命中”曾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民主

^①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的英雄”、“救世主”等等，然而在“橙色革命后”，却由于领导无方、与季莫申科矛盾不断、无法符合西方预期等原因受到了该报的指责，这是《纽约时报》对其“冲突”框架进行调整，并自觉与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国家意识、政治精英利益等保持一致的产物。

通过报道的框架作用，政治世界在新闻中的幻象便形成了。这便是为什么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尼特会说出以下这句话的原因：“新闻中遥远国度里敌人的骇人形象就能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或者是一场军事干预，虽然事后回想起来这里面充满了疑点，例如越南战争。”^①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只有寥寥无几的知交。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个方面或某一片段。和那些起草条约、制定法律、颁布命令的显要人物一样，被要求接受条约的约束、法律的规范和执行命令的人们，也是实实在在的人。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泛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因此，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②

这是著名的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年在他的名著《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写到的。这启发了我们对于真实与“建构真实”的思考。恩特曼(Entman)认为，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③这向我们进一步指明了在当今时代，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大众传播在建构社会图景、塑造公众认知方面的深刻、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中西方新闻界都将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职业准则和新闻工作者不断追求的职业理想，强调新闻应该做到平衡、公正、准确、中立，但在实践

① [美]W·兰斯·班尼特著：《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②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

③ R.M.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p.53.

中，尤其是当新闻客观性遇到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分歧时，往往要让位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利益观。^①这一点即使是信奉新闻客观性的西方媒体在实践操作中也无法超越。国际新闻报道作为牵涉国家利益最为重大的报道类型，尤其脱离不了其国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因此更加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因此，在新闻媒体的“画框”中，民众仿佛生活在与真实可能相差甚远的政治幻象中，并以此作为行动、决策的依据。《纽约时报》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的种种表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颠覆性结果便是极佳的例证。

最后，笔者还希望在此指出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首先，在样本的选择上仅分析了《纽约时报》一家媒体的相关报道，未能将其他在“橙色革命”中表现“突出”的西方媒体纳入考察的范围，对西方媒体反映乌克兰“橙色革命”相关新闻的整体框架建构情况的考察还不够全面；其次，对《纽约时报》有关乌克兰的报道框架对受众认知有何具体的影响、产生何种效果未有涉及，这也很难调查，就研究的完整性而言也是一种缺憾；最后，内容分析研究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只能反映报道框架的建构而不能反映框架形成的深层内部原因；仅能从内容分析中以媒体的新闻文本作为考察基准，从而将媒体层面的原因作为关注点，由此忽略了“橙色革命”报道框架的制度性成因。在后续的研究中，力争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更深层面对有关问题提出更科学、更深入的分析与结论。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related reports and news during the “Orange Revolution” in Ukraine issued on *New York Times*, a major newspaper known as the “mainstream media template” of the U.S., are selected as samples. Framework analysis, which is usually used in Western journalism studies, is employed. To be more specific,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focus and attitudes of this newspaper on related topics of “Orange Revolution” from both

^① 严怡宁：“中国国家利益视角中的日本——环球时报如何报道日本”，载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全球传媒报告——公共形象与危机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转引自谢曦：《〈人民日报〉有关中印新闻的框架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第53页。

surface framework and deep framework, mainly focusing on its methods and framework in constructing images of its political leaders, Ukraine and related stakeholders. This article aims at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n American media's rules in report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exploring its means and strategies in "flexible" 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domestic affairs.

【Key Words】 New York Times, Ukraine, Orange Revolution, Framework Analysis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взяты известные как «шаблон масс-меди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газеты «Нью-Йорк таймс» в процессе освещения событий «оранже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Украи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принятый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метод рамоч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анализ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как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х рамок, так и глубинных, изучаются уровень внимания и процесс оценки отношения газеты к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оранжев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а такж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газет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 рамки сообщений в освещ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имидж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лидеров, Украины и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ых сторон, углубляется понимание законов действия сообщ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ША, и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США сред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и «гибк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ью-Йорк Таймс», Украина, оранж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рамочный анализ

(责任编辑 封帅)

大国地区外交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特兰西瓦尼亚问题（1940-1945）*

梁强**

【内容提要】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争端及大国的介入，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可以看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兰西瓦尼亚两次易主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分析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三次不同程度的介入，有助于揭示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在苏联对外战略中独特的地缘和政治意义，有助于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

【关键词】特兰西瓦尼亚 第二次维也纳仲裁 罗匈和约 苏德关系 苏联外交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5-0061-(26)

引言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对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德国、苏联、英国、美国等主要大国的介入，对20世纪上半叶巴尔干一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洲危机下苏联外交的变革与大国身份的重构研究（1938-1941）”（项目批准号：13CSS02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 梁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助理研究员。

多瑙河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囿于原始档案的缺乏，该问题长期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和东欧档案的大量涌现，研究者们认识到，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不仅对战前苏德关系的演进有着重要影响，是苏联战时制定战后秩序规划的重要议题，也是战后苏英美争夺在罗匈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战后苏东联盟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该问题的研究也因此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首部专题档案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匈罗领土争端与苏联（1940—1946）——来自俄国档案的文件》。这部档案集较为完整地收录了保存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法国的档案，首次公布了苏英美三巨头围绕该问题的不同方案和谈判文件，为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该所下属的“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历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俄国档案文件中的东欧（1944—1953）》和《苏联因素在东欧（1944—1953）》两部专题档案集，其中收录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 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П Р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中的大量解密文件，全方位地反映了苏联对中东欧民族领土争端的介入及其后果，是研究该问题不可或缺的文件集。类似的资料还有，《维辛斯基对布加勒斯特的三次访问：来自俄国档案的文献（1944—1946）》，《苏联与1956年匈牙利危机：文件集》^①。研究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文献资源，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部编辑出版的关于苏罗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档案集。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和罗马尼亚外交部档案为主编

① 上述提及的文献资料的原文信息分别为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енгеро-румынский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спор и СССР 1940-1946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以下简称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М., РОССПЭН, 2000;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Ред.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гг.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7, 1998.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Документы 1944-1953. М., РОССПЭН, 1999, 2002;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Три визита А.Я.Вышинского в Бухарест 1944-1946 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

辑的《苏罗关系：文件与材料（1917-1941）》，披露了很多苏联在罗匈领土争端以及比萨拉比亚问题上的政策和外交细节。以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已公布档案为基础编辑的《危机的一年：文件与材料（1938-1939）》，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基础、中断15年后再次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2、23、24卷，以及雅科夫列夫基金会主持编辑的《20世纪俄罗斯：1941年》，收录了1938到1941年苏联外交部门的绝大多数重要文件，对研究二战前夕苏联在欧洲领土变更问题上的内部考虑和真实立场，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相应的还有《苏联与德国问题（1941-1949）：来自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的文件》三卷本，囊括了苏联外交部门规划战后秩序的文件，从最初观念的产生，到原则的制定，再到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研究苏联对战后欧洲领土划分内部决策不可多得的重要文件集^①。以上述文献为基础，俄罗斯学者伊斯拉莫夫（Т.М. Исламов）在2008年出版了关于该问题的专著《大国强权下的东欧：特兰西瓦尼亚问题（1940-1946年）》，对该问题作了开创性的、全面和深入的分析^②。

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特兰西瓦尼亚社会政治的民族主义分析。如美国学者凯斯（H. Case）利用特兰西瓦尼亚当地文献，综合历史、社会、文化多个角度，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及其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作了专门论述。此外，美国学者帕斯特（P. Pastor）、匈牙利学者德

① 上述提及的文献资料的原文信息分别为Авдеев А, Унгуриану М. Советско-румы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41.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Год кризиса, 1938-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0;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以下简称 ДВП). Т. XXII, Т. XXIII, Т. XXIV. М., Изд-во полит. лит-ры, 1992, 1995, 2000; Решини Л.Е., др. 1941-й год. Кни. 1-2. М., МФД, 1998; Кынин Г.П., 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以下简称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1996, 2000, 2003.

② Исламов Т. М,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силовом поле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0-1946 годы. М., Индрик, 2008. 其他研究成果还有 Исламов Т.М,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СССР и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5-1946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No.12; Исламов Т.М,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омиссии М.М. литвинова, июнь 1944год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2; Сальков А.П. СССР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о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38-1941г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No.3; Сальков А.П.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45-1957 годы)// Славноведение. 2006. No.3.

雷西格尔 (N.F. Dreisziger)、罗马尼亚学者多布林内斯库 (V.F. Dobrinescu) 等, 利用新解密的罗匈档案, 对大国在该问题上的争夺及罗匈两国的反应, 作了精彩的分析^①。中国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较为有限。

本文有两个目的, 一是利用上述新解密的档案材料, 较为详细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兰西瓦尼亚两次易主的来龙去脉, 及其对欧洲国际关系演进造成的影响; 二是通过对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三次不同程度的介入的分析, 揭示特兰西瓦尼亚在苏联对外战略中独特的地缘和政治意义, 以期获得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苏联与第二次维也纳仲裁

罗匈两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冲突由来已久, 但一直属于奥匈帝国内部政治的范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才首次进入国际政治领域。1915 年同盟国向罗马尼亚许诺, 如果它参加对协约国的战争, 战后将获得 1812 年卫国战争中被并入沙俄的比萨拉比亚; 协约国为罗马尼亚参战开出的价码, 则是战后其可以获得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部分匈牙利领土。罗马尼亚最终选择了后者。1916 年 8 月 17 日, 罗马尼亚与英法签订秘密协定, 同意加入协约国作战。后者承诺战后把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等划归罗马尼亚, 并对罗马尼亚的安全承担义务。由于沙俄提前退出战争, 一战结束后, 罗马尼亚不仅获得了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匈牙利 31.7% 的领土, 而且还从苏俄得到了比萨拉比亚, 从保加利亚拿到了南多布罗加。与战前相比, 罗马尼亚的领土扩大了一倍, 人口增至 1800 万, 成为东欧的新兴强国。匈牙利则遭到英法的严厉惩罚, 只保留了历史上一直属于其版图的

^① H. Case, *Between States: The Transylvania Question and the European Idea during World War I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Pastor, "Hungarian-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35-1941: A Failed Rapprochement", *Europe-Asia Studies*, Vol.56, 2004, No.5; N.F. Dreisziger, "Stalin's Wartime Plans for Transylvania, 1939-1945", in D.P. Hupchick & R. W. Weisberger (eds), *Hungary's Historical Legacies. Studies in Honor of Steven B. Vdrdy*, Boulder,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2000; N. F. Dreisziger, "Transylvania in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Hungarian Studies Review*, Vol. XXXVI, 2009, Nos. 1-2; V.F. Dobrinescu, *Romania si Ungaria de la Trianon la Paris, 1920-1947: Batalia diplomatica pentru Transilvania*, Editura Viitorul Romanese, 1996.

28.6%的领土^①。1920年6月4日，特里亚农和约对罗匈两国的领土变更作了最终确认。这样，一战结束后，除了德国、意大利、苏联积极寻求修正甚至推翻凡尔赛体系外，匈牙利、保加利亚也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希望借助新的冲突或战争来实现自己“收复国土”的目的。

特兰西瓦尼亚54%的人口是罗马尼亚人，因此罗马尼亚认为一战后统一该地区具有民族公正的基础。罗马尼亚的许多政治家也都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坚信这里是罗马尼亚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匈牙利人在19世纪首次实现了对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行政管理，他们认为这里是现代匈牙利民族的发源地，其对该地区的领土要求具有历史正当性。此外，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乡村和部分城市，马扎尔人(Magyar, 即匈牙利人)同样占主导地位。匈牙利政治家认为，特里亚农条约将170万匈牙利人居住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匈牙利的战略利益，而且使马扎尔人的文化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②。为此，匈牙利提出了“收回一切”(Mindent vissza!)的口号，罗马尼亚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寸土不让”(Nic'un brazda!)^③。为了捍卫自己新领土的完整，罗马尼亚与英法签订了共同防务协定，匈牙利则寻求德国的支持。1938年11月2日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不久，德、意在维也纳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争端作出裁决，后者被迫将斯洛伐克及喀尔巴阡鲁塞尼亚(Carpathian Ruthenia, 今乌克兰西部)地区割让给匈牙利，此即第一次维也纳仲裁。1939年3月15日，匈牙利占领了上述地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苏两国先后出兵波兰，凡尔赛体系被打破。9月24日红军到达喀尔巴阡鲁塞尼亚后，停止继续进军。10月9日，莫洛托夫向匈牙利新任公使克里斯托弗(Jozef Kristoff)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尝试与匈牙利建立睦邻关系”^④。11月2日，克里斯托弗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В.П. Потемкин)会晤时明确提出，当前状况并不正常，苏匈边界“是一条被严密封锁起来的边界线”，希望苏匈一起对罗马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74-175, 204-206, 209-210.

② N.F. Dreisziger, "Transylvania in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p.88.

③ N. Nagy-Talavera, *The Green Shirts and the Others: A History of Fascism in Hungary and Roman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303.

④ P. Pastor, "Hungarian-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35-1941: A Failed Rapprochement", p.741.

尼亚施压，共同改善边界状况。由于战争刚刚开始形势还不明朗，苏联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并未予以公开支持，而是通过意大利间接表明了其对匈罗领土争端的立场：莫斯科对匈牙利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有自己的基础”。1940年2月匈牙利公开宣布，“不能忍受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匈牙利总统泰莱基(Pál Teleki)也对苏联公使明确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要求，如果盟国赢得战争，我们也将坚持现在的边界，我们将点燃欧洲大火”^①。

瓜分波兰后，苏联开始为出兵罗马尼亚做准备。1940年6月，苏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罗马尼亚的传统盟友法国刚刚投降，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对罗马尼亚提出了领土要求，四面楚歌的布加勒斯特已无力反抗。苏联甚至希望罗马尼亚在这样的绝境中会寻求苏联的保护，成为自己的附庸国^②。但罗马尼亚始终不愿倒向苏联一边，并选择德国作为自己的新庇护国。1940年3月，罗马尼亚主动与德国达成协议，承诺向德国提供更多石油以换取德国的新式武器。希特勒“接纳”罗马尼亚的首要考虑是军事需要。罗马尼亚是德国当时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在战争未全部结束前，德国不能冒失去这个重要的军需原料来源地的风险。苏联在西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也一度让德国感到焦虑。德国军方甚至制定了借道匈牙利占领罗马尼亚，至少武力夺取普罗耶什蒂(Ploesti)油田的计划^③。但柏林也意识到，现在还不能激怒苏联，否则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因此，德国决定做出妥协，不但默认了苏联对1939年苏德秘密协定书中并未提及的布科维纳的领土野心，而且明确告知罗马尼亚，与德国友好的代价之一就是要满足苏联的领土要求^④。在德国的压力下，6月27日，罗马尼亚最终接受了苏联的最后通牒，放弃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从罗马尼亚收复领土的愿望。7月3日，克里斯托弗向莫洛托夫提出，一旦匈罗交战，苏联是否愿意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之间保持中立？后者是罗马尼亚当时唯一的盟友。莫洛托夫以

① ДВП. Т. XXIII. Кн. I. С. 415-416.

② A. B. Ul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3, p. 525.

③ A. Read, D. Fisher,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88, p. 503.

④ N. F. Dreisziger, "Transylvania in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p. 96.

苏南尚未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为由婉拒。但第二天他向克里斯托弗明确表示，苏联支持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计划^①。7月5日，匈牙利副外长向苏联公使表示，匈牙利“要比其他国家更乐意看到”苏联收回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因为这“意味着罗马尼亚领土完整的原则已被废除”。第二天，匈牙利总理也会晤了苏联公使，称他对莫洛托夫推动提升匈苏关系水平的努力感到非常高兴。当天，匈牙利政府宣布军事动员，准备武力“进军特兰西瓦尼亚”^②。

苏匈两国在对罗政策上的不断接近，让德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柏林意识到苏联构建“东方阵线”的努力不会就此打住，必须及早插手，避免苏联对巴尔干事务的介入。匈牙利的战争威胁也让德国担心，东南欧局部战争的爆发，不仅会威胁到其石油供应地的安全，也将破坏德国对苏联突袭计划的实施。希特勒决定立即介入，并以和谈的方式解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在他的安排下，7月初，罗匈两国领导人在慕尼黑就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举行谈判。罗马尼亚不相信德国会再次强迫其作出让步，因此在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谈判失败后，德、意直接介入。8月30日，德、意两国外长在维也纳就罗匈领土争端作出仲裁：将北特兰西瓦尼亚（4.36万平方公里，251万人口，其中匈牙利人130万，罗马尼亚人102万）划给匈牙利，罗马尼亚则保留工业和原料基地所在的南特兰西瓦尼亚（该地区生活着50万匈牙利人）^③。此即第二次维也纳仲裁。

德国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划分主要出于如下考虑：一是罗马尼亚在德国军事战略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新的罗匈边界线将欧洲最重要的能源产地之一的普罗耶什蒂油田留在了罗马尼亚，确保了德国的控制。用希特勒的话说，“石油产地是划分特兰西瓦尼亚的决定性标准”。二是确保罗马尼亚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苏联军队进入比萨拉比亚后，德国主动安慰罗马尼亚，“这些让步只是临时性的”。德、意驻罗马尼亚的武官也承诺，将来会帮助罗马尼亚夺回上述领土，以及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为了让罗马尼亚更加死心塌地

① ДВП. Т. XXIII. Кн. I. С. 415.

②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16-18, 20, 22-24, 26, 33, 34, 36, 39-40, 42, 123.

③ P. Pastor, “Hungarian-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35-1941: A Failed Rapprochement”, p. 743.

的倒向轴心国，罗匈谈判期间德国还恐吓罗马尼亚，如果不接受仲裁，将面临损失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领土的风险，“苏联将夺走它，而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以后仍会提出来”。德、意还向罗马尼亚承诺，只要同意仲裁，两国将对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承担义务。三是利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实现对罗匈两国的同时控制。7月10日，希特勒会见泰莱基时称：“只要领土问题未解决，总有一方会抱怨。但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可能双方都会抱怨诉苦”。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后，罗马尼亚外长发表广播讲话称：“（罗马尼亚）接受种族原则作为领土交换的唯一基础，遗憾的是，这一点被仲裁者们否定了”。匈牙利外长则称：“德国人没有把全部特兰西瓦尼亚交给我们，而俄国人则承认我们所有要求的公平性”。尽管罗匈两国都对仲裁结果表示不满，但如希特勒所料，为了重新占有全部特兰西瓦尼亚，两国都主动倒向了柏林。维也纳仲裁后，罗马尼亚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 II）被迫流亡国外，法西斯主义者安东雷斯库（I. Antonescu）执掌政权，罗马尼亚从此彻底沦为德国的卫星国。9月10日，希特勒召见匈牙利驻德国大使，向其承诺：“尽管已经作出了保证，但不应认为匈罗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边界就是最终的”^①。之后，匈牙利倒向法西斯的倾向也日渐明显。11月20日，匈牙利加入三国协定，同意德国提出的允许匈国内的德国人宣扬纳粹意识形态，将北特兰西瓦尼亚的粮食供应给德国，以及德军进驻匈牙利的所有要求，从而将自己的命运和轴心国绑在了一起。三天后，罗马尼亚也加入三国协定。在德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在9月与罗马尼亚签署克拉约瓦协定，收回了南多布罗加。第二年3月31日，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

二、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与苏德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及其引发的巴尔干地区力量重新分化，对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的苏德关系造成了很大伤害。如果说之前双方在波兰、波罗的海问题上的相互配合，使苏德关系已初具盟友性质，那么现在的形势与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52-54, 69-71, 80, 82, 92, 94, 96, 99, 103-104, 108, 114, 118, 167, 189-191; Советско-румы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41. Т. II. С.395-397.

苏德条约的精神已大大背离，苏德关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紧张”，“1939年的苏德条约已接近于破坏”^①。

8月31日，维也纳仲裁后第二天，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向莫洛托夫口头通报了仲裁决定，称德国“注意到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苏联通报此事。莫洛托夫指出，报刊上关于维也纳仲裁的报道，要比德国大使通报的内容更为详细，而且德国事前根本未同苏联就此举行磋商。舒伦堡解释说，这“只是因为非常着急”解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9月9日，莫洛托夫正式向舒伦堡提出抗议，指出德国近期在许多事情上违背了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的规定^②，包括：（1）5月20日，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向苏联驻意大利大使表示，德、意认为与苏联一起解决巴尔干和东南欧问题是必需的。6月，莫洛托夫就此征询舒伦堡的意见，后者明确表示这是德国政府的观点而非个别外交官自己的意见；（2）关于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苏德必须相互磋商和通报，因为它解决的是苏联的两个邻国之间的问题。但德国只是在仲裁完成后，才向苏联通报了既成事实；（3）在决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命运时，苏联提前向德国作了通报，并在获得其答复后，才采取了实际措施。考虑到柏林的立场，苏联还限制了自己对全部布科维纳的要求，只获取了北布科维纳；（4）在解决北布科维纳问题时，莫洛托夫已经向舒伦堡提出，希望“在合适的条件下”苏联提出南布科维纳问题时，能获得德国的支持。尽管德国并未否决苏联的这一要求，但德、意在第二次维也纳仲裁中对罗马尼亚领土完整的保证，与苏联的上述意愿相矛盾。舒伦堡承认：“柏林并没有对这样做给莫斯科造成的印象作出全面的考虑”，但他坚持德国这样做“并无恶意”。9月21日，莫洛托夫又就上述问题向舒伦堡递交了书面备忘录。莫洛托夫提出，既然德国无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的规定，双方应讨论修改或取消这一条款。舒伦堡赶紧表示，不必这样做，德、意对罗马尼亚领土完整的保证，并不包括苏联对布科维纳的进一步要求^③。

① A. Read, D. Fisher,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pp.504.

②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彼此保持联系，以便对他们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进行协商”。参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227页。

③ ДВП. Т. XXIII. Кн. 1. С. 546-547, 583-584, 616-617, 620-621.

苏联对第二次维也纳仲裁的不满，引起了欧洲外交界的普遍关注。罗马尼亚驻苏联公使在给国内的报告中称，表面上苏联的不满是因为被排除在了仲裁之外，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利益被忽视，实际上是因为苏联在巴尔干和海峡建立独家霸权的梦想遭到了挑战：德国能够通过罗马尼亚到达黑海，而多瑙河现在已成为德国的内河。报告认为，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及其后果，“是斯大林第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败，斯大林习惯于以小的风险获取大的胜利，而这次失败尤为痛苦，因为这是对俄国人一直以来梦想通往南方的打击”^①。上述分析与苏联内部的反应完全一致。9月17日、21日，苏联驻罗马尼亚使馆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中东处的报告指出，德国的这一举措，旨在在本来是匈罗领土的特兰西瓦尼亚，建立“针对苏联和向黑海推进的”前哨基地。9月1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关于苏联军队基本战略部署》的报告指出，当前局势使得苏联的西部边界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苏联最可能的潜在之敌是德国，一旦与其发生军事冲突，“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也不得不卷入与我们的军事冲突”^②。11月4日，苏联驻德国使馆报回的《战争头一年德国的局势》的报告也认为，向匈牙利转交北特兰西瓦尼亚，“扩大了德国的阵线，为它未来与苏联的搏斗创造了新的基地”。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未能解决巴尔干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敌对，反而“给巴尔干埋下了新的地雷，不远的将来这一地雷就会爆炸”，巴尔干已经“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在访德期间再次向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提出了德、意对罗马尼亚的安全保证和南多布罗加问题。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求德、意同意以同样的方式，将保加利亚纳入苏联的安保范围，允许苏联向保加利亚派出军队。在11月13日的会谈中，希特勒指出，罗马尼亚自己向德国提出了安保要求，德国无法拒绝，苏联对保加利亚的安保也要看后者是否愿意。此外，意大利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也很重要。德国的上述态度显然无法让苏联满意。1940年底，在与意大利大使的会谈中，莫洛托夫要求意大利澄清德、意对罗马尼亚的安全保障究竟为何，并当面指出：“德国和意大利对苏联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未与

① Советско-румы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41. С.376, 379-381.

②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93, 97.

苏联磋商)就向罗马尼亚提出了如此广泛的安全保障。”^①

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标志着苏德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苏德在巴尔干和东南欧的竞争和敌对,成为苏德战争前苏德关系中的关键。1941年5月上旬,舒伦堡在与苏联驻德国大使德卡诺佐夫(В.Г. Деканозов)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再次触及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德卡诺佐夫称这是德国“未考虑苏联利益”的例证。舒伦堡则回应说,德国“不会一直完全履行与苏联进行磋商的义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专注于罗匈两国的谈判,“忘了苏联,这也是常有的事”。舒伦堡还对3月4日德国占领保加利亚后苏联发表的声明、3月25日对土耳其的声明,以及4月5日与南斯拉夫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等外交举措提出了抗议。到苏德战争开始前,德国还以此作为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借口。6月21日,里宾特洛甫要求舒伦堡递交给莫洛托夫的宣战照会第四点指出:“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后,苏联的抗议以及在各个领域采取强化军事备战的举措……莫洛托夫访德期间要求对保加利亚的安保”,违背了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迫使德国对苏采取军事行动^②。

罗匈两国倒向德国的动机都一样,即指望德国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做出对己有利的新裁决。但在参加对苏战争问题上,两国的动机并不相同,态度也有区别。罗马尼亚参加对苏作战非常积极,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武力收回二战开始后失去的领土,甚至夺取更多苏联领土作为补偿。希特勒对罗马尼亚也更加重视。在1941年1月31日核定的“巴巴罗萨”计划中,罗马尼亚“积极参战”被列为计划的组成部分。希特勒还主动向罗马尼亚透露了计划的相关内容,以协调对苏备战工作。5月,希特勒对安东雷斯库重申:“要想收回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罗马尼亚除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外,没有别的途径”。希特勒承诺,罗马尼亚有权“占领并管理直到第聂伯河的其他苏联领土”,并称“维也纳仲裁并非最后定论,罗马尼亚可以要求重新讨论这一决定”。苏德战争爆发当天,罗马尼亚迅速向苏联宣战,并参加了对苏联的入侵。苏联对罗马尼亚的立场不抱幻想。1940年底,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拉福林基耶夫(А.И. Лаврентьев)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罗马尼亚

① ДВП. Т. XXIII. Кн. 2. С. 20, 70-71, 264-265, 364-465; Кн. 1. С. 616-617, 620-622.

② Решин Л. Е., и др. 1941-й год. К. 2. С. 167-168, 182-183, 418.

“邀请”德国军队进入的真正原因是，德、意向其承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罗马尼亚收回失去的领土（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1941年4月26日，拉福林基耶夫报回的《1940年罗马尼亚政经形势》的报告再次指出，德意在苏联收回比萨拉比亚以后，就开始扮演使罗马尼亚免于苏联“奴役”的“拯救者”角色^①。因此，罗马尼亚宣战后苏联并未采取抗议或其他举措。6月24日，战争开始两天后，莫洛托夫才会见了即将离开苏联的罗马尼亚公使，称苏联一直对罗友好，不应遭到这样的对待，并表示苏联政府“将记住罗马尼亚站在德国一边参加（对苏联的）战争”^②。

匈牙利在“巴巴罗萨”计划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因此虽然同为盟国，但希特勒在对苏战争问题上，对匈牙利一直保密，担心其向英法泄露有关信息。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致信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Horthy Miklós），正式通报了对苏开战的决定。希特勒在信中并未要求匈牙利加入战争，但霍尔蒂还是主动向德国公使表示：“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已有22年之久……一亿八千万俄国人终于能从二百万布尔什维克的奴役下解放出来”^③。第二天，匈牙利中断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当天莫洛托夫紧急召见克里斯托弗，称苏联对匈牙利没有侵略意图，也没有任何要求，不会抵制其对罗马尼亚的扩张。只要匈牙利不参加对苏作战，战后莫斯科将支持匈牙利收回全部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一直未收到国内的指示，克里斯托弗只是模棱两可地表示，从国内的报道看，匈牙利无意与苏联交战。第二天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的会谈中，克里斯托弗仍表示，匈牙利国内“并未谈论参战问题”^④。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6月24日主动致信匈牙利外交部，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承认了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呼吁匈牙利保持中立，不要站在德国一边对苏联作战。匈牙利与苏联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在是否参加对苏战争问题上，态度明显没有罗马尼亚积极。但布达佩斯又怕置身于战争之外，将来在解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时，会失去希特勒的优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52-54, 99, 103-104; Советско-румы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41. Т.II. С.395, 396-397; ДВП. Т.ХХIII. Кн.2. С.625.

② ДВП. Т.ХХIV. Кн.1. С.5-36, 31-32.

③ P. Pastor, “Hungarian-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35-1941: A Failed Rapprochement”, p.745.

④ ДВП. Т.ХХIV. Кн.1. С.5-36, 31-32.

先考虑，甚至丢掉刚刚得到的北特兰西瓦尼亚^①。就在匈牙利内部在武装中立还是参战之间来回摇摆时，6月26日，红军在反击德国的战斗中，轰炸了苏匈边境小城考绍（Kassa），即科希策（Kosice）。这让参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匈牙利政府决定向议会隐瞒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并以苏联空军轰炸考绍机场为名，促使议会最终通过了对苏宣战的决定。6月27日，匈牙利正式对苏宣战。此前，匈牙利的邻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都已加入了对苏战争。

三、战时苏联对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政策设想

1941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战后欧洲领土划分问题进行了详谈。艾登当天给丘吉尔的报告称，斯大林谈到了他对未来罗匈边界的看法。斯大林认为：“罗马尼亚可以收回被匈牙利占领的领土，作为补偿，罗马尼亚应该允许苏联在其境内部署军事基地”^②。苏联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档案记录中并没有这一点。在苏方的记录中，斯大林只是提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应当通过取得匈牙利的部分地区而向南扩充，而匈牙利由于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但在苏联制定的苏英条约秘密议定书中却明确写道：“关于罗马尼亚，承认必须：（1）为了保证苏联的安全，把多瑙河河口及其三条支流所在的地面划归苏联；（2）把匈牙利境内居民多数为罗马尼亚人的地区划归罗马尼亚。”^③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上述地区显然是指特兰西瓦尼亚。由于丘吉尔和美国的坚决反对，艾登没有同意与苏联签署涉及战后领土安排的条约，因此该议定书并未呈送丘吉尔。之后在与丘吉尔的会谈中，斯大林也未提及罗匈领土争端。

1942年底，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处的文件中，首次详细阐述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历史由来、种族构成和政治力量分布等基本情况。但文

① N.F. Dreisziger, “Transylvania in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p.100.

② W.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III, London, 1948, p.558.

③ 沈志华总主编，张盛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8，531页。

件并未谈及苏联在该问题上的政策立场^①。1943年9月，苏联成立了由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М. Литвинов）领导的“战后秩序与和约问题委员会”。9月9日，李维诺夫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委员会准备研究的问题清单：第十一节是匈牙利，包括苏匈边界、匈罗边界（特兰西瓦尼亚的前途）、匈南边界，建立新政权；第十二节是罗马尼亚，包括罗马尼亚的边界，在罗马尼亚建立新政权，对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监督^②。10月3日，李维诺夫委员会成员德卡诺佐夫，提交了苏联首个有关战后秩序规划的较为广泛的文件——《关于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的备忘录。备忘录首次清晰地阐述了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立场：罗马尼亚战后应恢复1941年的边界，并与苏联缔结相互援助条约，由苏联提供安全保证；匈牙利战后应“被剥夺向北一直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向东直到罗马尼亚的部分——这里生活着近150万罗马尼亚人……作为对匈牙利在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应有惩罚”^③。上述内容表明，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仍遵循1941年斯大林会见艾登时的立场。

1944年1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И.М. Майский），提交了苏联外交部门有关战后规划的最重要文件——《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报告写道：“（罗马尼亚）是我们在（欧洲）东南方向防务的重要因素，其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的边界，对苏联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应签订苏罗相互援助协定。”对匈牙利，迈斯基认为应采取严厉措施：“苏联对建立一个强大的匈牙利不感兴趣。盟国不会忘记匈牙利和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苏联的政策应该是，维护匈牙利的独立，但可能的话要严格根据种族原则缩小其领土。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仲裁决定，应根据对罗马尼亚有利的种族原则重新加以审议。”迈斯基在报告中还认为，只要将罗马尼亚人居住的部分领土交还布加勒斯特即可，不必将整个北特兰西瓦尼亚都交给罗马尼亚，

① ВГАСПИ. Ф.17. Оп.128. Д.316. Л.59-92.转引自Сальков А.П. Проблема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ССР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по анти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коалиции (июнь 1941 г.-май 1945 г.) //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4. №1. С.47.

② 沈志华总主编，张盛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80页。

③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Т.1. С.268-269.

这样才是严格遵循“种族地理”原则^①。

6月5日，李维诺夫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正式报告。报告指出：“（1）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都有充足的理由。（2）能够满足双方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解决方式都会引起另一国，或者是两国的不满。（3）由于当地居民的复杂性，根据种族特征的分割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况且，马扎尔人在数量上远远小于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大约50万，居住相对集中，但居住地远离匈牙利边境）。”鉴于“维也纳仲裁导致的现在这种状况绝对无法令人满意”，因此，应得出如下结论：“（1）维也纳仲裁在政治上是没有效力的决定。它是德意轴心国做出的决定，且决定只对匈牙利一方有利。（2）将全部特兰西瓦尼亚，也就是北特兰西瓦尼亚和南特兰西瓦尼亚都交还给匈牙利，从而恢复一战前的既成事实，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匈牙利从未表现出哪怕是最低程度的与苏联接近的倾向，相反，它参与了所有的反苏阴谋以及对波兰的阴谋。”^②李维诺夫提出两种方案。方案一：“可以考虑将特兰西瓦尼亚交给罗马尼亚，以争取其与苏联保持长期坚定的合作，也有助于罗马尼亚彻底放弃对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要求”。方案二：鉴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二战中都是苏联的敌人，所以两国都“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奖赏”。应建立一个独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国家，它“位于任何的地区联盟和联邦之外，但由苏联庇护”。李维诺夫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应该做出建立独立的特兰西瓦尼亚国家的决定，哪怕是暂时的，直到弄清楚罗马尼亚或匈牙利与我们切实合作的可能性，以及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为止”。李维诺夫认为，这一方案能使苏联在匈罗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通过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监管，使得苏联能够“既对匈牙利，又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从而阻止任何一国加入反对苏联的联盟。这样一种控制将强化我们对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力。”^③

①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Документы. Т.2. С.5, 24, 30, 40.

②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189-190.

③ АВП РФ. ф.0431/п. оп.2. п.10. д.22. л.88, 89.转引自 Исламов Т.М,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омиссии М.М. Литвинова. С.65.

6月8日，李维诺夫委员会举行了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专门会议。李维诺夫提出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四个解决方案：（1）保持现状，直到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他自己也承认，“从政治上讲，维持维也纳仲裁的效力是不适宜的”。（2）特兰西瓦尼亚加入匈牙利，也就是说“把特兰西瓦尼亚交给匈牙利，但这种可能性已被排除”。（3）在一定的条件下，以对罗马尼亚有利的方式解决。这种条件“可以是与罗马尼亚签署双边协议，换取它对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完全彻底放弃，但这（种双边协议）只有在确保我们对罗马尼亚未来政策的某种控制的条件下，才是有可能的”。李维诺夫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担心罗马尼亚政府发生更替，可能会导致其奉行另一种政策。因此，他又提出另一个条件，即苏联在罗马尼亚“获得基地及控制权”。（4）将特兰西瓦尼亚变为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小国家需要庇护者，而苏联是唯一可以担当这一角色的强国”。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将来建立“匈牙利、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联邦”的可能。当然前提是苏联“确定能够影响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政策”^①。

“保持现状”和“将特兰西瓦尼亚交还匈牙利”两种方案被委员会一致否决。会上辩论的焦点，是特兰西瓦尼亚应该独立还是交给罗马尼亚。委员会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在民族自决的条件下，推动特兰西瓦尼亚独立对我们有利。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不会彼此敌视。我们能进一步施展手腕……有机会对罗匈两国同时施压。”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й），更是将该问题与苏联的对德政策联系到一起。他认为：“欧洲的分割对苏联未必有害。我们从敌国割让的领土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利。在对德政策上，我们一直赞成将其分割为几部分，如果我们拒绝分割，我们的对德计划就将遭到破坏。”唯一对此持异议的是前苏联驻法大使苏里茨（Я. Суриц）。他认为，特兰西瓦尼亚独立将导致战后欧洲的分裂和巴尔干化，造成类似于一战后的无秩序状态。而将特兰西瓦尼亚交还罗马尼亚，可以消除苏罗因比萨拉比亚产生的分歧，为“将罗马尼亚和我们的政策牢牢地绑在一起奠定基础”。而且，“比起比萨拉比亚来，特兰西瓦尼亚对罗马尼亚要更具诱惑力”。苏里茨认为，建立匈牙利、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38.

联邦也是不现实的^①。苏联一直对各种“东欧联邦”的设想，保持着高度警惕，匈罗特联邦的建立，显然会使这一设想的实现迈出重要一步。

1944年7月1日，苏联科学院院士塔林（Е.В. Тарле），也就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兰西瓦尼亚不管是在匈牙利还是在罗马尼亚手中，意义都是一样的，即成为这两个亲德国家的附属物……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特兰西瓦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强国对其独立予以正式保证。”如果非要将其交给罗马尼亚或匈牙利，塔林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应将特兰西瓦尼亚交给罗马尼亚，与此同时要求（罗马尼亚）作出某种补偿。”^②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迈斯基最早讨论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时，遵循的还是相对公正的“种族地理原则”。但随着苏军在东欧的大举反攻，苏联外交部门在考虑该问题时，已不再遵循种族原则，也不遵循历史传统，而是以苏联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李维诺夫对此说得很明白，在解决任何领土问题时，都应优先考虑种族因素，但“凡事总会有例外”，“我们不应遵循抽象的原则或我们的意愿，而应考虑现实。”^③此时最重要的现实就是，苏联已开始积极筹建战后对苏联至关重要的环苏安全带，罗马尼亚在这一战略中具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因此，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首要考虑是有利于罗马尼亚。具体来说，就是要以特兰西瓦尼亚为砝码，换取罗马尼亚放弃对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要求，并保持与苏联的紧密合作。此外，苏联还希望利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在罗匈两国间施展权术，从而达到战后同时控制两国的目的。支持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上述政策在本质上和战前德国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41-243.

② АВП РФ. ф.0512.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М.М. Литвинова. оп.4. п.24. д.205.л.1а.转引自 Исламов Т.М,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омиссии М.М. литвинова. С.65.

③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37-239, 241-244.

四、苏联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最终解决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德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德国对苏联的征服已彻底失败，罗匈两国的对苏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罗马尼亚前首相、民族农民党领袖马纽（Iuliu Maniu），反对安东雷斯库继续向苏联派出军队，认为如果不能恢复国家的领土完整，就不能允许付出这样大的牺牲。马纽还担心，即便轴心国赢得胜利，罗马尼亚将来也会被当做一个农业国。而南特兰西瓦尼亚由于相对发达的工业，德国人未必会将其留在罗马尼亚。在马纽的率领下，罗马尼亚各政党联合要求安东雷斯库就以下问题作出答复：如果派兵，“是否获得了能确保我们能收回被夺走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书面文件，类似于一战前决定加入法英俄一边作战时签署的秘密协议”^①。安东雷斯库无法作出回答，最终决定不再向苏德战场派出军队，并默许马纽与盟国展开秘密接触。3月20日，莫洛托夫就此致信英国驻苏联大使卡尔（A.C. Kerr），对盟国与罗马尼亚的联系表示了正面态度。获悉罗马尼亚已经与盟国展开接触的消息后，匈牙利也在3月通过英国向苏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称，匈牙利国内担心战后再次遭遇“新的更严厉的特里亚农式的和平”，“匈牙利被分割”，匈牙利人民因为“其政府的愚蠢行径”而受到惩罚。如果盟国“有意恢复匈牙利的领土完整，使其能够有尊严地参与欧洲的重组”，匈牙利国内将会支持亲盟国的政府上台。但英国未对上述陈述作任何保证。6月7日，莫洛托夫给卡尔的信中指出，在援助德国的问题上，应承担责任的不仅是匈牙利政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匈牙利社会”；匈牙利应该归还其占领的领土；苏联认为，“所谓的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交还匈牙利的仲裁决定……理由并非十分充足”^②。

1943年10月6日，为准备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首次苏英美外长会议，以伏罗希洛夫（К.Е. Ворошилов）元帅为主席的“媾和问题委员会”，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专门报告，详细列出了轴心国及其仆从国的投降条件，其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03, 233-234.

② МИД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Т.1. М, 1983. С.349-350, 358-359, 325, 359-360, 387-389.

中就包括苏联对罗匈两国的军事占领^①。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对相应国家全部或部分领土的占领”和“无条件投降”一起，被确定为盟国与欧洲轴心国成员停战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就赋予了苏联在被占领国家战后政治重建和领土划分问题上的合法权利，也使苏联在与罗匈的停战谈判中，拥有了绝对的主导权。

1944年3月29日到4月12日，苏联与罗马尼亚就后者退出战争举行谈判。罗马尼亚将收回特兰西瓦尼亚放在了最优先位置，要求苏联明确是否准备在停战协定中兑现这一承诺。但在4月12日苏联提交的与罗马尼亚媾和条件中，并未明确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只是宣布废除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同时要求罗马尼亚加入盟国一边作战，恢复苏德战争开始前的苏罗边界，赔偿损失和交还战俘^②。8月23日，罗马尼亚发生政变，安东雷斯库政权被推翻。新成立的萨拉德斯库（C.Sanatescu）政府于25日对德宣战，并派军队协助苏军追击德军。这一举措不但减少了苏联的人员损失，而且为苏军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攻击德国中央集团军敞开了大门，为苏联赢得对纳粹德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很大帮助。而匈牙利此时仍坚持站在德国一方阻击苏军，这对苏联确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立场有很大影响。8月31日，罗马尼亚向苏联驻土耳其大使递交照会，希望立即签署媾和条约。当天，莫洛托夫会见了罗共率领的罗马尼亚谈判代表团，后者希望苏联容许罗马尼亚军队立即向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军发起进攻并占领该地区。9月1日，在与维辛斯基的会谈中，罗共领导人明确表示罗共对罗苏边界没有异议，战后将加入罗马尼亚联合政府并努力限制民族农民党等传统政党的影响力，后者“至今不同意，比萨拉比亚应属于苏联”。9月5日-6日，代表团向苏联递交了罗马尼亚新政府的照会，请求苏联军队配合罗军，对德匈在特兰西瓦尼亚发动的进攻作出反击。但苏方以苏罗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照会在程序上不合法为由，婉拒了罗马尼亚的请求。9月10日，苏方提出了最后的停战协定草案。草案第19条规定，战后“将全部或大部分特兰西瓦尼亚交还罗马尼亚”，而不是“全部特兰西瓦尼亚”。这意味着，战后可能会在种族原则上作对匈牙利

①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Т.1. С.273-274.

②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31-232;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Т.1. С.54.

有利的修正，也使苏联能够继续打“特兰西瓦尼亚牌”为自己谋取利益。但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这是“罗马尼亚能指望的最好方案”，12日，苏罗签署停战协定^①。

苏联承诺向罗马尼亚交还特兰西瓦尼亚，促使匈牙利政府也积极要求媾和。9月9日，匈牙利与盟国签署秘密的预先媾和协定。9月底，霍尔蒂致信斯大林，请求其“原谅我们不幸的国家”，并攻击罗马尼亚在一战后夺取比萨拉比亚，战时还想借助德国从苏联获得更多领土，而匈牙利始终未占领过苏联的国土。至于第二次维也纳仲裁，霍尔蒂辩解说，这只是“致力于结束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骇人听闻的态度。”希特勒获悉霍尔蒂准备与英美秘密谈判后，当面威胁霍尔蒂，如果匈牙利不满足德国的全部要求，罗马尼亚不仅会重新夺回北特兰西瓦尼亚，而且会占领匈牙利更多的领土。罗马尼亚局势突变后，希特勒向匈牙利明确表示，将把全部特兰西瓦尼亚都交给仍旧“合法”的政府^②。但此时特兰西瓦尼亚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了斯大林的手中。后者对霍尔蒂的信未作回复，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立场也已确定。10月11日，匈牙利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预先媾和协定。媾和条件包括：立即对德宣战，废除第二次维也纳仲裁，从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上撤回军队和官员，恢复1937年12月31日之前的边界等。10月14日，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А.И. Антонов)，向匈牙利代表团提出了苏罗停战协定的最后草案。11月27日，匈牙利撤回了自己原来的建议。12月6日，莫洛托夫会见匈牙利代表团，后者再未提及领土问题。1945年1月20日，苏匈签署停战协定^③。

苏联确定对罗匈领土争端的基本立场后，继续利用移交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对罗马尼亚国内政局施加影响。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后，苏军起初同意由罗马尼亚在当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但罗匈民族冲突非常尖锐，再加上战争还未全部结束，安全形势十分复杂。11月12日，苏军决定在特兰西瓦尼亚

①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1. С.59-62, 64-65; Три визита А.Я. Вышинского в Бухарест. С.18, 24, 30, 27-28;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249-251.

② N.F.Dreisziger, "Transylvania in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p.101.

③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1. С.72, 75;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Т.1. С.121-122.

建立军事管理当局。1944年11-12月，在维辛斯基访问布加勒斯特期间，萨拉德斯库多次向其提出这一问题，称这违背了停战协定第19条的规定。维辛斯基回答说，第19条不应被怀疑，“但秩序、时间，以及归还特兰西瓦尼亚的期限应该特别确定”，当地政权的移交应该“有秩序地进行，而非单方面和随意的”^①。特兰西瓦尼亚的移交问题，也引起了苏联国内的关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外长，曾担任过苏联驻罗大使的拉福林基耶夫，要求军方阐明在该问题上的立场。12月31日，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С.М. Штеменко），就此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报告，列出了军方暂不向罗马尼亚移交特兰西瓦尼亚的三个客观因素：（1）上述领土现在是乌克兰第二、第四集团军的大后方；（2）一旦交还，罗马尼亚可能会收购当地的储备粮作为战争赔偿，这在经济上不利；（3）与苏军并肩作战的两个罗马尼亚师“战斗力很差，对他们来说，现在还能够战斗下去的动机，就是将来能够将北特兰西瓦尼亚交还罗马尼亚”。没有这一动机“他们的作战效率将变得更低”。什捷缅科最后认为：“目前移交（特兰西瓦尼亚）……对我们不利。”维辛斯基同意军方的立场，并在报告上批注：“目前还不会提出这一议题”。1944年底，在苏联外交部门的秘密报告中也写道：“移交北特兰西瓦尼亚，应该是对罗马尼亚政府施压的重要杠杆，这不仅体现在根据停战协定履行经济义务的领域，而且也体现在罗马尼亚奉行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领域。”^②

1945年1月初，斯大林会见罗共代表团，并与他们讨论了组建罗共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相关事宜。1月4日，罗共领导人向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后者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阐明：如果成立了这样的政府，苏联将帮助罗马尼亚拥有北特兰西瓦尼亚……（并与罗马尼亚）签署互助条约”^③。这表明，苏联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政策已进入新阶段，（罗马尼亚）国内的政治因素，成为苏联最终解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重要考察指标。利用该问题，苏联在1945年初就已经定好了之后罗马尼亚政治体制的走向。

①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1. С.89-91, 94.

② Три визита А.Я. Вышинского в Бухарест. С.10, 67-68.

③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7页。

1945年2-3月，维辛斯基第二次访问布加勒斯特，要求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Mihai I)解散萨拉德斯库政府，成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亲苏政权。后者拒绝维辛斯基的要求后，罗马尼亚国内的左翼力量发动政变。政变的关键时刻，苏联的一个预备师开进布加勒斯特，米哈伊一世的王宫被坦克包围，国王被关在房间里，给他的考虑时间只有两小时。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还获得特别授权，在国王拒绝苏联的要求后可以对其实施逮捕^①。米哈伊国王最终同意了左翼力量的要求。3月6日，罗马尼亚建立了由共产党主导的新政府，民族民主阵线领导人格罗查(P. Groza)成为新总理。苏联很快对罗共的胜利作出了奖赏。3月7日，苏军将北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权正式移交罗马尼亚，当地一度颇有声势的要求独立或并入苏联的政治运动也销声匿迹。

苏罗停战协定和苏匈停战协定，只是苏联与罗匈达成的安排，两国领土争端的最后解决，还需在战后和会上经其他参战国同意后，以对罗匈和约的方式获得最终合法性。苏联将罗匈领土争端看做是涉及苏联边界和战后安全的重要因素，因而对罗匈和约的签署非常重视。在1946年到194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曾经六次讨论过该议题^②。

而英美更关注的是对意和约，因此除了利用罗、保、匈政府向苏联施压外，在整个和会进程中并未对苏联设置太多障碍。1946年5月7日，巴黎外长会议就对罗和约作出以下决定：废除维也纳仲裁；恢复1938年1月1日的匈罗边界(即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边界)；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留在苏联；罗保边境按照1940年9月克拉约瓦协定的规定，将南多布罗加划归保加利亚。

在苏联的坚持下，对匈和约被放在对罗保两国和约之后再讨论，这样，对罗和约中规定的罗匈边境就强加给了匈牙利。对匈和约，基本上沿用了苏匈停战协定的条款。相较于战前，匈牙利失去了近三分之二的领土和67%的人口，其中超过30%的人口历史上一直属于匈牙利。1947年2月10日，罗

① Loth Wilfrieds,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1941-1955*,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45.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повет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40-1952 гг. Т.3.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432, 462, 465, 483.

匈和约正式签署。1948年1月24日，罗匈签署友好条约，在双边层面确认了和约中对两国边界的划分。

结 论

20世纪上半叶特兰西瓦尼亚三次易主，是国际关系中大国利用小国的领土争端获取自己的地缘利益，进而实现对相关国家控制的典型例子。无论是一战前的协约国与同盟国，还是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时的德意，以及战后罗匈和约谈判中的苏英美，在决定特兰西瓦尼亚的归属时，都未遵循种族地理和历史传统的公平原则，而是出于各自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的需要，进行利益交换。特别是德苏为了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对外战略，有意将特兰西瓦尼亚作为同时对罗匈两国施压的杠杆，以便在两国冲突中扮演永久的仲裁者的做法，更凸显了19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的特点。罗匈两个当事国虽然使尽解数，不停地在大国间纵横捭阖，但所有的努力最终还是无济于事。1947年巴黎和约再次认可了1920年特里亚农和约就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作出的首次国际裁决。由此造成的边界划分深深地伤害了当地的民族主义。罗匈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不但没有获得调和，反而更加深化，成为日后影响两国关系和地区稳定的重要诱因。

匈牙利国内始终不认为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已经解决。1945年6月23日，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M. Rákosi）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信息处的讲话中称，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是非常病态的”，因为“罗马尼亚是希特勒的附庸国，最终却获得了生活着超过100万匈牙利人的领土”^①。罗匈和约签署后，匈牙利文学界在政府的鼓励下，创作了大量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历史的作品，怀古喻今，表达对“失去”特兰西瓦尼亚的悲痛心情。这招致罗马尼亚的强烈不满，一度召回驻匈大使以示抗议。1956年9月，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匈牙利党报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体制下”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民族沙文主义”予以强烈抨击。文章引发了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指责匈牙利“公开呼吁修正特兰西瓦尼亚

^① Трансиль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С.312.

问题”。苏联外交部就此提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罗匈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立场》中指出，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证实了“在匈牙利的部分阶层、首先是匈牙利知识分子当中，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报告称，罗马尼亚总理乔治乌-德治(G. Gheorghiu-Dej)不止一次地向苏联外交官抱怨，包括拉科西在内的匈牙利领导人在有关罗匈边界问题的讲话中仍持模棱两可、甚至是民族主义的态度。报告还引述匈牙利共产党高官的话称，布达佩斯有权获得特兰西瓦尼亚，失去它是因为在二战中最后一个脱离德国而受到了“惩罚”^①。面对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罗马尼亚在 50 年代末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民族统一”运动，试图将占全部人口 10%的少数民族同化，其中就包括 7.7%的匈牙利人。这一运动成为罗马尼亚内部民族冲突的导火索。1987 年，在特兰西瓦尼亚布拉索夫市，当地的马扎尔人与罗马尼亚人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成为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的前奏。1990 年 3 月，当地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再次发生暴力冲突，罗匈两国关系也因此一度恶化。在 2010 年春的议会选举中，匈牙利右翼党派又散发特里亚农条约之前的匈牙利地图，要求将生活着 200 万匈牙利人的领土收回。罗马尼亚则坚持认为这是其国内问题，对匈牙利提出的所有改善其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待遇和修正边界的建议都予以反对。直到 2013 年 2 月，两国还因为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在欧盟内部发生激烈的外交冲突，相互威胁召回大使^②。这充分说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领土争端一旦从双边层面上升至国际层面，将给当事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苏联由于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有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三次国际裁决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一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不但没有能力对东欧的边界划分施加影响，而且连自己的领土也无法保全，最终失去了比萨拉比亚，并被英法排除在凡尔赛体系之

① АП РФ. Ф.3. Оп.64. Д.484. Л.37; АП РФ. Ф.077. Оп.37. Папка 191. Д.38. Л.55-60. 转引自Стыкплин А.С. Вопрос о венгерском меньшинстве в румыни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ередины 1950-х годов// Славноявновведение. 2005. №.3. С.88-89.

② Семущин Д. "Война флагов" в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ежду Венгрией и Румынией. <http://www.regnum.ru/news/1623491.html>, 11.02.2013

外。1940 年通过与中东欧国家一起对凡尔赛体系进行修正，苏联不但恢复了一战前沙俄时期的西部边界，也间接影响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新的领土划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制定了新的政策，并通过战后和会，完成了对该地区领土边界的重新划分。这一次，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解决，完全遵照苏联的意愿和步骤进行。苏联在西部的边界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巩固。通过对罗匈和约的主导，苏联重新回归到了建国之初它坚决反对的欧洲秩序，并以实际行动表明，它已完成了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到维护现状国家的转变，从一个革命国家到保守国家的转变。就像当初凡尔赛和约的制定国不允许苏联对凡尔赛体系有任何反对一样，后者现在也不允许罗匈对苏联制定的巴黎和约及其背后的雅尔塔体系有任何反对和修正。战后罗马尼亚竭力希望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正常化，苏联也不希望盟友间的分歧扩大，影响整个苏东阵营的团结，因而在罗匈争端中努力压制匈牙利的诉求，增加了匈牙利对苏联的不满情绪，为 1956 年匈牙利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Abstract】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Romania, Hungary and involvement of great power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newly declassified archives, it is clear to observe the evolution of Transylvania issue and also its influences. Analyzing the Soviet Union's three involvements, to different degrees, in Transylvania issue will help to explore its uniqu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oviet foreign strategies, and also leads us to understand comprehensively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ies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Transylvania, Vienna Diktat, Romania-Hungary Treatment, the S.U.-Germany Relations, the Soviet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Румынии и Венгрии в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и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XX в. На основе изучения новых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архив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тонкости и влияние перехода двух раз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в другие руки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Анализ трёх раз различной степени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вопрос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помогает выявить уникальн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опроса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а такж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я, Второй Венский арбитраж, румыно-венгерский договор, советско-немец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

孙德刚**

【内容提要】对于长期遭受西方战略围堵与遏制的苏联和俄罗斯来说，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不仅有助于其突破战略封锁、维护其作为一个陆权大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是苏（俄）在中东实现政治抱负和奠定大国地位的基石。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是苏联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也是冷战后俄罗斯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四十年来，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经历美苏冷战、苏联解体、俄罗斯再度复兴和中东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具有稳定性；同时受苏（俄）战略文化、中东现实利益、两国特殊关系以及苏（俄）财政状况的共同影响，其军事基地的规模和功能具有变化性，是苏（俄）在中东权力投射、维护海外利益、参与中东事务的依托，也是苏（俄）权力兴衰的“晴雨表”。2011年叙利亚陷入乱局以来，俄叙特殊关系经受了考验，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关键词】俄罗斯中东政策 苏联与叙利亚 军事基地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5-0087-(33)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项目批准号：10JJDGJW022）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研究”（项目批准号：13CGJ04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和上海高校一流学科（政治学）资助。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言

从沙俄到苏联，俄国从未停止在海外谋求军事基地的努力。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海军战略主要表现为“近海防御”，强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占据海军优势，同时支持俄国的陆军力量。一战后，由于苏联长期是被美国、欧洲和日本围堵的陆上大国，其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高，很难像海洋大国那样在海外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基地。^①二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成为影响苏联对外军事战略设计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如何突破西方海权大国对苏联这一超级陆权大国的战略遏制，成为长期困扰苏联领导人的难题。冷战初期，美国依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等多边联盟体系，以及美日、美韩、美菲、美澳新等亚太双边和三边联盟体系，基本实现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战略围堵，并通过在盟国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构筑了针对苏联的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东南亚—东北亚的“U形”战略包围圈。而相应的，苏联的对外军事战略总体上以欧亚大陆为重点，奉行积极防御战略。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随着苏联国力的上升，美苏攻防态势发生变化。为突破西方海权大国在黑海和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围堵，苏联政府开始强调：苏联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是苏联重要的周边地区，苏联理应在地中海—中东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中东与芬兰、波罗的海、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一样，是苏联的近邻，关系到苏联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古巴导弹危机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触动很大，他们深刻意识到海外军事力量在美苏意识形态博弈中的重要作用。为缩小同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苏联一方面发展战略武器，另一方面发展远洋海军，试图使苏联的军事力量能够投射到除南美洲以外的所有大洲和大洋。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乃至对西方海权大国实施“反包围”，无疑成为苏联领导人重要的战略选项。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东地区成为苏联对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为加强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苏联从黑海舰队中分出地中海特遣队，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和直升机母舰在内的地中海特遣队，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执行巡逻任

① Jeremy Black, *Naval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202.

务，强化军事存在。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地中海特遣队执行的巡逻任务不断拓展，苏联开始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塞得港以及叙利亚拉塔基亚港建立临时性休整设施，同时强化在也门、索马里、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基地，就此逐步形成了苏联在中东军事基地网的雏形。^①

叙利亚军事基地是苏（俄）在中东军事基地部署中的关键一环。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苏联在也门、埃及、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部署最终以关闭告终，而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不仅经受了重大国际和地区事件的考验，而且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保留了下来？第二，为什么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规模和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差异性，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迄今为止，学界尚无成果专门论述苏联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部署问题。由于内容敏感和材料稀缺，国内外关于苏联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研究的成果主要散见于俄罗斯外交政策、苏联与中东国家关系等著作和论文中。俄罗斯、美欧和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媒体曾就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问题有过不同深度的报道，但总体上比较零碎。现有成果主要探讨苏（俄）在东欧、古巴、越南和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基地，对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总体上是一笔带过。^②本文通过对各种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苏联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延续与变化的主要因素，并结合其军事基地部署的三个阶段加以实证检验。

① John C. Campbel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401, May 1972, pp.128-129.

② 参见 Marcel de Hass, *Russia's Foreign Securit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Putin, Medvedev and beyo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Mark Smith, *Russia & the Middle East*, Camberley: Defense Acade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02; Roland Dannreuther,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Hannah Carter,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Middle East's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22-41; Nicholas Kosturos, "What Drives Russia's Unrelenting Position on Syria?",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ugust 14, 2012,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issues/2012/08/pdf/syria_russia.pdf;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опровергают эвакуацию с военной базы в Сирии, но защищать ее флотом не будут. 24 августа 2012. <http://www.newsru.com/world/24aug2012/tartus.html>; 刘侶萍、崔启明：“俄罗斯海外军事存在的现状及前景分析”，《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等。

一、影响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假设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中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一度成为其在中东军事存在（埃及、叙利亚、也门、索马里、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重要一环。21 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是其在独联体成员国以外留下的唯一一处军事基地。与苏联在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军事基地最终被迫关闭的命运不同，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部署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其规模和功能又不断在变化。

本文认为，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稳定性与规模和功能的变化，与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息息相关，叙利亚军事基地始终在苏（俄）的中东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按照规模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将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部署划分为三个阶段：支持苏联意识形态斗争阶段（1972 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彰显苏（俄）政治大国地位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90 年代末）和保护俄罗斯现实利益阶段（21 世纪初以来）。具体来看，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

因素一：苏（俄）战略文化

大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动因具有多重性，其中战略文化因素居于首要地位。这里的战略文化因素受进攻性战略思维、历史上进攻性与防御性战略的经验习得和领导人个性特征的共同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攻性战略文化主导型国家更容易选择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防御性战略文化主导型国家很难选择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扩张性大国更倾向于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内敛性大国则不大愿意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苏（俄）战略文化总体上属于进攻性战略文化，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苏（俄）战略文化的进攻性程度不同。当领导人威胁认知增强时，其往往奉行更加明显的进攻性政策；当领导人威胁认知减弱时，其往往奉行防御性政策。苏（俄）领导人的安全威胁认知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第一，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受到威胁和进攻，具有天生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历史上蒙古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入侵，使俄罗斯对自己的安全处境一直怀有悲观认知；第二，为消除威胁、确保国

家安全，俄罗斯具有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缓冲区的偏好，如苏联时期的中欧和东欧，苏联解体后从白俄罗斯到里海再到中亚地区独联体成员国，都是俄维护自身安全的缓冲地带；第三，苏（俄）认为本国是“双头鹰”，应成为连接与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领导地位，不能接受他国的支配，俄罗斯的崛起使之成为继东罗马和西罗马衰亡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但阻止苏（俄）崛起的敌人始终存在着；第四，当国力提升、外部安全威胁增强时，苏（俄）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往往彰显威权传统，行政部门拥有较多决策权，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偏好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政策。^①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国力上升和美苏全球争夺升级，苏联开始奉行更加明显的进攻性战略，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成为苏联争夺中东、削弱美国影响力的重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奉行收缩战略，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主要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21世纪初以来，随着俄罗斯国力恢复和安全威胁认知的增强，其进攻性战略文化进一步彰显，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有一个从几近废弃到一度重新发挥作用的过程。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认知首先来自北约。冷战后，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四国形成的疏离甚至反俄的阵营“古阿姆”（GUAM），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安全考量。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担心西方利用这些国家在俄周边地区策划“颜色革命”，建立军事基地，破坏俄周边的安全与稳定。普京在谈到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时指出：“至于颜色革命，我想事情很清楚，这是颠覆社会稳定的有计划的阴谋。”^②普京认为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只不过是美国和西方损害俄利益、推行政权更迭的手段罢了。在地中海地区，俄罗斯担心，北约自实施地中海对话伙伴国项目以来，已经将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等纳入到西方战略发展轨道，使俄试图恢复苏联时代在中东的那种影响力更加困难。^③因此，为制衡美国和北约从波罗的海、波兰、黑海、中亚等不同

① Marcel de Hass, *Russia's Foreign Securit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Putin, Medvedev and beyond*, p.3.

② Nicholas Kosturos, "What Drives Russia's Unrelenting Position on Syria?",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ugust 14, 2012, p.3.

③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 Naval Base Tartus", *Backgrounder*, July 31, 2012, p.4.

方向向俄罗斯传统利益地区渗透，俄罗斯政府宣布，在 2020 年之前将投入 1400 亿美元重建俄海军，增加 51 艘现代军舰和 24 艘潜艇。^①为应对美国和北约在俄周边地区部署军事基地，俄罗斯一方面说服邻国不要将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如 2012 年普京派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尼古拉·马卡罗夫将军访问芬兰，警告芬兰不要与北约走得太近，并强调芬兰一旦加入北约将被视为对俄的直接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俄罗斯开始恢复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的功能，使之成为俄制衡外部威胁的抓手。

其次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中东—地中海地区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南部边陲的稳定。后冷战时期，中东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现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同里海沿岸国家和中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贸和文化联系，从而间接影响到了俄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切断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与车臣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是俄反恐、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从 1994 年开始，俄军发动了两次针对车臣分裂武装的军事行动，6600 名俄罗斯士兵阵亡，但车臣局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截至 2007 年，俄罗斯仍有 10 万军队驻扎在该地区。^②俄罗斯抓住叙利亚这一俄在中东最后的战略据点，客观上有利于切断车臣反政府武装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金融和人员联系。

因素二：苏（俄）在中东的现实利益

除战略文化因素外，俄罗斯在中东现实利益的变化，也影响其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规模和功能的变化。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经常会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和高昂的经济成本，决策者一般会进行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即军事基地保护的国家利益应大于维护军事基地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军事基地保护的现实利益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不同类型，但最主要的现实利益包括四类：军火利益、经济利益、能源利益和侨民利益。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苏联的贸易伙伴主要是“经互会”成员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思想主导下，苏联未与中东国家建立密切的经贸往来。20 世纪 60

① Nicholas Kosturos, “What Drives Russia’s Unrelenting Position on Syria?”, p.2.

② Michael Scheuer, *Marching toward Hell: America and Islam after Iraq*,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p.168.

年代末开始，随着苏联军工企业的发展和经贸实力的增强，中东阿拉伯国家成为苏联重要的军火买家，也是苏联重要的贸易伙伴国，苏联开始重视中东在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国力衰弱，其中东经贸中的比例下降，俄罗斯更加关注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合作，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的规模和影响力也随之下降。

21世纪初以来，中东再次成为俄罗斯的“大周边地区”，成为俄海外利益较为集中的地区。俄罗斯的中东利益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第一，维护其中东的传统战略利益，确保地中海—黑海航线对俄黑海舰队和商船开放，维持俄在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第二，恢复俄在中东的外交影响力，参与中东政治事务，避免欧盟或者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第三，增加俄罗斯在中东军火贸易中的份额，扩大俄军火利益；第四，确保俄罗斯在中东的经济、能源和商贸利益。^①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军事基地，目的在于帮助俄恢复其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现实利益。

因素三：苏（俄）叙特殊关系

从二战后苏联在中东埃及、也门、索马里、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最终关闭的案例可以看出，东道国的接受程度对于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至关重要。东道国允许使用国在其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往往出于不同的动机，如希望在同邻国的安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大国的经济或军事援助，加入某个政治或军事集团，或是因为受到大国的占领、殖民和胁迫而被迫接受其部署的军事基地等。20世纪70年代，由于埃及在战略上对美国“一边倒”，并反对苏联在其境内部署军事基地，迫使苏联将基地迁至叙利亚。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经历长达40年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叙利亚一直承担苏（俄）在中东忠实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在安全上依赖苏（俄），包括冷战时期制衡以色列，20世纪90年代制衡美国—土耳其—以色列三角联盟，

^① Jack Covarrubias and Tom Lansfor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Opposition and Support for US Foreign Polic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7, pp.70-71.

“9·11”事件后制衡美国对叙利亚的威胁，以及2011年以来叙利亚陷入内乱后应对北约成员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恐吓、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脆弱的安全环境迫使叙利亚始终将俄罗斯视为平衡以色列、美国、土耳其和叙反政府武装等外部和内部安全威胁的主要依靠力量；引入苏（俄）军队、欢迎其部署军事基地，成为叙利亚一贯的外交政策。两国特殊关系长期保持稳定，是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延续近4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素四：苏（俄）财政状况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经费问题，换言之是财政问题。海外军事基地的费用包括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前者包括海外基地的设施建设与维护费用，以及支付东道国的基地租金和许可费；^①后者包括对东道国的经济援助、贸易补偿和市场准入等所间接产生的费用。冷战时期，为维持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每年要花费70亿美元的直接费用。1976-2007年共31年时间里，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力量（包括和平时期部署军事力量和发动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等）的累计开支高达6.8万亿美元^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雄厚的财政资源能承担这一巨额费用。

财政状况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亦产生影响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苏联经济高速增长，财政状况良好，为苏联在叙利亚部署军事基地提供了充分的财政支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关闭了在古巴、越南等地的军事基地，主要是因为其财政状况恶化，海外军事基地难以为继。俄罗斯于1991年12月独立后，财政状况处于极度恶化状态。1992年，GDP比前一年下降19.5%，1993年下降12%，1994年下降15%，1995年下降4%，1996年下降5%，直至2005年前后，俄罗斯的GDP才恢复至1991年水平，GDP多年下滑造成俄罗斯财政状况的极度困难。^③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费投入不足，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一度处于半废弃状态。

① James R. Blaker, *United States Overseas Basing: An Anatomy of the Dilemma*, New York and London: Praeger, 1990, p.98.

② Roger J. Stern, “United States Cost of Military Force Projection in the Persian Gulf, 1976-2007”, *Energy Policy*, 7 January 2010, p.1.

③ 刘倡萍、崔启明：“俄罗斯海外军事存在的现状及前景分析”，《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第46页。

近年来，随着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复苏，俄罗斯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俄遂开始恢复在叙利亚军事基地设施的运作。2007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公布《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方针》（*Concept of Long-term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为未来俄罗斯经济振兴制定了蓝图，即俄罗斯将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行列。^①2011年，在普京的建议下，俄罗斯成立21个工作组，制定了2020年俄罗斯战略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从宏观经济、卫生保健和投资等领域，制定了俄罗斯经济全面复兴的宏伟蓝图。受经济复苏的拉动，近年来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府宣布大幅增加军费。自2012年开始，俄宣布未来十年军费总额达7120亿美元，2013年军费将比2012年增加19%。俄罗斯还计划在2012-2028年间，投入130亿美元用于研发作战和侦察无人机。^②2007年，梅德韦杰夫在访问新加坡时曾经登上俄罗斯战舰并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计划增强在世界各大洋的海军存在，增加海军巡逻的频次。2012年5月，梅德韦杰夫再次表示，俄罗斯对于恢复苏联时期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拓展全球力量投射能力感兴趣。在谈到俄罗斯恢复在海外军事基地的具体内容时，梅德韦杰夫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希望隐瞒事实，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它们的名字。”^③近年来，在财政状况改善的背景下，俄有意将叙利亚塔尔图斯打造成前沿行动基地，依靠小型、灵活、快速的原则实现军事力量部署，为执行巡逻、护航、演习等具体任务提供后勤保障、维修、加油等服务。

为检验上述四个假设，下文将1972年以来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部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考察上述四个因素在其基地部署中的作用。

① Andrew Kuchin, Amy Beavin, and Anna Bryndza, “Russia’s 2020 Strategic Economic Goals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SIS*, July 2008, p.1.

② “Russia Seeks to Set up Naval Bases Abroad”, *The Guardian*, July 27, 2012; “Russia to Build Military Bases Abroad?” <http://www.therightperspective.org/2012/07/27/russia-to-build-military-bases-abroad/> 另可参见 Van Hipp, “Russia’s Putin Is Making His Moves in Syria and Beyond”, June 27, 2012,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2/06/27/russia-putin-is-making-his-moves-in-syria-and-beyond/>

③ “Overseas Naval Bases”, May 31, 2012, <http://www.russiadefence.net/t1951-overseas-naval-bases#19818>

二、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一阶段 （1972 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与美国及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联盟体系相比，二战后苏联在与西方阵营的安全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如西欧、地中海北部、亚太地区战略要地、港口和水域均处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控制之下。二战后，世界主要工业国和资源大国几乎全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包括欧洲、日本和中东产油国等。为了克服在美苏安全博弈中的不利地位，苏联一方面打着“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旗号，呼吁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不要将军事基地租给美国；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苏联也效仿美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系列军事基地。中东成为苏联突破美国军事基地围堵、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供全球力量投射能力的重要“大周边地区”。

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军事基地的构想可上溯到 1966 年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之后。1971 年 2 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苏联，寻求苏东集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叙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开始升温，埃及和叙利亚成为苏联在中东—地中海地区的两大战略支柱。此后，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一笔 2.3 亿美元的军售合同，苏联还派出上千名军事教官和顾问，取得了使用叙利亚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两处海军基地的权利，其中塔尔图斯港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北 250 公里处，是该国第二大港口，也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军民两用深水港，可停靠 12 万吨以下的油轮。尽管该港口属于军民两用型，但是商船占塔尔图斯港停靠船只的主要部分。^①

1972 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宣布驱逐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并关闭苏联在埃及部分军事基地的同时，也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施压，要求叙同埃及一道驱逐苏联顾问，建立开罗（埃及）—大马士革（叙利亚）—利雅得（沙特）阿拉伯反以、反苏轴心。然而，叙利亚政府对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倡议不感兴趣。阿萨德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恶化，反而进一步改善。1972 年 7 月，阿萨德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价值 7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苏联在叙

^①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 Naval Base Tartus”, *Backgrounder*, July 31, 2012, p.1.

利亚的军事顾问人数从 1972 年 7 月底的 400-700 人迅速上升至 1972 年夏末的 3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埃及撤出的军事顾问。^①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顾问对叙利亚军事工业和军事体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叙利亚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从此沿袭了苏联的军事制度。从 1972 年中期到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苏联共向叙利亚提供了 750 辆坦克、100 门火炮、“蛙-7”地对地导弹等。1974 年，叙利亚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首个获得苏联“米格”-23 战斗机的国家。^②此后，苏联海军部队不断进驻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这两处海军基地。苏联还使用了叙利亚的提亚斯（Tiyas）和乌姆阿提贾（Umm Aitigah）两个军用机场，苏联海军侦察飞机获准利用这两个机场侦察地中海地区，并部署了 IL-38 反潜巡逻机。^③

1977 年，埃及在战略上彻底放弃苏联、倒向美国，苏联与埃及的关系持续恶化，埃及总统萨达特要求苏联关闭在亚历山大和马沙马特鲁（Mersa Matruh）的军事基地。由于苏联在中东—地中海地区丧失两大支柱之一的埃及，被迫于当年将埃及的军事设施转移至叙利亚塔尔图斯军事基地，并在新基地成立了第 229 海军与领港船支援师（Estuary Vessel Support Division），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升级为第 720 后勤支持站。^④苏联黑海舰队与北方舰队组成地中海特遣队并在地中海地区执行任务后，塔尔图斯军事基地代替埃及亚历山大军事基地，成为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设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苏联关闭在埃及的军事基地后，叙利亚一直欢迎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在其境内部署军事基地。这主要是因为，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在国家安全和经济援助方面双重依赖苏联，加上阿萨德政府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强化了两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亲合力。叙利亚欢迎苏联建立军事基地，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维护阿萨德家族及人口占少数的阿拉维派在叙利亚的统治，应对穆斯林兄弟会、库尔德人及逊尼派的权力挑战；

①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Bashar al-Asad and Modern Syr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1.

②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London: Macmillan, 1991, pp.37, 88.

③ Robert E. Harkavy, *Bases Abroad: The Global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2.

④ Olga Berezintseva and Konstantin Lantratov, “Russian Fleet Worries Israel”, *Kommersant*, August 7, 2007.

第二，获得苏联的先进武器装备，以平衡以色列的威胁；第三，叙利亚可以维持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可以影响黎巴嫩和哈马斯等阿拉伯力量；第四，在 1979 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定》、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后，叙利亚可提升在阿盟中的领导地位；第五，利用苏联及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平衡西方的压力，阻止西方对其实施政权更迭。

在苏联军事基地的支持下，叙利亚军事影响力上升，迅速增强了对黎巴嫩的控制能力，试图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建立缓冲地带。1976 年 6 月，在黎巴嫩执政的马龙派政府请求下，叙利亚军队首次进入黎巴嫩，以平息黎巴嫩内战。大约 4 万人的叙利亚军队驻扎在黎，扩大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苏联对叙利亚在黎巴嫩扩展势力和部署军事力量深表忧虑，主要是担心此举可能引发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但由于苏联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叙利亚在中东的战略地位，特别是 1977 年开始，叙利亚共产党 9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 6 人在叙利亚复兴党政府中担任立法委员和部长等要职，叙利亚共产党与叙利亚复兴党组成了“全国进步阵线”^①，使苏联领导人认为叙利亚是“进步国家”，已经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与埃及萨达特政府执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色列的“投降主义”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故强化了对叙利亚的援助。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部署，尤其是部署的军事顾问和防空系统抑制了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决心。因此，阿萨德总统多次赞扬苏联是“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是我们斗争的重要支持者和我们权利的重要维护者”。^②

冷战时期苏联在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被称作“补给基地”，旨在为苏联黑海舰队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地中海特遣队的军事活动提供后勤补给与维修服务。苏联以塔尔图斯军事基地为纽带，利用与叙利亚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提升苏联的“地中海大国”地位。叙利亚提供的这一地中海军事基地为苏联增强在中东的军事投射能力、建立地中海防空系统和促进中东共产主义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苏联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重要功能是情报搜集，维护了苏联在地

①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0, p.77.

②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p.144.

中海东部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由于叙利亚处于连接中东与地中海的关键地带，加上靠近北约在中东的唯一成员国土耳其，又奉行类似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成为苏联在中东部署军事力量最集中的地区，被外界称为“苏联在中东的古巴”。为避免给叙利亚当地民众以“新殖民者”的印象，同时也为独享在叙利亚的军事情报源，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情报人员很少与当地人员来往，甚至不愿意同叙利亚情报官分享“萨姆-5”导弹防御系统的管理权，以至于叙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Abdul-Halim Khaddam）称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为“国中之国”。早在1979年8月初，西方媒体就指出，苏联至少有50辆T-72型坦克抵达了叙利亚塔尔图斯港。截至1984年，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顾问中有1000—1500人左右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服务，为苏联提供重要的中东情报信息。^①

第二，苏联利用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在叙利亚建立了游击队训练营，专门训练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和亚美尼亚秘密军（Armenian Secret Army）等马列主义武装小组，维护了苏联在中东的意识形态利益。冷战时期，苏联在中东的重要利益是拓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加快改造私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的积极协调下，保加利亚和古巴的军事训练官利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向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分裂力量传授军事知识，普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以削弱北约在中东的成员国土耳其政府的力量，阻止北约在中东扩大军事影响力。^②叙利亚成为苏联在中东训练“马列主义革命武装力量”人数最多的地方，被视为培养“红色骑士”的摇篮。叙利亚政府则对共产主义训练小组采取默许态度，并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产主义训练小组人员提供后勤支持。

第三，叙利亚军事基地成为苏联地中海特遣队的重要补给基地和苏在海外最大的军事顾问团，维护了苏联在中东的政治利益。1972年7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驱逐苏联1.5万名军事训练官和其他军事基地人员后，叙利亚成为重要的苏联军事顾问接受国。尤其是苏联部署在叙利亚的“萨姆-5”

^①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pp.127, 231.

^② *Ibid.*, p.129.

防空系统，由苏军两个旅组成，是叙利亚国家安全的重要保护力量，也丰富了苏联军事指挥官的实战经验。^①1980年，苏联北方舰队司令叶戈罗夫上将（Георг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Егоров）请求利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和巴尼亚斯港（Banias）修整军舰，包括苏联核潜艇，叙利亚予以批准，苏联海军顾问也借机进一步涌入叙利亚军事基地。^②1977-1982年，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顾问人数增加近了3倍。截至1983年，苏联的“萨姆-5”防空导弹部署在首都大马士革和霍姆斯等叙利亚重要城市。1983年，苏联广播电台指出：“叙利亚在对抗敌对力量（以色列）时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得到了以友好国家苏联为首的世界上进步力量和自由力量的支持；苏联将根据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忠实履行对盟国叙利亚的义务。”^③

表 1 苏联在叙利亚军事顾问的人数变化

年份	苏联军事顾问与情报人员人数
1973	3500-5000
1977	1800
1981	2500
1982	7000
1983	7000
1984	7000
1985	4000
1986	4000
1987	4000
1988	4000

资料来源：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pp.205-206.

第四，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强化了两国战略联盟关系，维护了苏联的外交利益。1979年埃及签订《戴维营协定》后，阿萨德担心以色列将对叙利亚执行更加强硬的政策，于是联合利比亚、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于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定》后第三天，在大马士革成立了“强硬对抗民族阵线”（The Front for Steadfastness and Confrontation），宣布《戴维营

①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p.145.

②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p.143.

③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pp.147-148.

协定》非法无效。叙利亚成为该阵线唯一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①为获得更多的政治与军事筹码，阿萨德于 1979 年 10 月访问苏联，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和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会谈。埃及与以色列的媾和，以及埃及总统萨达特奉行的亲美反苏政策改变了中东地区阿以之间和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使苏联急于在中东寻找更好的代理人。无论从反以、反美的政策坚定性来看，还是从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来看，叙利亚都是替代埃及军事基地的重要选项。为此，苏联免除了叙利亚 5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债务，双方签订了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达成了两国关系史上数额最大的军售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向叙利亚提供 1400 辆坦克（包括 800 辆 T-72 型坦克），200 架作战飞机（包括“米格-25”和“苏-20”、“苏-22”型战机）、2000 辆装甲车和 1700 门火炮。^②1980 年，叙利亚政府同苏联正式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以牵制以色列。根据该条约，苏联必要时可向叙利亚派兵以帮助叙维护国家安全。此后，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战斗机、地对空、地对地导弹、电子与防空导弹等，叙的军事力量也从 1983 年的 30 万人增加至 1985 年的 50 万人，国防能力明显增强。^③作为回报，叙利亚在外交舞台上积极支持苏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叙利亚积极游说其他阿拉伯国家，使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大多选择了弃权，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北也门等。

第五，叙利亚为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中东的活动提供了共享基地，维护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利益。由于叙利亚同以色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上美国长期视叙利亚为反美、反以力量的轴心之一，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不得不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奉行“一边倒”政策，以强化国家政权的安全。1967-1976 年，叙利亚从苏联进口了 20 亿美元的军火；1976-1978 年，苏联军火占叙利亚军火进口总额的 81.8%；截至 1986 年，叙利亚从苏东集团进口军火累计达到了 150 亿美元。与此同时，叙利亚也为苏东社会主

① Robert O. Freedman, “The Soviet Union and Syria: A Case Study of Soviet Policy”, in Moshe Efrat, ed.,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balance of Influ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160.

② Efraim Karsh, *The Soviet Union and Syria: the Assad Year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Routledge, 1988, p.49.

③ Eyal Zi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1, p.39.

义阵营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1978年，苏东集团的军事顾问和情报人数在2580人左右，远远超过了在利比亚的1750人和在埃塞俄比亚的1400人，苏东集团在叙利亚军事人员人数占其在第三世界军事顾问和情报人员总数的20%。1979年，大约2000-3000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人员部署在叙利亚，包括2480名军事技术人员。此外，东欧还向叙利亚派出了6000人的经济顾问。截至1984年，苏东集团在叙利亚的军事顾问增加至1万人，其中苏联军事顾问7000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军事顾问3000人，包括710名民主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情报与安全人员500人）和131名波兰军事顾问。^①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从1972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战略文化具有进攻性，以建立地中海特遣队和在中东阿拉伯国家部署军事基地为主要形式，试图将阿拉伯国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第二，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重要的军火和贸易利益需要保护；第三，受美苏冷战和阿以冲突的结构性因素影响，苏联与叙利亚在战略上具有互补性，长期保持特殊关系与全方位合作；第四，由于苏联经济快速增长，加上优先发展国防工业，财政投入充分，有力地支撑了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部署，成为苏联反制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培养“进步力量”、维护在中东战略利益的重要依托。

三、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末）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掌握苏联最高权力后，积极推动所谓“新思维”，试图寻求同美国缓和关系，甚至不惜牺牲苏联在中东盟国的利益。由于苏联视美苏缓和为头等大事，1984年11月至1985年4月，苏联从叙利亚撤走了1/3的军事力量，包括苏联在叙利亚部署的唯一的防空部队（该防空部队被认为是苏联在中东唯一的作战力量），同时撤走的还有苏联在叙利亚“萨姆

^①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pp. 205-206, 230-231.

-5”防空系统的技术人员，苏联在叙只剩下4000人左右的军事顾问。^①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适逢叙利亚与以色列因叙利亚在黎巴嫩部署“萨姆-6”和“萨姆-8”型导弹问题而剑拔弩张。阿萨德总统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以色列企图将戈兰高地划入自己的边界范围，我们将决心把戈兰高地作为叙利亚的中心而不是边界。”^②为获得苏联的支持、平衡以色列在中东的影响力，阿萨德总统于1985年6月、1987年4月和1990年4月三次出访莫斯科。1985年，阿萨德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指出：“契尔年科同志过去是我们的伙伴，致力于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致力于援助抵抗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我希望叙利亚和苏联的友谊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在叙利亚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我们相信苏联领导人也会这么做。”^③

戈尔巴乔夫时期，海外军事基地在苏联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叙利亚在苏联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不及以色列，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丧失了原先应有的军事功能。1987年4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时表示，叙利亚决心与以色列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博弈。戈尔巴乔夫则反驳说：“依靠军事力量解决阿以冲突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信度，叙利亚必须放弃同以色列抗争的理念。”^④苏联甚至不顾叙利亚的反对，于1987年7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建立领馆，1988年7月以色列也在苏联建立了领馆，表明戈尔巴乔夫政府尽管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但改变了以往的“扶叙压以”政策，中东政策更加灵活务实。^⑤1989年10月，根据《塔伊夫协定》(Taif Accord)，叙利亚军队继续留在黎巴嫩，但1989年11月，苏联公开批评叙利亚的黎巴嫩政策。苏联驻叙利亚大使佐托夫(Aleksander Zotov)指出，苏联不再支持叙利亚寻求同以色列进行战略对抗的军事政策；苏联对叙利亚的军售从1985年以前的年均23亿美元下降至1985-1989年的年均10亿美元。^⑥戈尔巴乔夫政府愿意向印度和伊拉克提供“米格-29”战斗机，却拒绝出售给叙

① Sabrina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pp.190-191.

② Ibid, p.201.

③ Eyal Zi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1, p.37.

④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Bashar al-Asad and Modern Syr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2-53.

⑤ Eyal Zi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p.43.

⑥ Mark Smith, *Russia & the Middle East*, p.52.

利亚，主要是因为苏联将以色列视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伙伴，而昔日盟友叙利亚已经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资产。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长达40年的冷战结束，对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时期，中东是苏联重要的近邻，其地缘上与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后，随着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俄罗斯不再与中东国家接壤，加上1991年俄罗斯国力（按经济总量计算）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中东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俄也因财政困难终止了黑海舰队与北方舰队联合组成的地中海特遣队的巡逻任务，其军事投射能力与苏联时期不能同日而语。^①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担任俄总统初期，俄罗斯最关心的是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问题，对中东问题提不起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究竟应奉行“大西洋主义”还是“欧亚主义”政策的辩论中，叶利钦最终选择了“大西洋主义”，即俄罗斯将协调与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视为对外关系的基轴；俄罗斯领导人还将外交与国防重点放在欧洲和中亚地区，在中东关闭了在也门、索马里等国的军事基地，仅留下叙利亚塔尔图斯一处军事基地，且基本处于半废弃状态。

面对苏联解体，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焦虑，叙一位高官甚至坦言：我们比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更加感到遗憾和惋惜。^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的局面并不符合叙利亚的战略利益，因为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长期赖以生存的美苏、阿以双重均势已经被打破。1991年10月2日，叙利亚官方报纸《十月日报》（*Tishrin*）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失败。”^③然而，叙利亚不得不面对苏联影响力骤然下降、甚至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支持美国向冷战时期自己的重要盟友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现实。苏联在冷战结束初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追随美国、逼迫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和谈的做法，使叙利亚倍感失望。

① Roland Dannreuther,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Edward Carter, William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Middle East's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p.23.

② Eyal Zi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pp.37-46.

③ Ibid, p.4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俄罗斯视苏联时期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为“包袱”，认为海外军事扩张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正是苏联在古巴、叙利亚、越南、索马里、安哥拉、阿富汗等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的负担，才拖垮了苏联经济，导致苏联的瓦解。因此，90年代初，叶利钦政府对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俄罗斯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叙利亚如何尽快偿还苏联时期拖欠的军售和其他债务的时间和额度问题。1992年10月，俄罗斯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组成代表团访问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总理马哈茂德·祖阿比（Mahmoud al-Zuabi）、经济与外贸部长穆罕默德·阿马迪（Muhammad al-Imadi）和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Mustafa Tlas）举行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叙偿还俄债务问题。双方最终未能找到解决办法，导致两国关系跌至1970年以来最冷淡的境地。塔尔图斯军事基地对俄罗斯来说也不再重要了。^①

1994年开始，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欧亚主义”逐步成为影响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恢复俄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成为叶利钦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俄开始在阿以之间奉行更加务实的平衡战略。1994年4月，俄罗斯杜马部分议员认为，美国企图在戈兰高地建立军事基地、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必须高度警惕。^②俄罗斯议员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的敏感反应，彰显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回潮”。1994年11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访问大马士革，并与阿萨德总统举行会谈。他强调：“俄罗斯在中东的存在对于保持地区权力平衡、抵消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具有重要意义。”^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俄罗斯开始酝酿重返在中东的军事基地。1996年，亲阿拉伯的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访问叙利亚，强调俄叙两国将恢复战略合作关系。普里马科夫是前苏联克格勃高官，积极主张奉行亲阿反以政策，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个人关系也很密切。^④1997年普里马科夫担

① Mark Smith, *Russia & the Middle East*, p.162.

② Ibid, p.165.

③ Ibid, p.163.

④ Barry M. Rubin and Thomas A. Keaney, *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p.156.

任俄外长后，俄罗斯恢复了同叙利亚的战略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俄经济发展不景气，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仍处于半废弃状态。

2000 年，经过同黎巴嫩真主党长达 18 年的斗争，以色列宣布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则宣称自己是阿拉伯土地上第一支迫使以色列作出领土让步的力量。^①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和伊朗长期保持密切关系。西方学者分析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Bekaa Valley）以及伊朗本土建有训练基地，以帮助真主党提高军事战斗力。^②世纪之交，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轴心使俄罗斯进一步看到了叙利亚在制衡美国中东霸权中的重要性，但限于财政困难，加上叶利钦政府对外战略的首要地区是美欧国家，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恢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外军事基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双边协议免费使用的基地，如俄军在阿布哈兹的第 7 号军事基地和在南奥塞梯的第 4 号军事基地；俄军在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常驻两个摩托化营、1 个保障和后勤营、1 个直升机中队，共 1000 多人，其基地也是免费使用的。第二类是根据多边协议免费使用。这类是俄根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规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而无偿使用成员国境内的军事设施，如在亚美尼亚久姆利的俄军第 102 军事基地，常驻 4500 人；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军事联盟的反恐基地，也属于多边协议的范畴。第三类是根据双边协议“以优惠价使用”的基地，如俄军在阿塞拜疆的加巴林雷达站，以及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每年租金为 1.15 亿美元）；俄在哈萨克斯坦的第 929 号国家飞行试验中心、“埃姆巴”靶场、“萨雷—沙干”武器试验场、第 4 号国家中心靶场、1 个通讯站、1 个空军转运中心、

① Alexander T. J. Lennon, *The Epicenter of Crisis: The New Middle East*, Boston,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8, p.101.

② Ibid, p.211.

第 20 号试验点和两个测量站等，年租金总计为 5000 万美元。^①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属于第三类。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俄罗斯国力衰弱，俄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下降，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沦为落败的技术停靠站，俄罗斯政府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在中亚，俄罗斯曾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达成一项 20 亿美元的一揽子协议，旨在垄断吉尔吉斯斯坦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迫使该国政府关闭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军事基地。与俄罗斯高度重视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不同，俄在叙利亚塔尔图斯基地的年租金虽然只需 200 万美元，但因俄罗斯在地中海东岸的战略利益远不及其中亚的战略利益，俄在塔尔图斯基地最重要的设施仅为一艘 PM-138 修理舰（后由 PM-56 轮岗代替）且只部署了 1/3 的工作人员，而且该修理舰本身也需要修护。^②俄罗斯政府多次强调，塔尔图斯不是俄罗斯的正式军事基地，而只不过是“物资技术供应站”，其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作战意义。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末，苏（俄）战略文化的进攻性一面受到抑制，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仅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以维护俄在中东的政治大国地位、参与中东政治事务为任务；第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战略防线退缩，以解决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为首要任务，其对外战略的重点地区退至独联体范围内，以中亚、高加索和中欧地区为外交优先地区，其中东的军售、经济和贸易利益下降，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功能弱化；第三，俄罗斯与叙利亚尽管仍保持特殊关系，但围绕苏联时期叙利亚借贷的债务偿还问题，两国出现若干次外交危机，影响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运转；第四，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乏力，GDP 严重下滑，财政状况恶化，导致俄罗斯国防开支锐减，影响了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恢复工作。

① 关键斌：“俄罗斯海外军事基地遭遇‘提租潮’”，《中国青年报》，2012 年 7 月 16 日，第 4 版。当然，俄罗斯也向基地东道国提供了间接补偿，如接受上百万塔吉克斯坦劳工在俄就业、以低于市场价向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出售天然气等。

② Paul J. Saunders, “Russia’s Syrian Base: A Potemkin Port?”,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7, 2012.

四、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三阶段 (21 世纪初以来)

21 世纪初以来，随着普京进入俄罗斯领导层，俄恢复苏联时期大国地位的决心和能力增加，强化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成为俄罗斯领导人恢复在中东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同时，由于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双重遏制，叙利亚也欢迎俄罗斯恢复在叙军事基地，以平衡美以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力量。“9·11”以后，美国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成为美国全球反恐的重要打击对象之一。美国以叙利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反对以色列威胁到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为由，加大了对叙利亚的打压力度。^①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更趋紧张，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为伊拉克反美武装提供军火，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接受采访时则指出，入侵伊拉克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阴谋，美以试图重组地区力量。^②黎巴嫩总统哈里里遇刺身亡后，2004 年 9 月 2 日安理会通过第 1559 号决议，要求国际社会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宪法，从黎巴嫩撤出所有外国军事力量。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策动下，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叙利亚占领的示威游行。在美欧的压力下，叙利亚于 2005 年初从黎撤出了几乎所有的 1.5 万名战斗人员和 1.5 万安全和情报人员。^③

为平衡西方对叙利亚施加的压力，2005 年 1 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问莫斯科，寻求俄罗斯的政治援助，并积极主张俄罗斯恢复在中东的“失地”。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积极回应，正式宣布免除叙利亚在冷战时期拖欠的 98 亿美元债务中的 73%，约 70 亿美元。巴沙尔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是个大国，对世界事务肩负着责任；俄罗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这些国家衷心希望俄罗斯在世界各地恢复失去的影响力。”^④

① Sami Moubayed, *Syria and the USA: Washington's Relations with Damascus from Wilson to Eisenh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2, Forward.

② Fred Haley Lawson, *Demystifying Syria*, London: Saqi, 2009, p.163.

③ Alexander T. J. Lennon, *The Epicenter of Crisis: The New Middle East*, Boston, pp.75-76.

④ Robert G. Rabil, *Sy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p.202-203.

近年来，俄罗斯在国外共部署有 25 处军事基地，其中绝大部分在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土地上，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其中大型军事基地有 7 处。^①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是俄在独联体国家以外的唯一一处海外军事基地，但规模有限。其陆上仅部署俄军 50 人左右，海上修理舰部署的俄军也不过 200 人左右，属于前沿行动基地。该军事基地虽规模较小，但由于扩大了俄海军打击半径，成为俄维持大国地位、拓展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战略利益的前沿哨所，是俄黑海舰队突破美国和北约在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军事基地群“锁链”的重要一环，也是俄黑海舰队与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保持战略平衡的重要基地。

2008 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以及俄罗斯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俄罗斯在中东的现实利益增加，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开始承担新的任务，成为俄罗斯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保护其中东的经贸利益、维护航道安全的重要桥头堡。俄罗斯在塔尔图斯军事设施主要包括：（1）1 艘浮动的海上修理舰（每半年轮岗一次，2012 年 10 月由“PM-56”号接替“PM-138”号修理舰）和 3 处海上浮动码头，为俄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船只在中东和地中海执行任务提供维修服务，其中修理舰拥有大约 190 名工作人员；（2）塔尔图斯岸上的几处简易的俄罗斯兵营，近年来部署了 50 名左右俄罗斯海军官兵；^②（3）两个中型波纹金属（Corrugated Metal）储藏建筑；（4）可停放 5-6 辆车的有盖停车棚；（5）一处办公大楼。^③俄罗斯在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与美国在巴林麦纳麦的海军基地不同，前者规模较小，缺乏指挥和控制中心，难以在危机爆发后成为前沿作战基地，麦纳麦的美海军基地却是美国在海湾地区重要的指挥、控制和情报中心。2010 年以来，叙利亚逐步陷入内战，又给俄罗斯在叙利亚

① Zdzislaw Lachowski, “Foreign Military Bases in Eurasia”, *SIPRI Policy Paper*, No.18, June 2007, p.45.

② Andrew E. Kramer, “Russian Warships Said to Be Going to Naval Base in Syria”,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12.

③ Mark Lowe, “Russia to Defend Tartus”, *Maritime Security Review*, June 19, 2012; *Komsomolskaya Pravda*, June 26, 2012.

的军事基地增添了不少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避免卷入冲突，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军事基地的驻军人数从 600 人下降至不足 200 人，但该基地仍具有战略意义。俄罗斯在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维护俄罗斯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利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历史可上溯到 18 世纪，至冷战结束时仍拥有 1.3 万作战部队和 1.6 万文官，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唯一前沿行动基地就是叙利亚塔尔图斯军事基地。东地中海地区在地缘上紧靠土耳其海峡、以色列、塞浦路斯和苏伊士运河，二战结束以来是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最集中、也是全球范围内地区冲突最频繁的地区。俄罗斯塔尔图斯军事基地的存在，不仅突破了美国第六舰队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地中海北岸地区“一字形”军事基地链对俄黑海舰队的围堵和封锁，而且有助于俄在中东危机爆发后干预地区事务，使中东真正成为俄罗斯联邦的“近邻”。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军事基地和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形成“合纵”态势，美国在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的四处军事基地形成“连横”态势，“合纵”与“连横”成为俄罗斯与美国争夺东地中海战略要地的主要格局。

2008 年以来，美国和北约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上升，要求俄重振大国雄风的呼声不断上涨。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军事冲突后，10 艘俄军舰停靠塔尔图斯军事基地。2010 年 8 月，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y）指出，俄罗斯将更新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清理港口，使之能够停靠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船只。^①路透社 2012 年 8 月 3 日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高官在谈及塔尔图斯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时指出：“塔尔图斯对于俄罗斯海军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为它是俄罗斯在地中海执行军事任务的中坚力量。丧失这一基地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实际上会导致俄罗斯丧失在这一关键地区的影响力。”^②

① “Russian Navy to Evacuate Syrian Base in Emergency”, *Reuters*, July 28, 2012, <http://rt.com/news/tarturs-base-defense-evacuation-293/>

② Russia Sends Navy Vessels to Syria Base---Agencies”, *Reuters*, August 3, 2012, <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2/08/03/syria-russia-navy-idINDEE8720CA20120803>

第二，成为俄罗斯在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技术停靠站。目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技术支援站——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拥有三个浮动系泊处，一个浮动工作台，一个军械库，一个兵营以及多种装备设施。^①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在不同场合重申，叙利亚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安全战略意义，俄罗斯不会放弃这一军事基地，包括支援在中东的反海盗行动。2008年索马里海盗危机爆发后，应联合国请求，俄罗斯向亚丁湾地区派出海军护航编队，先后向亚丁湾地区派出了“彼得大帝”号重型核动力巡洋舰、“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和“无畏”级护卫舰等先进军舰。^②叙利亚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成为俄在索马里海域护航编队的重要后勤补给基地。据统计，如果俄罗斯从海参崴向亚丁湾海域派出护航编队，其行程为6600英里，而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派出护航编队，途径塔尔图斯前往亚丁湾海域，行程只有2400英里。^③因此，2009—2012年，俄罗斯先后有12批护航编队和其他舰队在塔尔图斯停靠休整，这些舰艇有的来自于黑海舰队，有的来自于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④例如，2008年9月，俄罗斯“莫斯科级”巡洋舰和四艘导弹核潜艇均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2012年12月，俄罗斯两艘军舰——“新切尔卡斯克”号（Novocherkassk）和“萨拉托夫”号（Saratov）也在此加油和休整。^⑤

第三，保护俄罗斯在叙利亚侨民的安全。2012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10万左右侨民，保护俄罗斯侨民安全是俄在塔尔图斯军事基地的重要任务。^⑥2012年6月，俄罗

① 韩旭东：“美军撤出伊拉克，中东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亚非纵横》，2010年第5期，第31页。

② 同上，第31页。

③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 Naval Base Tartus”, p. 4.

④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s Syrian Naval Base”, *The Diplomat*, August 21, 2012, <http://thediplomat.com/flashpoints-blog/2012/08/21/russias-syrian-naval-base/>

⑤ “Russian Warships Made Syrian Port Call”, *Gulf News*, December 5, 2012.

⑥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俄罗斯侨民人数逐步减少，2012年8月4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截至当年8月，俄罗斯在叙利亚还剩下3万侨民，但截至2012年12月，俄罗斯驻叙利亚使馆登记的俄侨民人数是5.3万人。参见“Russia Said to Send Warships to Syria as Fighting Intensifi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2012; Samer Al-Hamwi, “Russia Eyes Syria Evacuation as Rebels Take Damascus District”, *The Reuters*, December 18,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2/18/us-syria-crisis-idUSBRE8AJ1FK20121218>.

斯政府证实，俄罗斯“尼古拉·费尔琴科夫”号（Nikolai Filchenkov）和“凯撒库尼科夫”号（Caesar Kunikov）2艘两栖登陆舰，以及1艘轻型救援船，从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基地出发，穿过土耳其海峡，前往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以保护在叙俄罗斯侨民的安全，必要时撤回侨民及塔尔图斯基地中的重要设备，这是叙利亚国内爆发冲突15个月后，俄罗斯首次向叙利亚派出军舰，准备撤侨。^①除黑海舰队派出的2艘军舰外，俄罗斯北方舰队也从北冰洋北莫尔斯克（Severomorsk）海军基地出发，派出“恰巴年科元帅”号（Admiral Chabanenko）驱逐舰、“亚历山大·奥特拉夫斯基”号（Alexander Otravsky）、“孔多波加”号（Kondopoga）、和“圣·乔治”号（Saint George）两栖攻击舰等，与黑海舰队的2艘军舰会合，一同驶往叙利亚海域。^②2012年8月叙利亚局势持续紧张以来，俄罗斯在塔尔图斯军事基地附近海域一度部署了3艘两栖运输舰和36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以便在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后撤出剩余的俄罗斯侨民。^③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Interfax）称，2012年12月，2名俄罗斯人在叙利亚遭绑架后（同时遭绑架的还有1名意大利人），俄罗斯的2艘攻击舰、1艘加油船和1艘护卫舰曾离开波罗的海军港前往地中海地区。^④

第四，维护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统治。2011年叙利亚陷入内乱后，西方频频向巴沙尔政府施压，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强调指出，绝不能让西方在利比亚滥用安理会决议、武力更迭他国政权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这一强硬政策，与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俄罗斯政府担心美国和北约会以“保护的责任”为由，干涉俄罗斯车臣内部事务，损害俄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⑤海湾战争以来，俄罗斯的战略盟友伊拉克、利比亚等均成为西方政权更迭的目标，叙利亚被认为是俄罗斯在中东“最后的盟友”。为此，2011年以来，俄罗斯多次向叙利

① Adrian Blomfield, “Syria: Russia to Send Marines to Naval Base”, *The Telegraph*, June 18, 2012; “Russian Navy Preparing to Defend Base in Syria”, *The Moscow Times*, June 18, 2012.

② Kevin Brent, “Russian naval task force to Syria”, <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russian-n-naval-task-force-to-syria>

③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s Syrian Naval Base”, *The Diplomat*, August 21, 2012, <http://thediplomat.com/flashpoints-blog/2012/08/21/russias-syrian-naval-base/>

④ “Russia Sends Warships to Syria”, *Khaleej Times*, December 19, 2012.

⑤ Nicholas Kosturos, “What Drives Russia’s Unrelenting Position on Syria?”, p.3.

亚塔尔图斯基地及附近海域派出军舰，彰显对巴沙尔政府的政治支持，特别是 2011 年 11 月，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抵达塔尔图斯附近海域，与其一同抵达该海域的还有巡逻艇、反潜舰和其他舰艇。这一行动具有重要的外交宣示意义。俄罗斯还利用商船，经塔尔图斯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包括向叙利亚提供 MI-24 型攻击直升机。^①2012 年 3 月，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的报道称，俄罗斯黑海舰队一艘“伊曼”油轮（Iman）抵达塔尔图斯港，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派出的反恐中队也抵达叙利亚，帮助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清剿国内的反政府恐怖分子。^②《今日俄罗斯报》也报道说，2012 年 5 月，俄罗斯“凯兹曼教授号”（Professor Katsman）货船驶往塔尔图斯港，向巴沙尔政府运送去用于对付叙利亚自由军的武器装备。^③2012 年 7 月，俄新社报道说，来自俄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 10-11 艘军舰和其他护卫舰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和黑海地区会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海军总司令维克托·奇尔科夫（Viktor Chirkov）向俄新社记者表示，俄罗斯参加演习的军队不会进驻塔尔图斯港，但部分军舰将赴塔尔图斯军事基地进行休整，因为该基地非常便利，可以为俄军舰提供后勤服务，且成本较低；未来俄罗斯不会放弃该海军基地，俄已经并将继续使用该基地。^④2012 年 8 月 28 日，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尼古拉·马卡罗夫将军（General Nikolai Makarov）再次否认了媒体关于俄正在从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撤出军事人员、将关闭在该军事基地的传闻，并认为现在就预判俄军将从塔尔图斯撤走还为时过早。^⑤在叙利亚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举行军演，对于提振巴沙尔政府军队的士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12 年 11 月，

① Можем нанести ракетный контрудар, <http://vz.ru/politics/2011/11/23/540697.html>;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 Naval Base Tartus”, p. 5.

② “Report: Russian ‘Anti-terrorism’ Troops Arrive at Syrian Port”, <http://hotair.com/archives/2012/03/19/reports-russian-anti-terrorism-troops-arrive-at-syrian-port/>

③ США: Россия направила военный контингент в Сирию, <http://top.rbc.ru/incidents/16/06/2012/655357.shtml>; “Russia to Send Navy Ships Carrying Marines to Syria to Protect Military Base”, *Russia Today*, June 18, 2012.

④ Российская база в Сирии-«потемкинский» порт? <http://inosmi.ru/politic/20120718/195117269.html#ixzz2FQr694Hk>; “Russia Sending Warships on Maneuvers Near Syria”,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2.

⑤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опровергают эвакуацию с военной базы в Сирии, но защищать ее флотом не буду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中东，要求巴沙尔政府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举行政治谈判，并努力促成巴沙尔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和解。叙利亚政治和解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后，2012年12月初，俄罗斯两艘军舰再次抵达塔尔图斯基地。俄罗斯政府声称，此次的主要任务是从塔尔图斯港获得燃料和淡水补给，并对舰艇进行简单维修，但这无疑彰显了对巴沙尔政府的政治支持。

第五，维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售利益。21世纪初以来，叙利亚从俄罗斯进口的军火占俄军火出口的10%左右。普京曾公开承认，俄罗斯军火出口从2005年的60亿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130亿美元。2006年，俄罗斯免除叙利亚134亿美元军火债务中的96亿美元，进一步促进了叙利亚对俄罗斯军火的购买。2011年叙利亚从俄罗斯购买了10亿美元的武器，占当年俄军火出口总额的8%。^①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7-2011年，叙利亚对俄罗斯军火的购买量增加了580%，包括“铠甲”（Pantsyr-S1）防空系统、“山毛榉”（Buk-M2）防空系统、“堡垒”（Bastion）反舰导弹系统等。2011年，叙利亚国内危机恶化后，俄罗斯再次与巴沙尔政府签订了4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俄将根据合同向叙利亚提供36架“雅克”-130（Yak）教练机^②，叙利亚成为21世纪俄在中东最大的军火买家之一。

当然，新时期俄罗斯恢复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功能还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俄塔社援引来自俄军方人士的消息称，俄计划在2011年前实现塔尔图斯军事设施的现代化，增强其功能，使之能够停靠大型军舰包括航母。2010年2月，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在谈到如何更新叙利亚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时指出：“塔尔图斯基地的第一阶段开发与现代化建设将于2012年完成”^③；俄罗斯还将在利比亚和也门恢复军事基地，使俄罗斯真正成为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的世界大国。^④201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

① Russia Sends Navy Vessels to Syria Base--- Agencies”, *Reuters*, August 3, 2012. <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2/08/03/syria-russia-navy-idINDEE8720CA20120803>

② Nicholas Kosturos, “What Drives Russia’s Unrelenting Position on Syria?”, pp.1-2.

③ Christopher, Harmer, “Russia Naval Base Tartus”, p. 2.俄罗斯政府认为，塔尔图斯市人口10万，拥有医院、宾馆、购物中心等较为齐备的配套生活设施，且有公路和铁路与叙国内其他城市相连，有进一步拓展军事基地功能的潜力。

④ “Russia Planning to Open New Naval Bases Abroad”, *The Telegraph*, November 25, 2010.

夫曾在俄高级军事会议上指出：俄罗斯现在很需要同新伙伴一起，就新的军事基地协定举行谈判，俄罗斯已经丧失了许多机会；与以往依靠海外军事基地相比，俄罗斯现在的海外军事行动不得不依靠加油船，既昂贵，效率又低；相比之下，部署海外军事基地效率更高，成本更低。^①但是，塔尔图斯军事基地具有先天的缺陷，如该港口不是深水港，难以停靠航母等大型军舰；尽管塔尔图斯港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与内地相连，但其落后的岸上基础设施使之难以在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提供充分的后勤补给支持。塔尔图斯浮动码头长度 100 米，仅能同时停靠 4 艘中型舰艇，却难以停靠“基洛夫”级(Kirov) 导弹巡洋舰以及“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②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和俄罗斯领导人大国意识的增强，俄战略文化的进攻性进一步凸显，阻止西方大国主导中东事务、发出俄的不同声音日益成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在中东的重要追求目标；第二，随着俄罗斯经济和综合国力的上升，其中东的军售利益、能源利益等不断增强，经贸合作日益活跃，尤其是索马里海盗的猖獗和叙利亚危机的爆发，迫使俄不得不利用在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第三，本世纪初以来，俄罗斯与叙利亚在战略上的互补性进一步凸显，两国特殊关系成为支撑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重要因素；第四，由于经济的复苏和财政状况的好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设施得到局部完善，正在成为俄罗斯制衡西方大国推行“人道主义干涉”政策和维护自己现实利益的重要筹码。

五、结论

冷战期间，苏联在中东主要有三层利益：阻止美国主导中东事务、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推销苏联军火。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是苏联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一度下降，其对外战略防线

① “Russia to Expand Foreign Bases”, <http://www.defence.pk/forums/world-affairs/82097-russia-expand-foreign-bases.html>

② Ria Novosti Staff, “Russian Ship to Hold Drills off Syria”, April 5, 2012, http://en.rian.ru/military_news/20120405/172626586.html

退缩至前独联体地区，俄在中东的利益减少，俄罗斯与叙利亚的特殊关系也面临各种现实挑战。到 21 世纪初，叙利亚塔尔图斯军事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留下的唯一军事基地，也是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之外唯一的军事基地，这使其成为俄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和保护自己现实利益的重要依托。本文探讨了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苏（俄）战略文化、苏（俄）在中东的现实利益、苏（俄）叙两国的特殊关系以及苏（俄）的财政状况这四个因素决定了其在叙利亚部署军事基地的运行轨迹。

表 2 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

	苏（俄）战略文化	苏（俄）在中东的现实利益	苏（俄）与叙利亚特殊关系	苏（俄）财政状况	军事基地的规模	军事基地的主要功能
第一阶段（1972-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强进攻性	多	密切	好	大型军事基地	美苏意识形态斗争功能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末）	弱进攻性	少	一般	差	半废弃设施	政治象征功能
第三阶段（21 世纪初以来）	强进攻性	多	密切	逐步恢复	小型补给基地	现实利益保护功能

从表 2 可以看出，苏（俄）战略文化、苏（俄）在中东的现实利益、苏（俄）与叙利亚的特殊关系和苏（俄）财政状况，是四十年来影响其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延续与变化的四个主要因素。苏（俄）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文化和苏（俄）叙两国长期维持的特殊关系，决定了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延续性；苏（俄）在中东利益的多寡以及苏（俄）财政状况的变化，决定了其在叙利亚军事基地规模的变化（大型军事基地、半废弃设施和小型补给基地）与功能的变化（分别服务于美苏意识形态斗争功能、政治象征功能和现实利益保护功能）。

上述四个因素不仅影响了过去四十年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部署，而且影响到俄罗斯在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的未来。2010 年以来，俄罗斯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特别是随着叙利亚自由军等反对派武装势力不断壮大，俄叙两国的特殊关系前景不明，对俄罗斯塔

尔图斯军事基地的安全也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普京政府多次声明将继续向巴沙尔政府提供防御性武器，包括部署防空系统，并强调这是俄履行条约义务所必需的行动。但是叙利亚自由军认为，俄一方面反对西方大国干涉叙利亚内政，另一方面自己又秘密干涉其内政。2012年7月，叙利亚自由军发言人指出：“我们向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再继续向巴沙尔政府输送军火、屠杀我们的家人和叙利亚人民，我们会在叙利亚向他们发动攻击……我们不想攻击（塔尔图斯）港，因为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但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向巴沙尔政府提供军火），我们别无选择。”^①叙利亚自由军声称，一直在密切监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举动，并坚信攻击俄罗斯在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非常容易。“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塔尔图斯港，因为只要我们用反坦克导弹向俄罗斯在塔尔图斯的军火库发动袭击，就会产生巨大爆炸；我们也不排除直接向俄罗斯军舰开火。”^②此后不久，俄罗斯海军司令维克托·奇尔科夫向媒体透露，一旦俄罗斯塔尔图斯军事基地遭到叙利亚自由军袭击，俄罗斯将撤走驻守基地的所有俄海军官兵。^③2012年8月，俄罗斯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告诉俄罗斯《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记者，俄罗斯在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不会支持俄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俄不会用军事手段对付叙利亚反政府武装。^④如果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从而颠覆俄罗斯与叙利亚长达40多年的特殊关系，俄在叙利亚部署军事基地的动因之一——两国特殊关系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届时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是否会重蹈苏联在埃及、也门、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军事基地关闭的覆辙，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Abstract】 Encircled and contained by external marine power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reafter Russia, as a land superpower, strove to establish military bas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break through the strategic

① Ruth Sherlock & Magdy Samaan, “Syrian Rebels Threaten to Attack Russian Naval Base”, *Daily Telegraph*, July 26, 2012, http://www.dnaindia.com/world/report_syrian-rebels-threaten-to-attack-russian-naval-base_1719887

② Ruth Sherlock & Magdy Samaan, “Syrian Rebels Threaten to Attack Russian Naval Base”.

③ “Russian Navy to Evacuate Syrian Base in Emergency”, *Reuters*, July 28, 2012. <http://rt.com/news/tarturs-base-defense-evacuation-293/>

④ “Deal or No Deal?---Russia Suspends Naval Base in Syria”, *the Trumpet*, August 30, 2012.

encirclement, realize its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interest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o achieve its political ambition and seek its great power statu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establishment of Russian military base in Syria is driven by Russia's geopolitical-led strategic culture, its Middle East interests, Moscow-Damascus special relations, and Russian fiscal situation as well. The incentives behind the Russian military bases in Syri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seeking ideological struggle during the Cold War, showing its presence in the last one and half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protecting its practical interes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ases forge an essential platform for Moscow to project military power, to maintain its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interests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symboliz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haotic and new development of Syrian civil war will inevitably exert far-reaching effects on and pose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Russian military deployment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Russian Middle East Policy, The Soviet Union and Syria, Military Bases, Russia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пытывающих на себе длительное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Росси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военных баз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могает России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стратегию прорыва блокады, сохраняя сво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качестве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й державы, но и обладает важ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имволизмом, является краеугольным камнем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Россией)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мбиций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утверждения статуса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СССР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баз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военной базой Росс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За четыр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выдержала испытания таких

основ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как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потрясен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спытала на себе влия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ре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особы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Дамаском и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масштаб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данной военной базы постоянно меняется 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ой проекции сил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на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за рубежом, участия в делах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барометром» взлётов и падений влас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С 2011г., когда Сирия впала в хаос, особ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ирией подверглись испытаниям,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енной базы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 определен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СССР и Сирия,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вое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责任编辑 张昕)

遏制、整合与塑造： 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

曾向红**

【内容提要】美国至今依然缺乏连贯、明确的中亚战略，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正在该地区追求连贯的战略目标。事实上，在中亚国家独立伊始，美国就在中亚追求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即遏制俄罗斯、伊朗，以及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国；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前苏联国家整合进西方的政治、经济与价值体系之中；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以及美国官方和美国学术界宣称的能源、安全与民主，并不构成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仅是其追求的政策目标。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受到美国中亚政策指导思想——“遏制战略”的残余影响、“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的启发和规定。尽管在不同的时期，美国投放在这三重战略目标的精力和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三者始终引导着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中亚政策的构思和执行。

【关键词】美国 中亚政策 遏制 整合 塑造

【中图分类号】D83/87(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5-0120-(44)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06JZD001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10LZUJBWZY077）、兰州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批准号：13LZUJBWTD01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与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文章的错漏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博士。

从 1991 年至 2012 年的 20 多年里，美国逐渐从一个在介入中亚地区事务方面并无多少经验的外部行为体，逐渐演变为对该地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体。这与美国基于对该地区重要性的认识而投入了众多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毫无疑问，美国具有参与中亚事务的充分理由。作为地缘位置极富重要性的地区，中亚地区受到美国的关注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如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尤格恩·鲁默（Eugene Rumer）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利益和全球投射能力（global interests and global reach）的全球大国来说，美国介入中亚具有战略理由”。^①然而，鲁默也不无无奈地表示，在美国的中亚政策中，“除了进行反恐战争的直接需要以外，许多最为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对美国来说，中亚到底具有怎样的地位？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具有怎样的性质？美国在该地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安全管理者、霸权国家，还是有限参与者？”^②在鲁默看来，二十余年来，美国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始终在“寻求一种战略”。换言之，美国的中亚政策是以缺乏一种明确、连贯的中亚战略为特征的。

然而，美国缺乏一种明确、连贯的中亚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介入中亚事务时缺乏相应的战略目标。鉴于美国的中亚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旨在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确立美国在这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的中亚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这种全球战略目标的影响。具体到中亚地区，部分因为中亚本身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部分因为中亚与世界上许多大国毗邻，因此美国极为重视中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然而，尽管国内外中亚研究者及美国决策者均认为中亚地区对于美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何为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他们往往具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安全、能源与民主构成美国在中亚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本文认为，安全、能源与民主并非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而仅仅是其追求的政策目标。

① Eugene B. Ru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62.

② Eugene B. Rumer, “Flashman's Revenge: Central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Strategic Forum*,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o.195, December 2002, p.1.

本文认为，真正构成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的，是美国在该地区遏制俄罗斯、伊朗以及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安全—价值体系，以及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这三个方面。为了对此进行论证，本文首先指出，安全、能源与民主并非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然后分析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对其战略目标的规定，最后通过考察美国关于中亚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美国高级官员的相关表述、美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具体行动，以及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者的相关论著，尝试梳理出美国在中亚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及其战略目标的研究，主要采取一种文本和话语分析的方式。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尤其是在限于篇幅无法对美国在中亚地区为追求三重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展开全部研究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对所提炼出来的美国中亚战略目标产生疑问。不过，通过分析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可以为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上的说明。因为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对美国在该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作了规定，并限制了战略目标的方向与内容。而那种认为安全、能源与民主构成美国在中亚政策战略目标的观点，并不完全契合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

一、安全、能源与民主并非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

在以往研究美国中亚政策的成果中，研究者或美国决策者经常将能源、安全与民主等方面的内容视为美国中亚政策的驱动力量。这似乎构成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这一结论，似乎的确能从美国公布的相关文件和中亚问题研究者的观点中得到部分证实。就美国关于其中亚政策的三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的《自由促进法案》以及1999年、2006年出台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而言，这三个文件界定了美国在中亚的政策目标，以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应该采取的政策手段。如1992年10月24日，美国布什总统签署了《自由促进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规定向前苏联国家（Former Soviet Union）或新独立国家（New

Independent States) 提供援助。^①具体到中亚地区,《自由促进法案》列举了以下目标:促进地区稳定、鼓励民主化、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实现中亚地区的去核化、确保欧亚走廊的贸易与运输自由、引入国际人权标准等。

1999年5月,为了修正美国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id Act)中第907款与第579款中关于不能向那些压制自由与民主的国家提供对外援助的规定,美国第106届国会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②主要目的是授权总统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向那些尽管不符合美国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标准、但对美国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中亚(修改第579款)与南高加索国家(修改第579款)提供对外援助。在1999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中,美国的中亚与高加索战略的具体目标是:(1)加强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及民主,促使各国尊重人权;(2)鼓励宽容精神,促进多元主义,反对激进主义与反犹主义;(3)帮助解决这些国家的边界冲突,消除不利于国家间贸易发展的限制;(4)与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推进与各国之间的合作;(5)促使这些国家拥有自由市场的原则,并鼓励它们走向市场经济;(6)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其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状况,将南高加索三国与中亚五国打造成稳定、民主、市场导向的国家,并将其纳入大西洋体系;(7)维护与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

2006年美国《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对1999年的法案作了一定的修订,再一次肯定了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追求的能源、安全与民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③该法案指出:“美国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具有重要的长期利益。这些利益涉及安全,经济发展,能源和人权。”具体在民主方面,美国致力于促进该地区“民主、宽容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这是美国致力于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促进独立、民主政府和保护人权、宽容和多元化,以及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总体框架下发展的一项政策”。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规定了为促进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民主、宽容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美国需要采取的具体

① George W. Bush, “Statement on Signing on the Freedom Support Act”, <http://bush.library.tamu.edu/papers/19929210240./html>

② *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1999*, May 11, 1999, 106th Congress, Senate, 1st Session, <http://www.eso.org/gen-fac/pubs/astclim/espas/maidanak/silkroad.html>

③ *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2006*, May 4, 2006, 109th Congress, Senate, 2nd Session,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9/s2749/text#>

行动。至于在能源方面，该法案规定，美国将支持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这是美国援助中亚及南高加索地区的能源和能源运输、通信、交通、卫生和公共服务，以帮助发展基础设施的政策”。具体目标包括：防止任何其他国家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建立对能源开采及其出口的垄断；加强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广泛的能源生产和能源输送贸易关系，促进里海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以保证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能源安全。在地区安全方面，美国拟定的具体目标包括：有效应对高加索地区的冲突，维持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阿富汗局势的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打击非法毒品走私等。从以上表述看，安全、能源与民主似乎构成了美国中亚战略的核心内容。

美国在中亚追求能源、安全与民主这三个目标，似乎也得到了美国学界的认可。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战略与执行系副教授米歇尔·米哈尔卡（Michael Mihalka）对美国中亚战略长达16年的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所驱动的：石油的价格、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发展前景以及该地区在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竞争的程度。^①马修·克罗斯通（Matthew Crosston）指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涵盖三个领域：防止恐怖主义的扩散；为中亚各国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供工具及推进各国的法治状况；确保能源资源的开发。^②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中亚与里海问题研究专家阿瑞尔·科恩（Ariel Cohen）简明扼要地指出，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可以用三个词来进行概括，那就是安全、能源与民主。^③

对于美国为什么将安全、能源与民主视为其参与中亚事务的核心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the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Institute）研究室主任斯文特·E. 科纳尔

① Michael Mihalka, “Not Much of a Game: Security Dynamics in Central Asi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5, No.2, 2007, p.21.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p.123; Niklas L.P. Swanström, Svante E. Cornell, Anara Tabyshalieva, *A Conflict and Security Analysis of Central Asia with a Focus o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Washington, D.C.: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1, p.4.

③ Ariel Cohen, “U.S. Interests and Central Asia Energy Security”, *Backgrounder*, No.1984, November 15, 2006, p.1.

(Svante E. Cornell)作了深度解读。科纳尔认为,美国中亚政策关注的领域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硬”安全(‘hard’ security matters),由于在2001年以后美国已在全球开展“长期性”的反恐战争,那么获得进入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通道就成了美国政府的首要战略考虑;其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就致力于实现里海能源出口的多样化,随着全球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持续飙升,这一目标也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战略意义;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的不战而胜,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解读为自身民主策略的成功,从而使得在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兴起的诸如“民主和平论”^①等经验命题被西方决策层奉为开展对外事务的金科玉律。在此背景下,民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是应对社会失序、经济衰败与政府压制的有力武器。^②

通过以上简单的概括可以发现,安全、民主、能源的确构成了美国中亚政策三个连贯的主题,然而这些主题并非美国在中亚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安全、民主、能源的确引导着美国参与该地区的活动,以及处理与中亚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国的互动。然而,准确地说,能源、安全与民主仅仅构成美国介入中亚地区的政策目标,而非战略目标。按照界定,所谓战略,“简单而言,就是目的与手段、实力与意愿、目标与资源相结合的过程”,^③或者“国家战略是一种对于国家安全管理、具体目标以及行动底线的时限性计划”。^④战略具有长期性、原则性、

①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民主国家相较于极权主义国家来说具有较少的战争倾向,至少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种具有严重缺陷的理论命题后来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层用来论证其民主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这在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4, 1986, pp.1151-1169; Carol R. Ember, Melvin Ember, and Bruce Russett, “Peace Between Participatory Polities: A Cross-Cultural Test of the ‘Democracies Rarely Fight Each Other’ Hypo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44, No.4, 1992, pp.573-599;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② Svante E. Cornell, “Eurasia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o.11, 2006, p.30.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viii.

④ James C. Gasto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43.

整体性等特征，“政治战略，不论是地区的、国家的，还是国际的，无非是一种共识，即在确定现实与特定目标的思想之上的对行动的指导”；^①它与政策的区别在于“政策”往往只涵盖一段较短的时期，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功利性等特征，而且往往涉及的只是某一特定的领域，其涵盖范围更为有限。

与政策目标不同，战略目标具有灵魂性的作用，它涵盖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这些层面的目标引导国家向特定地区、领域投入资源。战略目标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于，前者是国家介入某地区或全球政治所期望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需要明确予以界定，并且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有效，因此前者对一段较短时间内的政策目标作了规定，但后者实现与否往往并不会对前者提出挑战或修正。如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执行的是一种遏制战略，这一战略涵盖了整个冷战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内美苏关系经历过复杂的变化，具体到不同的时期，美国针对苏联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以追求不同的目标，不过这些政策目标始终没有替代或修正美国遏制苏联及其主导的东方阵营这一战略目标。就美国介入中亚事务而言，安全、能源与民主分别涉及安全、经济与政治这三个领域，它们是美国中亚政策所确认的具体利益，这些利益的追求与维护也就构成了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政策目标，而不是战略目标。

通过回顾美国二十余年参与中亚事务的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在中亚地区始终追求着相对比较连贯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并非美国决策者或国内外中亚研究者通常所说的民主、安全与能源，而是遏制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安全—价值体系，以及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认为安全、能源与民主并非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美国决策者与学者们毫无预见性，或者说以错误的观点欺骗世人，而是其中某些目标在官方层面上不宜直接宣称（如遏制），因为这可能导致遏制对象如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激烈应对；或是因为某些目标（如整合与塑造）虽然的确可以公开表达，但它们在话语方面并不如安全、能源与民主等话语出现的频率高，以致往往遭

^① James A. Baker III,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New York: G. P. Putnam' Sons, 1995, pp.39-40.

到人们的忽视。更重要的是，遏制、塑造与整合这三重战略目标，受到美国中亚政策指导思想的规定。而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习惯性地受到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影响，此外，冷战结束前后在美国学术界盛行的“民主和平论”与“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其中亚政策时也会产生影响。除了“民主和平论”启示美国在中亚地区致力于推进各国的“民主化”，上述指导思想与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安全、能源等利益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了将安全、能源与民主视为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存在缺陷的。下文对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对美国在该地区追求的三重战略目标的具体规定展开论述。

二、美国中亚政策的指导思想对其战略目标的具体规定

冷战时期形成的遏制战略在冷战后时期对美国决策者造成的影响、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是指导美国制定和执行其中亚政策的思想基础。与安全、能源及民主属于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具体目标不同，遏制战略、“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涉及的是战略观念或思想体系，后三者有助于启发美国决策者如何介入中亚事务，并为此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论证。具体来说，遏制战略属于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民主和平论”属于理想主义传统，而“文明冲突论”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成分。就思想基础对战略目标的影响而言，遏制战略启示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伊朗与中国等大国；“民主和平论”要求美国改造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促进该地区各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最终让各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文明冲突论”一方面要求美国将中亚国家纳入到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中，使它们成为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成员，另一方面，通过将中亚国家纳入西方的轨道，可以有效地削弱俄罗斯、伊朗等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遏制俄罗斯、伊朗与中国，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合进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这三重战略目标。

美国将遏制战略、“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作为其中亚政策的

指导思想，与冷战结束的历史背景有关。美国的中亚政策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问世的。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没有就如何构建新世界秩序并针对前苏联空间提出创新性的政策建议。冷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政治家们不断宣传‘历史的终结’、‘历史转折点’、‘新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市场—民主空间’之类的断言（claims）……然而，对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西方决策者对于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很少进行讨论，而且也很少提出某些具体的改革建议。”^①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就如何建构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进行热烈讨论，并创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制度，随后又提出得到西方普遍认可的遏制战略，有明显的不同。^②这种状况，为美国决策者沿用遏制战略并挪用西方学术界提出的理论学说提供了契机。

遏制战略得到沿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决策层的中下级决策人员在制定中亚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让美国决策者坚信针对俄罗斯采取遏制战略的有效性，继而在美国决策者中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未提出一种新的战略的前提下，决策人员依旧运用遏制战略来处理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至于“民主和平论”，虽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学理化，但其影响早就内嵌在了“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之中，^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美国决策者制定针对前苏联国家的政策。“文明冲突论”虽然在 1993 年由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并于 1996 年得到系统的阐述，^④但冷战一结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① Michael J. Tierney, *Commitments, Cred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nto Western Multilateral Regim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PhD Dissertation, 2003, pp.239-240.

② 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考 G·约翰·伊肯伯里：“创造昨天的世界新秩序：凯恩斯的‘新思维’与英美战后安排”，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9-86 页。

③ 可参考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王立新：“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南开学报》，2006 年第 1 期；王晓德：“‘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7 期；Andrew Bacevich,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etc.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1993, pp.22-4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Fukuyama) 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反映了西方对于自己在冷战中取胜的狂喜以及希望以西方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决心。^①遏制战略与“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美国的中亚政策中，遏制战略在后冷战时期的遗存，主要启发美国利用中亚各国来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影响力。美国在里海地区追求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主要源自于美国官僚机构长达半个世纪与苏联打交道遗留的习惯。与杜鲁门政府在冷战时期根据乔治·凯南（George Kenan）的报告而决定对苏联启动遏制战略不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里海地区执行的新遏制政策并不完全来自于高层外交官的设计和表达。相反，由于冷战后的世界缺乏一个明确的敌人，美国并未发现存在一种对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地位构成明确威胁的挑战，这种局面构成了克里斯滕·特洛恩（Christian Thorun）提到的结构不确定性与战略不确定性。^②这两种不确定性进一步衍生出美国针对中亚地区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让美国针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中的中下层官员决定。^③

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制定针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并非美国最高层决策者的优先事项。当中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外交决策体制中的中下层人员制定与执行时，冷战时期形成的经验和惯例就会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④由于这些决策者长期生活在冷战的氛围与制度环境中，他们关于世界和俄罗斯的一系列假定，往往由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所塑造。因此，这些具体的个人倾向于对俄罗斯采取一种遏制政策。如史蒂芬·布兰克（Stephen J. Blank）指出：“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在于防止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俄罗斯帝国。恢复帝国不可避免会威胁到欧洲、中东和远东地区的均势。”^⑤遏制战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将其运用到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中，同样反映在介入中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② 见 Christian Thorun, *Explaining Change in Russian Policy: The Role of Ideas in Post-Soviet Russia's Conduct Towards the We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43.

③ Elaine M. Jordan, *Containment with A New Face: United State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spian, 1989-2000*, PhD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3, pp.44, 129.

④ 可参考 Nicholas O. Berry, “Why American Policy is So Hard to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9, Vol.45, No.1, pp.81-90.

⑤ Stephen J. Blank, *U.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0, p.4.

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最初极为重视土耳其在其中亚政策中的作用，这正好反映了美国沿用了冷战时期通过构筑联盟网络以遏制俄罗斯的思维。

然而，后冷战时期毕竟不同于冷战时期。因此，美国在遏制俄罗斯的同时，还期盼能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的安全体系之中，由此导致美俄双方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地缘政治态势。这种地缘政治态势的形成，源自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实力在苏联解体后急剧衰落，由此凸显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的强大，这种实力不对称，确保了美国对自身安全的信心，导致美国决策者认为对于俄罗斯虽然仍需保持警惕，但遏制俄罗斯已不像冷战时期那么迫切。其次，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能力的衰退相伴随的是，即使在俄罗斯对西方态度最强硬的时候，它也没有与西方进行全面对抗。俄罗斯希望改善与西方关系的意愿，进一步排除了美国对俄罗斯展开全面遏制的必要性。最后，中亚国家的独立，虽然为美国遏制俄罗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和前沿阵地，但美国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给中亚地区带来了诸多的历史遗产及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并非美国一朝一夕便可以取代的，美国认为急切地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并非明智的选择。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的力度虽然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有过波动，但整体而言是比较温和的。这也说明遏制战略并不是美国中亚政策唯一的指导思想。整体而言，遏制战略的残余与“文明冲突论”一道，共同启发了美国在中亚地区针对俄罗斯的政策。正如地缘政治学者马增·拉班（Mazen Labban）所指出的，“一般而言，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期针对俄罗斯执行了一种结合了‘文明冲突’和‘新冷战’的政策。前者强调有必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还需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而后者重复了将俄罗斯从其真实或潜在的盟友中孤立出来的必要性，并致力于遏制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张。”^①美国针对俄罗斯的遏制加整合的政策，一方面反映了遏制战略与“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在中亚贯彻对俄政策的

^① Mazen Labban,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land: Hybrid Geopolitics in the Transcaspian”, *Geopolitics*, Vol.14, No.1, 2009, pp.14-15.

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时期关系的特征。这种特征被拉班称为“混合型地缘政治”(hybrid geopolitics)。

混合型地缘政治与冷战时期盛行的麦金德所理解的地缘政治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当代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之间有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抗强度。混合型地缘政治时代的遏制战略因为混合了“文明冲突论”,而“文明冲突论”是基于对异于西方文明的恐惧,希望以西方文明改造他者文明,因此“文明冲突论”预示了通过同化他者文明以拓展西方文明的解决方案。^①在俄罗斯没有彻底放弃融入西方之前,“文明冲突论”让美国决策者放缓了侵蚀后苏联空间和对俄罗斯进行极端挑衅的步伐。其次,混合型地缘政治为传统地缘政治增添了价值观与规范性的内涵。不是说传统的地缘政治没有规范性的维度,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的地缘政治竞争,已经具备了拓展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不过,混合型地缘政治相对于传统地缘政治而言,规范性成分更高,典型表现为对民主等价值观的拓展,往往只能通过利诱、说教等方式实现,而通过占领别国领土或进行军事扩张移植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已不再具有合法性。最后,混合型地缘政治因为同时受到遏制战略与“文明冲突论”的指引,包含了遏制与整合双重目的。这虽然降低了大国之间对抗的烈度,但其内部依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类似于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不同的是,因为涉及的是相对具体的目标,遏制与塑造可以相互转化,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很难实现融合。这就导致美国中亚政策在追求遏制与塑造这两个目标时,往往根据形势的变化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而且相互转化的过程并不一定衍生出关于理想主义优先还是现实主义优先的大争论。

在明晰了遏制战略与“文明冲突论”共同指导美国中亚政策带来的后果

^① 西方具有消除国际关系中差异的内在冲突,这种冲动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一种是同化他者,另一种是消除他者(可以参见 Na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L.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ew York: Harper Torch, 1992, p.42.)。“文明冲突论”同时包括这两种处理差异的方式。

之后，还需强调“文明冲突论”对美国中亚政策所产生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即美国对中亚地区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后果。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斯拉夫文明虽然与西方文明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相对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敌视态度，斯拉夫文明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仅是一种竞争性和对抗性有限的文明类型。对于亨廷顿来说，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很有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重大挑战，甚至可能颠覆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根据这种认知以及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带来的恐怖回忆，使美国对激进伊斯兰抱有恐惧和疑惑。^①

尽管“文明冲突论”很少在美国决策者论述其中亚政策时得到表述，但美国对于中亚地区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恐惧始终反映在对于中亚事务的思考和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例如有学者认为，克林顿政府在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受到三重目标的驱动。除了能源与遏制俄罗斯，第三重目标是，“存在一种坚定的假定，即认为除非该地区受到具有能力和意愿遏制宗教暴力的世俗精英的统治，否则该地区将成为宗教激进主义的滋生地。塔吉克斯坦内战——（在学者和决策层之间——引者注）被广泛误读为宗教激进主义和支持世俗和稳定的力量之间的对决——加强了这一假定。”^②中亚国家独立后，塔吉克内战证实了美国决策者对于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恐惧，美国在中亚国家独立后要求各国坚持世俗政权性质的强调、在该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以代替伊朗伊斯兰政权模式的努力、默认俄罗斯介入塔吉克斯坦内战和为中亚各国打击极端宗教势力提供的援助等，都能发现美国对“文明冲突论”假定和结论的接受。

“文明冲突论”关于伊斯兰文明的论断，一方面要求美国整合俄罗斯与中亚，另一方面也削弱了美国将俄罗斯驱逐出中亚的意愿。“文明冲突论”首先启发美国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安全和价值体系的努力，并承认俄罗斯作为一种能对中亚各国具有重要影响力、而且本国也面临严重极端伊斯兰挑

① 何健宇：“美国霸权的演进与‘伊斯兰恐惧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4 期，第 125-142 页。

② Pauline Jones Luong, “The 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Central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 102, No.666, 2003, p.336.

战的世俗政治力量，是有其意义的，至少可以牵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可以帮助中亚各国应对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如此一来，基于“文明冲突论”这种内在的矛盾性质，如何才能解决中亚地区的极端伊斯兰问题并最终实现遏制俄罗斯的目标呢？在这一方面，“民主和平论”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启示。

“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思想的根源来自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康德认为，国际行为体为共和制国家，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布鲁斯·鲁西特（Bruce Russett）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致力于在民主政体与国家间战争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并将民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理论——民主和平论。^①杰克·列维（Jack Levy）甚至认为，“民主和平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经验法则”。^②然而，在学术界，“民主和平论”面临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认为对于何谓“民主国家”的界定取决于研究者的偏好与所研究的数据，很难实现对概念的一致认可；历史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不足以在民主与战争之间建立起统计相关关系；民主和平论具有将国际关系中发生的战争责任推卸给非民主国家的道德偏见等。^③

“民主和平论”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直接影响。不论民主和平论在研究

①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12, No.3, 1983, pp.205-235;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12, No.4, pp.323-353;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0, No.4, 1986, pp.1151-1169;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tc.

② Jack 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8.

③ 石之瑜、殷玮、郭铭杰：“原子论是国际政治学的本体？——‘社会建构’与‘民主和平’的共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Bruce Russett,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Yet it Mov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4, 1995;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2, 1995; Anna Geis, Lothar Brock, Harald Muller, eds., *Democratic Wars: Looking at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tic Pea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uzzle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Geo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5, etc.

者中引发了怎样的争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决策者受到民主和平论的影响，据此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保障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最佳途径，在于促使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这种认知衍生出美国希望向海外出口美国政治模式的强烈冲动。这在美国中亚政策中有明显表现，而且在苏联解体后表现得更明显。苏联的解体，为美国根据自身的意愿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能力与意愿。在能力方面，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面临共产主义力量的重大挑战，美国的实力保证其可以至少在前苏联地区推广民主价值观。在意愿方面，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出，西方将传播民主和自由市场体系视为指导各自国家外交政策和追求国家安全的原则。能力与意愿的结合，共同促使美国将塑造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在其中亚政策目标中，将民主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即源自美国决策者对“民主和平论”的信仰。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明确用民主和平论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指导和论证。当时，克林顿政府提出“接触与扩大”战略。所谓扩大，主要内容就在于拓展美国价值体系与政治模式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重点在于通过将前苏联国家塑造为民主国家，以及通过增强新独立国家与西方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实现前苏联地区和国际体系的和平和繁荣。在1994年向美国商业协会发表演讲时，克林顿表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确保我们的安全以及建立持久安全的最好战略，在于支持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民主”。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更将传播民主视为一种“战略使命”。^①

到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因为其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基础，美国更将其外交政策牢牢嵌入到“民主和平论”的框架之内。美国的单边主义不仅将推进民主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和世界安全的最优战略，而且还将推广民主价值观作为消灭恐怖主义及其滋生土壤的最佳途径和必要条件。等到2004年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提出，“民主和平论”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赖斯还于2005年12月撰写了一篇题为《民

^① Andrew M. Essig, *Managing Instability: America's Pursuit of An 'Expansion' Policy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p.4-5.

主和平论的承诺》的文章，尽管赖斯主要针对的是中东地区，但关于拓展民主的承诺在中亚地区同样是适用的。

对于小布什政府支持和鼓励“颜色革命”的行为，如果考虑到美国决策者对“民主和平论”的信仰，便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理解。“颜色革命”在前苏联国家的扩散，被美国视为在该地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良机，也是美国向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提供长达十几年公民社会援助取得成果的证明；再者，“颜色革命”后出现的亲西方政权，让美国看到了削弱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中影响的机会。实现塑造与遏制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美国对“颜色革命”的支持。然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的发生，证明美国的期待并不符合该地区的政治发展趋势，并让美国遭受战略损失。然而，美国决策者并未因此而放弃民主价值观对其中亚政策的指引。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虽然在民主推进问题上更为谨慎，不过他依然将推进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视为美国中亚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这意味着民主和平论对美国决策者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

综上所述，美国中亚政策是具有比较连贯的指导思想的，尽管这里所说的“指导思想”并非一种内在完整的理论学说，而是战略与理论之间的复杂组合。遏制战略在后冷战时期的持续影响，“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在冷战结束前后的兴起，共同为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思想基础，并明确了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当然，不可否认，遏制战略、“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体现在：遏制战略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与伊朗；“文明冲突论”一方面要求防范俄罗斯，另一方面需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防止激进伊斯兰力量的蔓延；“民主和平论”则致力于通过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防止恐怖分子势力的兴起并吸引中亚国家奉行亲西方政策，从而间接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三种指导思想中最为明显的矛盾是遏制俄罗斯与整合或借助俄罗斯之间的张力。尽管存在这些内在的紧张，但无论是遏制战略的残余，还是“文明冲突论”与“民主和平论”，均有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比较系统的观点，三者共同指导着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回顾起来，在美国中亚政策的三种指导思想中，遏制战略的残余与“民主和平论”的影响比较明显，美国

决策者也不掩饰两者对其中亚政策的影响；而“文明冲突论”则往往隐而不彰，只有通过观察和推断才发现其影响。下文将通过考察美国关于中亚政策的相关文件、美国参与中亚事务决策官员的相关表述，以及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者的相关论著，以揭示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三重战略目标。

三、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一：遏制

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过程，始终与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政策联结在一起。俄罗斯针对西方的思维虽然屡经变化，但其中一个不变的主题是俄罗斯认为西方在国际事务中并未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以及未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针对西方外交政策的动力，是旨在“为承认而斗争”。^①至于在中亚地区，美国非但未满足俄罗斯的“承认”要求，而是以遏制俄罗斯为战略目标的。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所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为俄罗斯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留下了诸多的遗产。即使到了今天，俄罗斯依旧与中亚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美国决策者与学者有清醒的认识。例如，有美国的中亚研究者指出：“如果不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进行分析，那么将无法理解当代中亚”。^②“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中亚地区像俄罗斯一样拥有众多的利益，以及具有保证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能力”。^③“权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尽管俄罗斯的权力已落后于西方和中国（甚至可能落后于将来的印度），它仍然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大国，事实上中亚是俄罗

① 可参考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2, 2002, pp.115-136; Michael C. Williams and Iver B. Neumann, “From Alliance to Security Community: NATO, Russia, and the Power of Identi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2, 2000, pp.357-387; Iver B. Neumann and Jennifer M. Welsh, “The Other in European Self-definition: An Addendum to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 No.4, 1991, pp.327-246.

② Marlène Laruell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in Emilian Kavalski, ed.,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New Jersey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0, p.149.

③ Mariya Y. Omelicheva,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144.

斯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称之为大国的地区”。^①“俄罗斯—中亚这一体系的权力平衡无疑主导性地偏向俄罗斯，尽管面临许多问题，这一结构性的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改变”。^②诸如此类的观点，充分说明美国的中亚问题研究者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亚并非美国在冷战后遏制俄罗斯的全部舞台，俄罗斯也非美国在中亚地区致力于遏制的唯一对象（还包括伊朗与中国）。不过，鉴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影响，美国中亚政策的诸多方面以及在该地区所开展的诸多外交活动，不可避免具有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的内容。中亚之所以成为美国遏制俄罗斯的一个平台，除了关于中亚构成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的说法对美国决策者认知该地区重要性产生的影响，还有历史原因。对于前者，有美国学者指出，“欧亚地区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国家和人口、拥有最为重要和最为丰富的矿产与资源储备、最具毁灭性武器的地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冲突出现在欧亚。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圣地位于欧亚。中亚恰恰处于欧亚的中心地带”。^③对于后者，对于俄罗斯的恐惧始终困扰着美国决策者，而遏制俄罗斯，则是这种恐惧带来的自然反应。如有人指出：“尽管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对西方抱有一种友好的姿态，而且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不过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扩张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④截至目前，冷战结束已经二十余年，但美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并未摆脱零和性的思维方式。在中亚地区削弱俄罗斯的影响，构成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战略目标之一。

苏联解体之初，尽管就对俄罗斯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曾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过混乱，但遏制俄罗斯随即成为美国针对新独立国家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历了明显的权力收缩，而且当时的

① Rajan Menon, “Introduction: Central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6.

② Rajan Menon and Hendrik Spruyt, “The Limits of Neorealism: Understanding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1999, p.89.

③ 见 Eugene Ru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61.

④ Anders Aslund, *How Capitalism was Bui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86.

叶利钦政府也曾明确指出，要加强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俄罗斯融合到欧洲一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目标。然而，对于俄罗斯的示好，美国并未迅速采取行动。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错过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时机。等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接触与扩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战略。^①表面上，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似乎让位给了接触政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表示，美国应该“将培育民主和市场的宏大目标和我们更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结合起来”。^②至于更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在中亚地区就是通过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促进中亚各国的独立。在论述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时，美国的中亚学者和决策者习惯使用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爵士关于“心脏地带”的隐喻，认为对于心脏地带的控制，将对美国的全球地位及其海外投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将决定美国在 21 世纪能否继续主导国际体系。^③

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对美国决策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美国在中亚地区极为关注的，是对中亚国家的民主的援助和发展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的里海能源

① 该战略由 1994 年 7 月克林顿政府上任后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所谓“接触”，是指美国政府应该坚持并加大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介入，拒绝那种认为冷战后美国应该退守到独身其身状态的观点；所谓“扩大”，是指通过介入包括前苏联和中东欧地区的国际事务，美国可以更好地巩固自身的利益，以及推进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接触与扩大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其国家战略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的转型。

② 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C.: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关于麦金德理论及对美国决策者影响的讨论，参见 Simon Dalby, “American Security Discourse: The Persistence of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9, No.2, 1990 pp.171-188; Nick Megoran, “Revisiting the ‘Pivot’: The Influence of Halford Mackinder on Analysis of Uzbekist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70, No.4, 2004, pp.347-358; Nick Megoran, “The Politics of Using Mackinder’s Geopolitics: The Example of Uzbekista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4, No.34, 2005, pp.89-102; Nick Megoran and Sevara Sharapova, “Mackinder’s ‘Heartland’: A Help or Hindrance in Understanding Central As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4, No.34, 2005, pp.8-20; Ulugbeck Khasanov, “On Modern Geopolitical Pluralism or One-Nation Hegemonism”,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Vol.4, No.34, 2005, pp.29-36; Chris Seiple, “Uzbekistan: Civil Society in the Heartland”, *Orbis*, Vol.49, No.2, 2005, pp.245-259; Chris Seiple, *Revisiting the Geo-Political Thinking of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United States-Uzbekistan relations, 1991-2005*, PhD dissertation,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2006, etc.

出口管线。这明显具有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影响的意图。从安全角度来说，美国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帝国潜力。许多人认为，美国加强与中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关系，可以让俄罗斯克制自己的行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需要遏制中国和伊朗的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总体而言，美国鼓励土耳其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让自己耗费大量的资源。那种希望美国与中亚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论点，因中亚国家糟糕的人权纪录而遭到削弱，由此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议，这些争议涉及如何向美国国会、人权组织和其他集团解释这种政策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美国对遏制战略目标的追求虽然不是非常明显，但已现雏形。^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学术界和决策者就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就是削弱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扩张，将伊朗排斥出该地区的互动之中，以及抵御国际威胁。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认为，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崛起中的严重挑战，需要在中亚实施一种试错性的战略即遏制。^②因此，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接触和扩大”战略，日益强调政策的“扩大”方面，而“扩大”看起来日益像遏制。因此，在美国中亚政策主要关注里海能源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美国公开和侵略性地将实力范围与战略触角拓展到俄罗斯撤出后留下的空间。援助项目也开始向有助于拓展美国在中亚地区利益的国家倾斜，比如开发油田和建设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管线、强化乌兹别克斯坦的疏俄倾向等。这些利益都是战略性的，而且源自于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和关切。

根据这种战略，中亚成为美国追求遏制俄罗斯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美国试图拉拢该地区的政府精英，这被视为降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依赖的最有效手段，同时也防止他们倒向中国。相应地，美国中亚政策的主要目标被设

① Olga Olikier,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9-10.

② Barry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U.S. Grand Strategy”, in Robert J. Leiber, ed., *Eagle Adrif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Longman, 1997, pp.116-117.

定为“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至于会对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脆弱主权构成威胁的所谓“地区性的霸权性国家”，美国所想的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尤其是前者。^①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认定俄罗斯会对中亚国家的独立构成威胁，并非基于俄罗斯的现行政策，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并未积极介入中亚事务，而是主动从中亚地区撤出其影响力。然而，美国对俄罗斯扩张历史的记忆以及对俄罗斯文化的偏见主导了美国决策者对俄罗斯中亚政策的认知。例如有学者指出：“尽管 21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剧变，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的国际角色，但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的权力，影响到俄罗斯的地缘角色和精英们关于国家的思考。尽管虚弱的俄罗斯不太可能进行全球冒险主义和提出严重的挑战，有影响的美国政治人士仍然认为，俄罗斯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塑造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针对中亚战略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和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西方文明家庭之外的成员。为了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主导地位，西方需要维持俄罗斯的虚弱，并将其排斥在西方文明圈之外。他们认为，对于其邻居——包括高加索和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仍是一个威胁。根据他们的观点，俄罗斯越虚弱，它所带来的威胁就越小。基辛格在苏联解体之初表示：“俄罗斯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冲动，就是恢复莫斯科曾经控制的各地区的主导地位”。基辛格反复表示对于俄罗斯经济改革成功的担心：“如果俄罗斯的改革带来俄罗斯静悄悄的渗透——事实上，这是其邻居都极为恐惧的——那么俄罗斯对主导地位的寻求，迟早会引发冷战式的反应”。^③相似地，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前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任务，就是加强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来反对俄罗斯。他指出：“为平衡起见，西方人既要避免让俄罗斯的西方化者失望，也要避免让他们变弱”。^④

① Evgeny F. Troitskiy,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Global Society*, Vol.21, No.3, 2007, pp.416-417.

② Elaine M. Jordan, *Containment with A New Face: United State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spian, 1989-2000*, Ph.D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3, p.11.

③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815.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102.

除了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美国国内舆论对于能否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也持怀疑甚至警惕的态度。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扩张主义是俄罗斯人的DNA”。^①其他人则指出，俄罗斯在历史上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循环。根据这种观点，俄罗斯精英很有可能走出收缩的模式重新扩张。^②处理北约东扩问题的大部分美国出版物，都主张遏制俄罗斯可能的威胁，以此削弱俄罗斯对其邻居的影响。像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和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等人均持这种观点，认为北约东扩有助于遏制俄罗斯的扩张趋势。^③他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理由让美国考虑来自俄罗斯的可能威胁以及坚信俄罗斯可能重建沙俄和苏联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历史、石油和欧亚主义。它们为美国决策者和研究者认为俄罗斯带来了挑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不仅如此，这三种解释全部集中在里海区域，因为这一区域构成了“资源富裕的南亚和中亚与西方之间的天然沟通桥梁”。^④

中亚地区构成美国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前沿阵地。当把中亚纳入美国的遏制范围之内，一旦成功，将增强美国主导世界的可能。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德姆（William Odom）指出，美国此前实施遏制政策，主要依靠两个地区，即欧亚一端的西欧和另一端的日本和韩国。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战争，以及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此投放力量，导致美国将中东打造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个区域。他认为，里海地区构成第三个战略区域的延伸，而且由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连接着欧洲和亚洲，因此该地区具有尤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奥德姆认为，美国需要重视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避免在这里出现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⑤当然，除了遏制俄罗斯，

① George Will, “Eastern-Ho-and Soon”,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96, A.29.

② Sherman Garnett, “Russia Power in the New Eurasia”,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15, No.1, 1996, p.31.

③ Elaine M. Jordan, *Containment with A New Face: United State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spian, 1989-2000*, Ph.D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3, p.186.

④ Scott A. Jones, “Introduction”, in Gary K. Bertsch, Cassidy Craft, Scott A. Jones and Michael Beck, eds., *Crossroads and Conflict: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2.

⑤ William E. Odom, “US Policy towards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Caspian Crossroads*, Vol.3, No.1, 1997.

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伊朗，这是另一个与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展开竞争的地区行为体。正如 1998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指出的，“美国不会允许一个敌对国家主宰任何一个对我们利益极为重要的地区”。^①当然美国遏制的重点仍然是俄罗斯，毕竟在中亚，伊朗的影响力远不如俄罗斯。因此，美国在中亚地区“真实承诺的目标在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把这些地区牢牢整合进西方，并打破俄罗斯的垄断”。^②然而，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美国致力于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削弱和遏制俄罗斯的影响，但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有赖于俄罗斯的配合与合作。如稳定塔吉克斯坦局势、应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发能源资源（西方能源公司投资的某些管线需要经过俄罗斯的领土）等。由此可以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中亚地区执行了一种相互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美国致力于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并不愿意明确对抗俄罗斯。

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的首要证据就是发展多元化的能源出口路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年开始，美国致力于推进高加索和中亚能源出口管线的多元化。美国宣称，此举既可以增进美国和世界的能源安全，又可以有效保证中亚与高加索国家的真正独立和经济繁荣。但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似乎只是一个幌子。首先，里海地区的能源在美国的能源进口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而里海地区的天然气并不能有效地抵达国际市场，同样不能有效影响美国的利益。^③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那里，里海能源的储量往往被夸大，尤其是被美国国务院夸大，其目的在于为美国介入中亚提供一种理由或一种合法性的论证。^④1998 年 4 月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就指出，美国能源部关于里海地区石油储量高达 2000 亿桶的预测不过是夸大其辞。据前者估计，该地区的石油储量处于 250-300 亿桶之间，相当于

① 转引自 Stephen J. Blank, *U.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0, p.4.

② Stephen J. Blank, “Instability in the Caucasus: New Trends, Oil Traits_ Par 1”,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1998.

③ Olga Oliker,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2005, p.6.

④ Mazen Labban,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land: Hybrid Geopolitics in the Transcaspian”, *Geopolitics*, Vol.14, No.1, 2009, p.6.

北海的石油储量。^①不仅如此，美国仅从该地区进口少量能源，中亚石油生产对于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并不大。另外进行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推理，也可以说明能源并不构成美国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优先目标。相对于里海地区，世界上其他的石油生产区并未得到美国同样的关注。媒体很少提及安哥拉、赤道几内亚、东帝汶的石油开发或者南美和西非地区能源管线的发展。有学者注意到，“在墨西哥、委内瑞拉、西非和其他地区发现了新的石油，但这里的石油并未吸引同样的注意力”。原因是，在这些地区“美国并不拥有如此多的竞争对手，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有如此多的大国以及公司在竞争”。^②

由此可见，美国对里海能源感兴趣，并非能源本身的意义，而在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③正如布兰克所指出的：“为了确保实现这个目标（即获取中亚地区的能源——引者注），我们必须致力于让各国政府确立开放市场——例如向美国公司开放（而且不仅仅是能源）——和民主。我们必须抵制那些国家在军事全盘倾向俄罗斯。我们或在能源方面、抑或通过渗透或控制各国的国防机构以防止莫斯科或德黑兰主导该地区的决心，至少可以追溯到 1994 年。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经济考虑，并不与我们帮助这些新国家确保其独立和完全主权相矛盾。相应地，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则与我们更为广泛的地区性途径（regional approach）相一致。我们的整体战略目标与军事目标相契合，那就是防止俄罗斯霸权的死灰复燃和出现一种新的伊朗霸权，同时保障美国及其盟友获取核心和关键性的能源资源。”^④

美国对里海能源的兴趣仅仅是第二位的，美国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打破俄

① Stuart Parrott, “Caspian Sea: Report Warms against Exaggerated Expectation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4 April 1998, 转引自 Bülent Aras, “The Caspian Region and Middle East Securit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13, No.1, 2002, p.94 note 16.

② Stephen Kinzer, “On Piping Out Caspian Oil, U.S. Insists That Cheaper, Shorter Way, Isn't Bett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1998.

③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美国对里海能源不感兴趣——有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流入全球能源市场，无疑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该地区的能源并不足以使其构成美国中亚政策中的优先性。

④ Stephen J. Blank, *U.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0, pp.5-6.

罗斯对中亚能源出口的垄断。这就涉及美国介入里海能源的第二个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欧亚事务主管赫斯林（Sheila Heslin）曾经指出：“美国不能承担让俄罗斯和伊朗主导里海能源资源的代价，这将让它们在该地区甚至欧洲都具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明显的趋势是，里海地区不仅是西方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同样是欧亚、亚洲和中东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支点……美国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促进一个全面独立、繁荣和安全的南高加索和中亚的出现，并确保它们与强大的邻国维持和平关系，并与西方建立起强劲的关系，这是美国的战略利益。”^①美国之所以关注里海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并积极活动以促进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管线的实现，并非纯粹只是为了保障中亚国家的经济独立与繁荣，更多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对里海能源出口的垄断，以维护其西方盟友的利益和维持该地区各国独立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方能源公司的利益。

在美国决策者和学者们看来，如果中亚国家的大量能源资源因为缺乏石油和天然气管线而不得受限于俄罗斯，那么它们将不能有效行使独立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中亚能源的平等权利，与确保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一更大的目标密切相关。^②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中国毗邻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该地区即使没有能源，美国依旧会重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③因此，对于美国而言，获得里海地区的能源资源固然重要，但并非美国中亚政策的首要驱动因素。相反，它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其目标就是遏制俄罗斯、中国与伊朗。用布兰克的话来说，就是“反垄断”。这种“反垄断”旨在打破那些致力于削弱中亚国家脆弱的国家主权的力量，“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政策在性质上就是垄断性的。美国的这种反垄断政策，旨在实现美国阻止在欧亚大陆兴起一个帝国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一长期核心地缘战略利益。”^④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投资，与美国对里海能源的关注

① Sheila Heslin, “The New Pipeline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97.

② Stephen Blan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hallenges”, *Demokratizatsiya*, Vol. 15, No.3, 2007, p.314.

③ Dru C. Gladney, “China’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Energy and Ethnic Security”, in R. E. Ebel and R. Menon, eds.,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Lanham: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219.

④ Stephen Blan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hallenges”, *Demokratizatsiya*, Vol. 15, No.3, 2007, p.314.

一样，“一般被视为加强中亚国家的独立地位，以及防止俄罗斯、中国、伊朗或其他国家压制它们”。^①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之一是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美国除了通过能源管线遏制俄罗斯之外，美国在中亚遏制俄罗斯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对此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艾莱恩·M·乔丹（Elaine M. Jordan）通过四个案例来考察 1989-2001 年间美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这四个案例是：美国对合作减少威胁项目的资助、北约东扩^②、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里海能源管线问题。根据乔丹的结论，美国在里海地区持一种明确遏制俄罗斯的立场。^③到了 21 世纪，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的趋势愈加凸显。虽然 9.11 事件后美俄关系得到了改善，但双方并未彻底消除在双边关系和中亚问题上的分歧。在中亚，美国依旧没有放弃遏制俄罗斯。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驻军玛纳斯军事基地的权利，俄罗斯不久之后即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坎特军事基地，并将驻塔吉克斯坦的 201 摩托化步兵师升级为常驻军事基地，说明了俄罗斯对美国的防范。当“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兴起时，美国致力于通过政权更迭的手段侵蚀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削弱俄罗斯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尽管西方决策者和研究者尝试将普京打造成“阴谋论”的信奉者，^④然而美国支持和推动“颜色革命”的倾向却明显不过。奥巴马

①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458, May 3, 2012, p.2.

② 有学者认为，20 世纪北约东扩并不一定是直接针对俄罗斯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1）北约可以对南斯拉夫进行强制，但是不太可能对俄罗斯使用武力；（2）北约在使用武力问题上需要成员国之间的一致同意，在对俄罗斯使用武力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3）俄罗斯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因此核威胁仍然是有效的；（4）北约宣称其目标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目的在于确保中东欧地区的稳定，而且美国的文官们支持东扩而军官们则反对东扩。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安全能带来一定的积极效果。俄罗斯担心出现一个修正主义的德国和一个破碎化的欧洲，它们的民族主义安全政策会带来动荡。北约的存在及其扩大能够降低这些威胁。Christian Thorun, *Explaining Change in Russian Policy: The Role of Ideas in Post-Soviet Russia's Conduct Towards the We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66-67.

③ 参见 Elaine M. Jordan, *Containment with A New Face: United State Foreign Policy in the Caspian, 1989-2000*, Ph.D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3

④ Pavel K. Baev, “Turning Counter-Terrorism into Counter-Revolution: Russia Focuses on Kazakhstan and Engages Turkmenistan”, *European Security*, Vol.15, No.1, 2006, p.16; Rein M ullerson, *Central Asia: 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74.

政府上台以来，虽然俄美关系正在经历“重启”的过程，但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冲动并未消失，美国对俄罗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各种语言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遏制中国在美国中亚政策中的分量日益加重。有些美国学者甚至建议，美国需要关注新疆问题，以备必要时向中国施压以牵制中国崛起的步伐。如格拉汗·富勒(Graham E. Fuller)与弗里德里希·斯塔尔(Frederick Starr)就指出：“认为在未来的危机或对抗的情况下，绝对排除中国的对手打‘维吾尔牌’以向中国施压的意愿，是不切实际的”。^①查尔斯·霍纳(Charles Horner)同样相信，“新疆问题构成中国结构性的虚弱之处。美中关系一旦恶化，关注这一结构性问题将对美国构成诱惑”。^②当然，通过干预新疆问题来牵制中国，只有在中美关系恶化到极为严重的情况才会出现。截至目前，中美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既有相互竞争的维度，也有共享利益的领域，双方并未表现出严重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遏制中国仅仅是美国中亚政策的部分内容，并不像遏制俄罗斯那么明显。至于未来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过程、中国新疆局势的发展以及双方在中亚地区利益的耦合程度。至于遏制俄罗斯和伊朗，估计在未来仍将是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主题和战略目标之一。

四、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二：整合

美国在中亚遏制俄罗斯，是与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整合进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同时进行的。不过，对于俄罗斯的整合，是以一个被遏制的俄罗斯为前提的；而对俄罗斯的遏制，则是以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体系为目标的。对于俄罗斯既遏制又整合的双重目标，导致美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及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充满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寻求与西方平等的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

^① Graham E. Fuller and Frederick Starr, *The Xinjiang Problem*, Baltimore: Central Asia Caucasus Institute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 p.46.

^② Charles Horner, “The Other Orientalism: China’s Islamist Proble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67, 2002, p.45.

的确渴望融入西方。然而，西方希望以一种二等伙伴的身份接纳俄罗斯的意图与做法，让失望的俄罗斯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身份并修正自己的全球战略概念，并在诸多国际问题上展示出与西方有别的积极、独立、主动的外交政策姿态。俄罗斯仍然希望实现与西方的整合，然而这种整合必须以尊重俄罗斯的平等地位和大国诉求为前提。这样，便导致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与西方希望整合一个被遏制的俄罗斯这一目标相矛盾。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持续互动，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的大国雄心。从1996年普里马科夫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一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展示了与其实力并不相称的大国姿态与外交风范，西方的整合诱饵并未能迷惑俄罗斯，西方遏制俄罗斯的目标自然也没有实现。^①西方既整合又遏制俄罗斯的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最明显地体现在2011年西方为奖励俄罗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上的合作而将俄罗斯接纳到北约框架中的制度设计中。西方一方面希望通过北约接纳俄罗斯以改善与俄的关系，另一方面，西方并不愿意赋予俄以北约全面成员国的身份。对于这一尴尬的制度设计及其动机，有学者作过深刻的分析：“北约2002年将俄罗斯包括进来，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缓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焦虑，同时也缓和西方对俄罗斯潜在扩张的焦虑……将俄罗斯整合进北约，能解释为试图通过将其视为盟友而加以遏制，而且这种遏制并不反对整合，而是通过遏制来实现整合，是作为帮助俄罗斯走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允许出现一个对美国领导下的全球资本扩张构成威胁的‘复兴了的俄罗斯帝国’。”^②

叶利钦在冷战结束初期，对于发展与西方的密切关系甚至与其结盟的观点兴趣盎然，认为西方会帮助俄罗斯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这反映了俄罗斯最初对于融入西方的热切期盼，然而这种尝试和希望被证明是错误的。叶利钦政府初期，俄罗斯西方政策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根本未考虑到西方对俄发展方向、其核武器和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以及其政治和经济动荡等所具有的疑虑，未能意识到西方对俄罗斯所具有的深刻恐惧和不信任。通过试

① 关于在后冷战时期俄美两国在里海地区互动的研究成果很多，对这些成果的梳理可参考 Mazen Labban,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land: Hybrid Geopolitics in the Transcaspian”, *Geopolitics*, Vol.14, No.1, 2009, p.23.

② *Ibid*, p.16.

错，俄罗斯越来越突出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且对于西方整合俄罗斯所作的回应，往往以西方是否尊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前提。就此而言，西方与俄罗斯的战略虽然都有整合的目标，但西方以遏制为前提的整合与俄罗斯期待的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整合是完全不同的，这决定了双方的整合过程必然摩擦不断。

美国介入中亚，同时涉及整合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当然对前者往往服务于遏制的目标，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涉及塑造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对于整合中亚各国这一目标，早在中亚国家独立伊始即已明确了。这首先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接触和扩大战略密切相关，尤其与苏联解体后各新独立国家表达的向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的愿望有关。^①苏联的解体，为中亚国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获得西方的物质和话语支持提供了大好机会。不论各国决策者是否相信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通过表达自身有意采取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中亚国家可以有效吸引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并从西方国家获得支持。而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随着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解体，它们非但不再面临共产主义力量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和自由市场观念的大好机遇，进而为拓展和扩大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奠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将推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系，作为它们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扩大”的战略，旨在利用多边机构“作为保证新独立的民主国家的稳定并将它们纳入到西方民主世界中的机制”，^②这些机制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因此，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将世界各国整合进全球经济之中，并且推进民主价值观的传播。美国的决策者选择通过各种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把其他大国对权力的追求限制在宪政秩序的范围之内，并在全世界推进由促进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构成的双重意识形态体

① Sherman W. Garne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spian Basin”, in Sherman W. Garnett, Alexander Rahr and Koji Watanabe, eds., *The New Central Asia: In Search of Stability.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Trilateral Commission, 2000, pp.20-38.

②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5.

系。他们相信，这有助于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的主要努力集中在东中欧国家。整合这些国家的机制包括北约和欧盟东扩。至于在里海地区推进整合目标的重要性，克林顿如此表示：“古丝绸之路所发生的一切，对俄罗斯的未来、欧洲的安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全球经济的状况以及美国经济的增长都将产生影响”。^①

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目标，同样体现在美国关于该地区的法律文件及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中。对于美国希望将中亚和高加索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企图，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曾作过最为清晰的阐释：“我们正在拓展的是欧洲、事实上是大西洋公民空间。我刻意将军事安排囊括到‘公民空间’（civil space）的界定当中。二战后西欧国家的经验表明，政治、经济进步和安全一体化是密切相关的。”^②这种在中亚各国致力于发展公民社会以及从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整合中亚的尝试，首先出现在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中。美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首先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目标一，促进民主制度建设、法制和发展公民社会；目标二，帮助确立开放式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和扩大贸易和投资计划；目标三，通过合作减少威胁（CTR）项目与核不扩散项目，可以加强美国与新独立国家的安全。^③这三个方面的目标与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前两个目标关系到通过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为西方整合中亚国家奠定基础。

1999年美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明确指出：“美国支持中亚与高加索国家通讯、运输、教育、卫生和能源等必要基础设施的发展，支持东西轴线的贸易，以加强这些国家彼此间以及与稳定的、民主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商业联系”。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认为：“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各国与西方各国之间日益加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联系，将巩固这一地区的稳定，降低来自南部、北部和东部的政治与经济压力”。

① “Clinton Remarks at Signing Ceremony for Caspian Pipelines”, *Washington File*, 18 November, 1999, 转引自 Andrew M. Essig, *Managing Instability: America's Pursuit of An 'Expansion' Policy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7.

② Sean Kay, *NATO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p.108.

③ Anthony R. Biche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entral Asia: The Virtual Reality of Realism, Critical IR and The Interne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pp.94-103.

而 2006 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同样关注整合目标。该法案表示，美国将“支持该地区的国家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援助以促进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改革；扩大对该地区国家无条件永久性的非歧视性待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特别是对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从 1999 年与 2006 年美国《丝绸之路战略法案》的这些表述来看，美国虽然致力于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经济与安全体系中，但相对中东欧等属于前苏联阵营的国家，美国为此投入的资源和注意力都较为有限。这种态度上的模糊和低姿态，部分缘于美国对该地区加入欧盟与北约前景渺茫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俄罗斯在该地区突出的影响力。

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措施，除了经济援助和将中亚国家纳入到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之中，经济整合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其中能源管线多元化又构成其中的重点。如前所述，美国决策者认为，里海能源不仅有助于缓解西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而且还有助于促进里海沿岸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独立。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里海能源除了有助于打破俄罗斯对该地区经济的垄断之外，还有助于促进整合中亚国家这一目标。美国对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兴趣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并不能与美国经济实现互补，以及该地区没有太多吸引美国投资的机会。此外，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制度也不明朗。这些均导致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不足以驱动美国整合中亚的战略目标。具体到各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对外商的各种严苛的限制，导致许多即使进入该国的外商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土库曼斯坦从来就没有创造一种友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外资。塔吉克斯坦虽然对外资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很少有东西值得投资。在哈萨克斯坦，虽然已有实质性的投资，但这些外来资金几乎全部集中在能源领域。而且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对外资的态度变化，使其商业环境不如以前友好。至于吉尔吉斯斯坦，情况与塔吉克斯坦的情况很相似。因此，如果不实施显著的改革，美国是不会向该地区投入大量资金的。^①

然而，至少在官方场合，美国在中亚地区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要将中亚国

^① Olga Olikier,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2005, p.7.

家（及部分高加索国家）纳入到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结构之中。这种整合目标，要求美国督促这些政府推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如美国负责能源、制裁和商品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拉姆泽（William Ramsey）认为，中亚和高加索国家能够使用它们的能源资源发展独立的和市场取向的经济，“我们能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解决或至少缓和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关系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①美国官员相信石油财富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进而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把参与该地区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建设东西向的能源管线来促进各国的稳定和支持各国独立上。这种整合的方向，既可以缓解土耳其和美国的欧洲盟友的能源进口压力，同时也使各国在经济上依赖这些西向能源管线。西向能源管线，的确强化了中亚国家与西方经济整合的深度，促使中亚各国在开展经济活动时不得不考虑西方能源进口国的关切，并逐渐深化对西方国家的认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各国脱离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结构。如此一来，“西方尝试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将中亚国家整合进大西洋共同体的尝试，与俄罗斯尝试通过独联体将前苏联国家整合进一个经济—政治—军事联盟的目标相冲突。”^②换句话说，整合中亚国家，同时又是遏制俄罗斯的一种手段，两者密不可分。

中亚地区存在的各种风险，同样激发了美国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政治—安全体系中去兴趣。自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对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美国始终怀有敌意，尤其担心宗教激进主义在全球的扩散。中亚国家独立以后，伊朗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导致美国积极支持土耳其拓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对伊朗的影响进行牵制。另一方面，俄罗斯共享美国对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惧。美国认为，在影响中亚国家方面，俄罗斯是相较于伊朗而言可以接受的力量。基于这种认知，美国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对于俄罗斯介入塔内战持一种默许的态度。然而，1999年和2000年乌兹别

① Stuart Porrott, “Central Asia: Pipeline Superhighway Replaces the Silk Road”, RFE/RL, 19 November 1997, 转引自 Andrew M. Essig, *Managing Instability: America's Pursuit of An 'Expansion' Policy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188.

② Stephen J. Blank, *U.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0, p.3.

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入侵事件，尤其是 9.11 事件，让美国意识到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猖獗。

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对整合中亚国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注意力。如在 2002 年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所作的报告中，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指出：“在中东延伸到东北亚的广大地区存在着一条广阔的动荡之弧，这一地带是由许多正在崛起或正在衰落的地区大国构成的脆弱复合体”。^①根据这一判断，中亚构成了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动荡之弧”链条中的部分环节。此外，中亚国家构成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说的“全球化间隙”（interstices of globalization）或汤姆斯·巴纳特（Thomas P. M. Barnett）所称的“非整合性鸿沟”的一部分。对于美国来说，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全球化间隙”和“非整合性鸿沟”是不可接受的。^②整合这些动荡之弧、间隙与鸿沟，既是美国确立其霸权的手段，也是维护其安全的手段，两者不可分割。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整合中亚国家，均是美国中亚政策不可避免要追求的内容。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不同的是，整合中亚的主要手段，从此前的经济手段转变为越来越采取一种军事化的形式。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整合中亚与遏制俄罗斯相并行，而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塑造中亚为前提的。整合是指西方尝试将中亚国家纳入到西方体系之中，然而，这种纳入需要有一定的前提，即中亚国家已经或者正按照西方确立的标准进行国家建设，或者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在西方看来，只有中亚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并采用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确立了市场经济原则，中亚国家才有进入并融入西方共同体的资格，才能摆脱它们的“全球化间隙”和“非整合性鸿沟”的身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则要求美国首先对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塑造。如此一来，遏制、整合与塑造，就成为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对此，史蒂芬·布兰克指出：“在中亚与高加索地区，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02, <http://www.defenselink.mil/execsec/adr2002/index.htm>(accessed October 14, 2004)

② Neil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4.

美国采取了一种参与和扩大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战略……美国的目标在于将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不可逆转地整合（integrating）进西方国家体系之中，这也使它们日益成为与俄罗斯展开对抗（international rivalry）的焦点……此外，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是一个敏感的地区，可以用来检验美国参与战略及其军事成分的合理性，该战略的目标在于按我们期待的方向对该地区的环境进行塑造（shape）。”^①

相较于遏制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整合目标并非紧迫的任务，因此也经常遭到忽视。不过，作为遏制与塑造的中介环节，整合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整合构成了美国中亚政策的一个远景目标，引导着美国在中亚塑造各国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的努力。

五、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三：塑造

美国对于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极感兴趣，这是美国自认为能够实现遏制和整合双重目标的前提。这种塑造的目标，自美国开始介入中亚地区起即已明确。华盛顿希望通过经济 and 军事援助、施加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压力，来推进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让各国走上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公民社会的发展道路。1991年12月11日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前五天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强调了美哈关系发展的五个基本原则：尊重现有边界；尊重民主和自由选举；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人权；尊重国际法和义务；尊重符合民主价值观的自决。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就开始了对于中亚国家的民主说教，以期将中亚国家引导至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贝克警告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坚持五项原则不仅对于美国的政治支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来说同样如此。^②

在美国各种关于中亚政策的文件中，同样体现了美国致力于塑造中亚国

① Stephen J. Blank, *U.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0, p.iii.

② Jonathan Aitken, *Nazarbayev and the Making of Kazakhsta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Continuum, 2009, pp.138-139.

家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的倾向。如美国国会在1992年10月通过的《自由支持法案》，就规定在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时，美国应致力于实现三个方面的援助目标：（1）旨在促进发展一种竞争性和市场取向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大多数资源由私人所有和管理；（2）旨在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3）旨在帮助各国将“法治”概念纳入到宪法实践中，并且提高对民主制度和实践的理解。^①从美国的这些举动可以发现，从一开始美国就确立了改造中亚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目标。至于1999年和2006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更为美国塑造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明确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力度联系起来。如1999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宣称，美国将“促进并加强独立自主、主权、民主政府，尊重人权”，而且详细规定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应该采取的各种政策举措。2006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继承了这一精神。

在早期，美国督促中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改革，首先在于防止苏联的死灰复燃，最终引导它们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美国决策者坚信，通过提供援助，可以改变该地区统治者和民众对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认知，并做出建立民主制度的承诺。^②基于这一假定，西方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很大程度被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等目标所引导。援助的重点和方向一方面受到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尝试在中亚国家引入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之成为冷战后援助结构的一部分。改革不仅通过具体项目得以启动，而且还通过支持各国政府对于改革经验的渴望或帮助各国制定经济增长的战略得到体现，同时还在卫生、教育、公民社会、农业等领域执行改革项目。

在这种思维框架中，美国针对中亚国家的援助，重点目标在于重组国家

① Anthony R. Biche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entral Asia: The Virtual Reality of Realism, Critical IR and The Interne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p.105.

② Thomas Dine, Assistant Administrator of the Bureau of Europe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eaking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uropean Affairs, 转引自 Anthony R. Biche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entral Asia: The Virtual Reality of Realism, Critical IR and The Interne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p.93.

与社会，以推进援助者的目标，而不像此前在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集中关注提供管理经济增长的经验和进行技术转移。^①至少在一开始，美国的援助致力于消除社会主义的残存，矫正社会主义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此，援助机构全力以赴并且是迫不及待地摧毁苏联时代的国家机构，此后才明确将把各国引入民主和自由经济的轨道视为一种战略目标。然而，当摧毁了此前的国家机构，但未能提供替代性的政治安排时，导致中亚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贫困、毒品走私、教育体系和卫生服务的衰败、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国际援助所引起的，但美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这些问题的产生，而且未能有效帮助中亚国家处理这些问题。^②

为了促使中亚国家走向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美国使用了威逼利诱等手段。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美国主要通过利诱的方式，即向各国提供援助，以吸引中亚各国采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到美国开始介入里海能源，美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促进中亚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议程。这是因为，“直到开展反恐战争，有两个重要的考虑驱动美国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人权问题和俄罗斯。同样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认为中亚是一个战略上遥远而且无足轻重的区域，基于此无需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投入。至于获得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能为美国的介入提供一定的回报，以及美国石油公司的确曾为此进行积极游说，不过经济利益与上述两种障碍因素之间的权衡，阻止了华盛顿和中亚各国之间紧密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塔什干。”^③这种总体趋势，同样体现在美国塑造中亚各国发展方向的意愿与能力上。中亚各国的人权状况，一方面让美国意识到政治和经济改革工作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制约了美国介入到这些问题之中的意愿。

等到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国决策者将加速改造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防止各国沦为虚弱或失败国家视为赢得反恐战争的一个前提，由此导致美国加大了对各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关注力度。特别是“颜色革命”后，这种

① Christine Bichse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 Irrigation Disputes in the Ferghana Val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

② Laetitia Atlani-Duault, *Humanitarian Aid in Post-Soviet Countrie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Andrew Wils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ix.

③ Shahram Akbarzadeh, “U.S.-Uzbek Partnership and Democratic Reform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2, No. 2, 2004, p.278.

关注直接转化为“威逼”。让美国决策者失望的是，“威逼”带来的效果比“利诱”带来的效果要差得多。中亚各国为了避免沦为美国民主推进战略的牺牲品，都调整了自身的外交政策取向，拉开与美国的距离，重新向俄罗斯靠拢。“颜色革命”前后美国在中亚地区政治与经济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美国要求中亚各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的议程，而非中亚各国统治者的议程；其二，在推进塑造目标的过程中，“威逼”的效果不如“利诱”的效果，虽然后者产生的效果较慢，但因为尊重各国的主权和自尊而得到一定的认可，而“威逼”的效果截然相反；其三，在美国中亚政策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个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塑造力度的加大，明显有削弱遏制与整合这两个战略目标的效果。奥巴马时期，在塑造中亚各国的发展方向上，美国重新突出了“利诱”的一面。

对于塑造战略目标在美国中亚政策中的重要性，不能因为其具有工具性的取向而忽视其规范性的内涵。无论是美国决策者还是国内学术界，均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美国在中亚地区宣扬的民主和改革话语，不过是美国获得中亚能源和军事基地、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遮羞布，仅仅是美国为获取功利性目标的手段。例如，对这种立场作过较为完整阐述的雷恩·穆里森（Rein Müllerson）就认为，美国推进民主仅仅是为了石油和其他战略利益。^①穆里森的上述观点的确揭示了美国民主话语的虚伪性。不过，如果说美国没有推动中亚走向民主和尊重人权的道路的意愿和诚意，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美国对于民主价值观具有信仰的成分，而且这种信仰构成了美国身份的界定性特征之一，由此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规范维度。小布什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就是美国外交政策规范维度的一种反映。

除了规范性的考虑，即使是基于实用性的目标，美国仍坚信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方向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性。正如尤格·鲁默（Eugene Rumer）指出的：“对于中亚国家国内政治的性质漠然视之，将美国与该地区的关系严格限定在安全、能源和美国获得军事基地等问题上，与美国持有的价值观相矛盾。此外，这种行动会忽视存在于中亚地区的对于改革的实际需要。这种系

^① Rein Müllerson, *Central Asia: 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85.

统改革的需要，是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并富有成效地融入国际体系的基础，同时也体现为促进国内复兴和实现国际整合而要求一种更加开放和代表性的政治体系的吁求。一旦忽视这些要求，将带来严重后果。美国对这些呼吁无动于衷将是短视的，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会带来有损其利益的各种剧变”。

①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决策者相信，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与民主和经济改革、推进尊重人权和法治的规范、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意愿等密切相关，而且认为民主价值观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是确保该地区稳定和避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的最佳途径。而这种信念所带来的，就是塑造各国政权发展方向的努力。

除了塑造中亚各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美国塑造战略目标的另一维度，是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某一个中亚国家作为地区各国的样板或领袖。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吉尔吉斯斯坦因为在推进自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改革方面的意愿迫切而真诚，不但吸引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量援助，而且让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将吉尔吉斯斯坦塑造为中亚各国改革的榜样。1992年的时候，美国中亚和高加索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塔尔博特使用“中亚的瑞士”这一称谓称呼吉尔吉斯斯坦。尽管这一称谓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然而吉的这一外号不胫而走。除了“中亚的瑞士”，吉尔吉斯斯坦还被称为“民主之岛”。②“中亚的瑞士”和“民主之岛”这类称号，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大量的外部援助，但给其他中亚国家造成了压力。这些绰号的流行，客观上造成了要求其他中亚国家效仿吉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效果。③

随着 1995-1996 年间阿卡耶夫开始了集权化的趋势，美国随即又加强了

① Eugene Ru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68.

② Christian Boehm, “Democracy as a Project: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within the World of Projects in Former Soviet Kyrgyzstan”, *The Anthropology of East Europe Review*, Vol.17, No.1, 1999, pp.49-58. John Anderson, *Kyrgyzstan: Central Asia's Island of Democracy?*,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1999.

③ Cornelius Graubner, “Kyrgyzstan: Mapping the Shadow State: The Informal Political Economy Before the Tulip Revolution”, *Field Research Report*, Berlin: Freie University Berlin, Institute for East-European Studies, 2005, p.19, note 44.

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并将其打造为中亚的“稳定之岛”。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源自乌独立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取向。^①美国国防部长佩里 1995 年 4 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正式标志着美国塑造乌兹别克斯坦为中亚权力中心的开始。1996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意味着美国塑造战略的深化。到 2002 年 3 月，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和合作框架协议》，意味着美国塑造中亚权力中心的努力达到了高潮。

随着美乌关系在 2005 年的急剧恶化，美国又将塑造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哈萨克斯坦身上。2005 年以后至今，美国明显突出了哈萨克斯坦在美国中亚政策中的地位。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促进中亚经济增长的“潜在引擎”。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与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兰克（Robert Blake）2010 年 10 月则宣称，“我们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或许是中亚国家中最密切和最广泛的”。^②或许对于域外国家而言，美国在中亚地区塑造权力中心或改革样板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对于这些被塑造对象而言，却能带来丰厚的物质和象征资源。美国的这种塑造努力尽管并不一定能带来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过美国却很少关注由此带来的后果，比如加剧中亚地区各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以及影响到塑造对象国与其他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中亚地区的权力中心之外，美国还致力于塑造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对其国务院相关机构的调整和推进中亚—南亚一体化的努力。自 1999 年美国将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纳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后，2006 年美国国务院又将中亚地区的事务纳入到南亚与中亚事务局的管辖范围。对于此次机构调整，美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科层制考虑：欧洲局需要处理 55 个国家的事务，而南亚

① Frederick Starr, “Making Eurasia Stable”,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1, 1996, p.91.

②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Asia, the Pacific,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earing on the Emerging Importance of the U.S.-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Testimony of Robert O. Blake, Jr.,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November 17, 2010.

局只需负责 5 个国家的事务。^①根据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史蒂文·曼(Steven Mann)的观点：“北约和欧安组织将继续将中亚国家拉近欧洲和美国”。不过，美国同样鼓励中亚国家发展“与南边国家的新联系和协同性”。^②

与美国对国务院机构进行调整同时进行的，是美国致力于以阿富汗为中心，促进南亚和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在 2001 年的“持久自由行动”开始以后，美国实现了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驱散基地组织的目标。但直到目前，美国在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打击毒品生产与促进经济发展——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为了帮助阿富汗解决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提出的思路就是将阿富汗纳入到中亚与南亚的框架之中，借助阿富汗周边国家的力量来解决阿富汗的问题。^③在美国整合中亚、南亚与阿富汗等国以打造一个“大中亚地区”的尝试中，阿富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阿富汗重要性的强调，起源于美国对阿富汗在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的重新认知。美国 2006 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中指出：“阿富汗从塔利班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及阿富汗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所开启的开发过程，使得阿富汗重新融入到中亚成为可能”；“一旦对阿富汗的稳定、繁荣与民主受到来自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包括恐怖主义、政治—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毒品生产与走私的威胁有所认识；一旦对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文化及历史认同有所认识，那么就应该承认阿富汗属于中亚国家之列，而不是将它与这些国家分开”。^④美国决策者认为，既然阿富汗应该被视为中亚地区的一部分，那么，为了解决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所面临的稳定局势与恢复经济这双重任务，就有必要将阿富汗与中亚国家视为一体，利用中亚与南亚国家的资源来实现阿富汗的复兴。

事实上，实现中亚与南亚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是美国追求遏制、整合与

① Michael Rywki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Central Asia: Differing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28, No.3, 2006, p.204.

②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458, May 3, 2012, p.6.

③ Evan A. Feigenbaum,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marks to Participants of the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U.S.-Central Asia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U.S. Chamber of Commerce; Washington, DC, July 18, 2007.

④ <http://www.theorator.com/bills109/s2749.html>

塑造三种战略目标的体现。首先，尝试实现中亚与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是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努力相对应的。2006年美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中规定：反对某一国家对中亚与高加索国家能源资源出口的垄断，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的言外之意自然是指俄罗斯。其次，美国设立南亚与中亚事务局的主要目的，也有整合中亚与南亚的意向。美国整合中亚与南亚的具体手段，就是通过将中亚能源引向南边，建立一条南向能源走廊，可以有效确保阿富汗的能源需求，以及满足美国盟友——巴基斯坦以及日益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印度的能源需求。至于塑造，无论是国务院的机构调整，还是打造南向能源走廊，抑或强化中亚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均属于美国塑造中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努力。换言之，“将中亚与其南部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并不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个自然和令人期待的过程。相反，这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构建，通过政治话语和行动得以构成，随之又影响到美国的战略立场和针对该地区的政策。”^①

自2005年以来，为了通过促进中亚与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美国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目标，美国投入了不菲的资源。尽管如此，截至目前，美国在追求这三重目标方面仍然进展不大。撇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大中亚”的经济一体化，纯粹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就给美国雄心勃勃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目标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各国由于彼此间关系发展长期不畅，使得有关贸易的规章制度截然不同，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各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参差不齐，而且就整体而言均处于不发达状态；尽管中亚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由于在苏联时期这些国家能源开发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地区的需要，因此使得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设施主要以北向为主；中亚国家、阿富汗、南亚国家由于国力有限，在通讯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各国彼此之间的通讯能力。尽管近年来美国动作频频，并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后继续推进中亚与南亚的一体化，然而，技术问题、政治矛盾以及安全形势，始终对美国的战略目标构成挑战。

^① 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3, 2011, p.601.

结 语

通过对美国官方文件、美国高级官员对中亚问题的表述、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者的论著的梳理，尤其是对美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活动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遏制、整合与塑造构成了引导美国二十余年来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决策者对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认知发生变化的不同阶段，美国赋予这三个目标的注意力有所变化，甚至同一个目标的重点、方向也会发生改变。例如，尽管遏制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但在美国中亚政策以俄罗斯为中心的阶段，以及9.11事件之后到“颜色革命”发生之前，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力度并不明显；直到“颜色革命”以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力度才显著加大。此外，在遏制伊朗方面，美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但在中亚地区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力度。这些趋势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在中亚战略目标保持不变的同时，美国也在调整其战略目标的重点与方向。大体而言，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构成了美国中亚政策演变过程中不变的主线，同时也让美国中亚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享有重要的地位。

既然遏制、整合与塑造构成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那么美国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将追求这些目标。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伊朗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的政治—安全—价值体系，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这三重战略目标具有长期性、指导性、整体性等特征，而不涉及到某个具体领域的政策目标。三重战略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整合是以遏制为前提，而遏制是整合了的和经过塑造的遏制，塑造又构成整合和遏制的基础。截至目前，美国着重关注的是遏制和塑造目标，至于整合，因为中亚地区与美国相距遥远，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地区（至少不如中东欧地区），加上该地区大国利益交织，中亚国家本身的排斥，导致美国在整合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方面并未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无论如何，遏制、整合与塑造引导了过去二十年来美国中亚政策的构思

和执行。尽管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给予三重战略目标的精力和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三者始终没有被美国决策者抛弃。只要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只要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仍然存在前者追求遏制与后者追求平等地位的结构性矛盾，只要中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在中亚对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的追求就不会停止。

【Abstract】 So far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lacks a coherent and clear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but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 is not pursuing coherent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this region. In f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depende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ready been in pursuit of three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Central Asia, namely, to contain Russia, Iran, and China to some extent; integrating the former Soviet countries includi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to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value systems;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development and their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Whil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within the domestic academia that energy, security and democracy, which the U.S. government declares, do not constitute its strategic goals in Central Asia. Actually they are just its policy objectives. Its threefold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containment, integration and shaping, are regulated and influenced by its guidelines for Central Asian policies, namely, "the Containment Strategy", the "Theory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eace". Although at different times, the United States focused differently on this threefold strategic objectives, yet all of them have always been guiding the con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in the past 20 odd years.

【Key Words】 the U.S., Central Asian Policies, Containment, Integration, Shaping

【Аннотация】 У США до сих пор нет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й и чёт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 это н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на

согласованны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которые США преследуют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ША преследуют тр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 именно, сдерживание России, Ирана, и в некоторой степени также Китая; это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ие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прошлом входящих 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запад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а также в западную систему ценностей;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ы. Научные круги Китая, как правило, считают, что заявленны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ША энергет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отнюдь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 являются тольк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целям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ройн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цель США, заключающаяся в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сдерживанию,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ю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статочные явления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ринципов политик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стратегии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она вдохновлена теориями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 Хотя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вкладывали различный смысл в эту тройк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однако э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трё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всегда руководили замыслом и воплощением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ША, полити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责任编辑 李后立)

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谈判：背景、进程与展望*

徐刚**

【内容提要】2008年2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表面上看，“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获得了解决，实则使塞科关系变得越加紧张与复杂。从2011年起，在欧盟的调停下，塞科双方进行了十九次谈判。谈判内容从技术合作逐渐提升为政治对话，以2013年4月19日在布鲁塞尔签订关系正常化协定告终。但是，科索沃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欧盟已经决定于2014年1月启动塞尔维亚入盟谈判，但前提是布鲁塞尔协定顺利实施并得到欧盟认可。从协定签订后塞科双方的反应以及协定执行的情况来看，双方在原则问题上都没有妥协的迹象，未来塞科关系的走向仍然扑朔迷离。科索沃问题具有较强的连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牵扯着巴尔干地区的神经。同时，它又有颇深的学理探讨价值，是国际政治、国际法、危机管理及民族学等学科非常典型的案例之一，理应跟踪观察。

【关键词】塞科谈判 科索沃最终地位 布鲁塞尔协定 科索沃问题 巴尔干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 05-0164-(29)

巴尔干地区常被称为“欧洲火药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科索沃问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项目批准号：12AGJ001）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东南欧地区合作与欧洲一体化”（项目批准号：2013M54112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

的存在。有西方学者指出，当前西方对东欧^①的关注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种关注不仅是科索沃冲突的结果，还因为这个被困的塞尔维亚省份的情形如同几年前波斯尼亚的冲突一样，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②如果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乃是由于科索沃地区长期存在着危机并引发了战争，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即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关系问题则一直麻烦不断并引发了一连串事件。2008 年 2 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表面上看，“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获得了解决，实则使塞科关系变得越加紧张与复杂。塞尔维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但是由于加入欧盟的需要以及美欧的压力和推动，在过去几年里与科索沃先后进行了十九次谈判，旨在彻底解决塞科关系正常化问题。本文拟首先对科索沃“独立”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谈判（以下简称塞科谈判）的背景进行介绍，然后梳理谈判的进程与议题，最后尝试对科索沃的未来前景作一展望，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一、科索沃的命运：战争与大国博弈

科索沃（Kosovo）是塞尔维亚语的一个词汇，其全称为“kosovo polje”，意思是“黑鸟坪或黑鸟平原”（field or plain of blackbirds），其实际地方离普里什蒂纳（Pristina）不远。^③有关科索沃这块土地的历史记载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独立名称的出现则比较晚，一般认为始于 1389 年的科索沃战役。这似乎是一个玩笑，因为战争从此常与科索沃相伴。

科索沃的面积不大，“是个说不清归属，讲不清道理的地方”^④。其绝大部分居民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他们同今日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境内的阿族人有一

① 原文用的是东欧。东欧是冷战时期特定的地缘政治概念。当前国际学界对该地区的称谓有中东欧、东中欧、新欧洲等，且多使用中东欧。

②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50 页。

③ J. P. Maher, “The name ‘Kosovo’”, <http://opinionleaders.htmlplanet.com/koskosova.html>.

④ 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76 页。

着共同的祖先——伊利里亚人，阿尔巴尼亚族人由此称对该地域拥有“种族权利”。从公元前3世纪末起，这一区域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6—7世纪，斯拉夫人迁徙至此，随后该地域被保加利亚王国、拜占庭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交替占领。12世纪，该地区成为第一个塞尔维亚国家拉什卡（Rascia）的中心。14世纪30年代，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šan）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也一度定都科索沃的普里兹伦（Prizren）。这也就成为之后塞尔维亚人对该地区拥有“历史权利”的源头。另外，在13世纪科索沃就有了独立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会，成为巴尔干地区东正教的圣地。于是，有学者指出，科索沃对于笃信东正教的塞族人的重要性，一如耶路撒冷之于犹太人。^①所以，塞尔维亚民族对于这块“圣地”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1389年科索沃战役结束后，科索沃地域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在此后的五个多世纪里，几次大的民族迁徙改变了科索沃的人口比例和成份，不同的民族在这里混居、交融，不同的宗教在这里传播、碰撞，既传承了多样的文化，也播下了各民族间纷争和相互仇视的种子。1912—1913年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但科索沃的归属仍由大国掌控着。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1913年4月的伦敦会议否决了阿尔巴尼亚“合并科索沃”的要求，将科索沃划归塞尔维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索沃被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直到战争临近结束时才重新被塞尔维亚收回，随后加入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称为南斯拉夫王国）。1919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科索沃等阿族人居住的地区由美国监督并举行全民公决，以确定其归属。这一次大国同样没有理睬阿尔巴尼亚的提案。^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索沃并入了由意大利控制的阿尔巴尼亚，大量塞族人被阿族人驱赶出境。

二战结束后，科索沃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邦）的一个自治区，到1963年改为自治省（另一个自治省为伏伊伏丁那）。1968年，两个自治省的地位得到提高，成为“准联邦单位”。1974年新宪法

① 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第74页。

② 马细谱：《巴尔干纷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22页。

通过后，它们正式成为联邦单位。20世纪80年代初铁托去世后，该地区变得动荡不安，联邦当局对其加强了控制。1989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实施宪法第9-44条的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被取消。可见，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科索沃的地位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塞尔维亚以及后来的南联邦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动荡。所以，在南联邦国家期间，由自治省地位引发的“科索沃问题最为典型，伴随着南联邦的始终，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一直就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①。

整个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几乎成了冲突与血腥的同义语。从《科索沃共和国宪法》的“出台”，到阿族人宣布“科索沃共和国”的独立，再到科索沃战争的爆发，科索沃的冲突从未消停，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事件中，科索沃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国际化和由大国主导的命运。^②有学者指出，在国际社会中，弱小国家进行“选择的条件总是由大国提出的，规则是由大国制定的，修改规则的可能只有在得到大国的认可之后才能转化为现实。协调也好，规定也罢，不论有哪些例外，归根到底，有实力的国家，起着主导的、支配的、整合的、调节的作用”^③。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以政治手段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使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丧失了对科索沃的控制权。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并在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活动团体的帮助下开始重建进程。^④自2005年起，欧盟逐渐接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承担科索沃的管理角色与职能。在这期间，需要提及的一点是，2001年5月由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汉斯·海克鲁普（Hans

① 孔寒冰：《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② 虽然表面上是北约、联合国、欧盟等组织公开参与科索沃的进程，但主导力量却是美、英、法等国。

③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④ 参与战后科索沃重建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团体有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北约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使团、欧盟、各大国代表处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关于它们参与重建工作的安排及进展，参见[奥地利]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科索沃问题》，苑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1-27页。

Hækkerup) 签署颁布的《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较为重要, 它开启了科索沃政治体制建立的进程。而与政治建设取得成就相伴随的是, 科索沃阿族人独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参见表 1)。

表 1 科索沃居民在科索沃最终地位上的优先排序 (单位: 百分比)

	2003 年 3 月		2004 年 3 月		2005 年 3 月	
	阿族人	塞族人	阿族人	塞族人	阿族人	塞族人
在现有的边界内科索沃独立	88.5	1.1	90.4	0.7	94.4	0.0
分裂科索沃	0.3	4.0	0.2	14.0	0.2	3.0
与阿尔巴尼亚结成联盟	9.9	0.0	9.2	0.0	5.2	0.0
与塞尔维亚组成邦联 (类似黑山)*	0.0	13.5	0.0	1.4	0.1	4.5
包括塞尔维亚人的自治省	0.3	81.3	0.0	83.2	0.1	92.5

资料来源: [奥地利] 赫尔穆特-克拉默、维德兰-日希奇: 《科索沃问题》, 苑建华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第 160 页。

注: * 黑山于 2006 年 6 月宣布独立。

尽管科索沃在政治和社会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展^①, 但最终地位问题未解决使科索沃阿族人变得躁动不安。2004 年 3 月发生的严重骚乱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该事件使有关各方认识到: “解决地位问题乃科索沃生存之本”。^②2005 年年底, 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 (Martti Ahtisaari) 作为联合国指派的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特别代表, 正式启动了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的谈判。这轮谈判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到 2007 年 3 月结束, 总共进行了十七次, 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阿赫蒂萨里提出的《科索沃地位解决全面建议》。^③但是, 由于塞尔维亚的坚决反对, 以及俄罗斯威胁在安理会否决阿赫蒂萨里建议的强硬立场, 该建议被迫放弃, 谈判也宣告结束。^④随后, 由美

① 关于科索沃政治和社会建设的详细情况, 参见高歌: “科索沃政治发展: 从托管到‘独立’”, 《俄罗斯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② Henry H.Perritt,Jr.,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for Kosovo: A Chronicle of Ahtisaari Pl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1.

③ 关于建议的详细内容, 参见“Comprehensive Proposal for the Kosovo Status Settlement”, March 26, 2007, <http://www.unosek.org/unosek/en/statusproposal.html>; 关于整个谈判和建议出台的过程, 参见 Henry H.Perritt,Jr.,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for Kosovo: A Chronicle of Ahtisaari Plan*, pp.119-170.

④ 朱晓中: “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载邢广程主编: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发展报告 (2008)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第 81 页。

欧俄“三驾马车”接管的谈判也由于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存有分歧而搁浅。然而，就在谈判宣告失败的第二年，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了《科索沃独立宣言》，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正式“独立”。表面上看，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获得了解决，但事实是将塞科关系推向了一个微妙的境地。

从科索沃方面讲，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是其努力的方向。截至目前，已有一百个国家或地区正式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其中一些国家还设立了大使馆。^①对塞尔维亚来说，它也在努力赢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将科索沃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寻求咨询意见。结果，2010年7月国际法院通过的裁决认为科索沃单方面独立之举“合法”。^②塞尔维亚在表达不满的同时试图就科索沃地位问题进行谈判，向联大提交了一项“平衡决议案”，却遭到美欧一些国家的反对。^③于是，塞尔维亚方面不得不改变立场，与欧盟达成妥协向联大提交新的议案。议案在不要求联大对科索沃进行谴责的同时强调未来的谈判只关注技术层面而不是地位问题。^④此项议案获得通过，有关各方似乎找到了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钥匙。

二、2011年以来的塞科谈判：进程与议题

（一）罗伯特·库珀调停下的塞科谈判：技术性合作

上面提到，2010年联大通过塞尔维亚提交的议案，意味着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谈判^⑤即将开启。然而由于该年底科索沃将提前举行大选，谈判也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① 中国尚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基于研究的需要，文中措辞用语难免将科索沃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但并不代表承认其独立。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参见 <http://www.kosovothanksyou.com/>

②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July 22, 2010,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987.pdf>

③ “国际法院裁决：科索沃单方面独立之举‘合法’”，人民网，2010年7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2226457.html>

④ “Serbia, EU reach resolution compromise”, September 9, 2010,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0&mm=09&dd=09&nav_id=69564

⑤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媒体混用会谈（Belgrade-Priština talks）、对话（Belgrade-Priština dialogue）或谈判（Belgrade-Priština negotiations），中国媒体则多使用谈判。

2011年3月，在欧盟的调停和直接参与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代表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正式举行谈判。谈判的协调人即欧盟方面的协调者，是欧盟对外行动署顾问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代表团团长、首席谈判专家分别是塞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波尔克·斯特凡诺维奇（Borko Stefanović）和科索沃副总理艾迪塔·塔希里（Edita Tahiri）。需要提及的是，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Thomas Countryman）也应邀列席谈判。

谈判着重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先易后难的原则，二是“不讨论地位问题”。于是，作为调停方的欧盟从一开始就将塞科谈判的主题定为区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人员自由流动（freedom of movement）以及法治（rule of law）。^①3月8-9日，第一次谈判举行，双方主要就经济合作、电信、航空交通、海关图章和地籍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首次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但是双方的积极态度还是得到了欧盟方面的赞许。在一定程度上讲，双方代表团尝试朝着欧盟强调的消除对人们日常生活有不利影响的障碍、提升合作以及走向欧盟的目标努力。^②但是，塞科双方对首次谈判的反应不一。塞尔维亚方面对谈判主题的设置以及欧盟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评价。然而，科索沃方面却一再强调：对话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对话，对话议程只涉及双方感兴趣的技术问题，绝不包括科索沃的主权和地位问题。甚至有报道认为，科索沃内部政治力量对塞科谈判没有达成共识，这种不一致将影响谈判的有效性及其自身民主的发展。^③说到底，虽然塞科谈判事先设定不讨论地位问题，但这把悬在头上的“利剑”随时可能影响到谈判的进展。

原本在首次谈判之后应立刻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推迟到了3月28日进行。这次谈判的主要议题是电信、人员自由流动以及首次谈判中的其他一些内

① “Statement by the spokesperson of Catherine Ashton, EU High Representative on the start of the Belgrade-Pristina dialogue”, Brussels, March 8,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19663.pdf

②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A positive start”, Brussels, March 9,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19690.pdf

③ “First round of Belgrade-Priština talks ends”, March 9, 2011,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1&mm=03&dd=09&nav_id=73131

容。谈判各方决定，由欧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EULEX）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户籍登记的具体工作，并进一步讨论出台一项关于地籍管理的协定。谈判还就通讯和电信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讨论了货物自由流通问题，并决定人员自由流动问题留待下次谈判讨论。^①这次谈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塞科双方代表团团长均毫不隐讳地向媒体表达了这一点，他们同时期待双方的进一步会谈。^②自这次谈判起，此后的谈判间隔基本为一个月或以上。

4月15日，第三次谈判进行。谈判的主要议题是人员自由流动，其具体内容包括身份证、护照、汽车保险、驾驶证和牌照。此外，双方还就文凭认可问题交换了意见。^③5月17-18日的第四次谈判主要对前三次谈判进行总结，并在地籍管理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同时，这次谈判还提出了失踪人口、宗教和文化遗产以及文凭认可等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④在欧盟看来，这次谈判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的确如此，在7月2日进行的第五次谈判中，塞科双方正式在户籍登记、人员自由流动以及文凭认可三项事务达成了协议^⑤，塞科谈判最初确立的“技术要求”取得了不错的实质性进展。

然而，塞科谈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原本定于7月20日进行的第六次谈判被推迟至9月。有意思的是，谈判被推迟并不是其本身出了问题，相反，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协议均已达成，有关方面对此表现出“知足”的态度。欧盟调停人库珀对这次谈判推迟作了这样的解释：“塞科双方暂时没有可以达成的协议，此前的协定均符合欧盟精神和国际标准”。^⑥不过，上述判断和分析仅仅局限于谈判本身，没有充分考虑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的演进。进

①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working group on civil registry set up”, Brussels, March 28,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0350.pdf

② “Teams report ‘progress’ in Kosovo meetings”, March 29, 2011,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1&mm=03&dd=29&nav_id=73488

③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focus on freedom of movement”, Brussels, April 15,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1570.pdf

④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a productive meeting”, Brussels, May 18,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2085.pdf

⑤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three agreements”, Brussels, July 2,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3383.pdf

⑥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next round of talks postponed”, Brussels, July 19,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3964.pdf

入7月，科索沃北部局势骤然紧张。到月底，科索沃试图夺取北部与塞尔维亚交界的两个边境站的控制权，当地塞族民众在抗议的同时设立路障，随即冲突频发。其实这才是导致塞科谈判推迟的真正原因。换言之，塞科谈判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关系的稳定程度。

欧盟随即对科索沃的紧张局势作出了反应。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敦促塞科双方领导人保持克制，强调对话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随着局势得到控制，第六次塞科谈判在时隔两个月后再次启动。在9月2日的谈判中，双方就海关印章和地籍管理达成了协议。关于海关印章问题，印有“科索沃海关”（Kosovo Customs）的印章得到使用许可。同时规定，该协议适用于所有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国家。对此，欧盟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改善地区内部关系和保证货物流通自由的重要一步，意义非常重大。^①在地籍管理方面，双方同意科索沃建立完整的土地产权记录，以保证其居民合法地主张权利。此外，这次谈判还就电信、能源以及参与地区论坛等事项进行了讨论。

11月21-22日，塞科第七次谈判又在间隔了两个月后进行。根据第五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塞科双方同意由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作为它们的大学文凭的认证机构。同时，双方还就区域合作以及边境一体化管理（Integrated Border Management）问题交换了看法。随后不久，从11月30日起，为期三天的第八次塞科谈判进行。双方就边境一体化管理的想法达成了协议，它们将逐步在共同的边境站建立安全岗哨。双方还就电信、能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根据已经达成的户籍协定，双方将于12月5日起开始印制户籍文件。此外，双方还期待12月26日前全面实施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使得每个居民都可以自由通行。^②

2012年2月22-24日，塞科第九次谈判进行。双方首先就区域合作以及合作的代表名称达成了协议。此前，塞尔维亚一直反对科索沃以“科索沃

①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Agreement on Customs Stamps and Cadastre”, Brussels, September 2,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4501.pdf

②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Agreement on IBM”, Brussels, December 2, 201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6543.pdf

共和国”的名义参加各类会议。也正是在塞尔维亚的坚持下，一些多边会议没有邀请科索沃参加。在这次谈判中，塞科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性协议，即科索沃将以和与会国家地位相同的身份参与国际会议及活动，但其名称后面要加上星号*，即“科索沃*”字样，而不能称“科索沃共和国”。其中，星号*表示注脚，内容有二：一是符合安理会 1244 号决议，由塞尔维亚建议；二是符合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独立宣言的意见，为科索沃所坚持。^①虽然“科索沃*”不对科索沃地位进行确认，但是将塞科双方存在矛盾的意见均作为注脚列出，其立场之对立不言而喻。因此，在协定签订后，塞科双方都对星号注脚的含义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加以表述和解读，并将其宣传为己方的“胜利”。^②从科索沃方面来讲，这个协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改变了此前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代表其签署各项协议和文件的历史。^③而从塞尔维亚的立场来说，“科索沃*”虽然加了注，但它没有“共和国”字样，且必须符合安理会 1244 号决议，也就意味着它仍是“科索沃地区”。从这里可以看出，名称背后的根本分歧，是科索沃的最终地位问题或塞尔维亚是否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不过，客观地讲，几年来的“名字游戏”至少在字面上有了一个共识或折中。^④这次谈判的另一项成果是双方缔结了边境一体化管理的技术协议，使双方的边界管理合作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上述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得到了欧盟的认可。从一定意义上讲，塞尔维亚于 2012 年 3 月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以及科索沃获得欧盟承诺对与其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SAA) 进行可行性研究均不无关系。不过，在这以后，塞科谈判中断了。中断的主要原因，是塞尔维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即将于 4-5 月间进行。

① Toby Vogel, “Serbia and Kosovo strike name deal”, February 24, 2012, <http://www.europeanvoice.com/article/2012/february/serbia-and-kosovo-strike-name-deal/73684.aspx>

② 王洪起：“美欧力促塞科对话 推动关系正常化”，《当代世界》，2012 年第 12 期。

③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Agreement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BM technical protocol”, Brussels, February 24, 2012,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8138.pdf

④ Linda Karadaku, “Kosovo, Serbia play name game”, February 3, 2012, http://setimes.com/cocoon/setimes/xhtml/en_GB/features/setimes/features/2012/02/03/feature-03; Entela Cukani, “Ongoing Pristina – Belgrade Talks: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http://aei.pitt.edu/38188/1/2012_edap04_pdf.pdf, pp.21-23.

表 2 罗伯特·库珀主持下的九次塞科谈判

	时间	内容	成果
第一次	2011年3月8-9日	经济合作、电信、航空交通、海关印章和地籍管理	——
第二次	3月28日	电信、人员自由流动以及首次谈判中的其他一些内容	决定由欧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完成户籍登记的具体工作
第三次	4月15日	人员自由流动、文凭认可	——
第四次	5月17-18日	地籍管理、人员自由流动、失踪人口、宗教和文化遗产以及文凭认可	就地籍管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第五次	7月2日	户籍登记、人员自由流动以及文凭认可	就户籍登记、人员自由流动以及文凭认可三项事务达成了协议
第六次	9月2日	海关印章、地籍管理、电信、能源以及参与地区论坛	就海关印章达成了协议
第七次	11月21-22日	文凭认证、区域合作以及边境一体化管理	同意由欧洲大会联合会作为双方大学文凭的认证机构
第八次	11月30日-12月2日	边境一体化管理、电信、能源	就边境一体化管理问题达成了协议
第九次	2012年2月22-24日	区域合作、边境一体化管理	就区域合作以及合作的代表名称达成了协议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官网 (http://ec.europa.eu/kosovo/news/index_en.htm) 关于科索沃的内容自行整理。

(二) 凯瑟琳·阿什顿调停下的塞科谈判：从技术合作到政治对话

塞尔维亚政局交接不久，塞科谈判再次提上议程。2012年7月底，阿什顿在布鲁塞尔会见科索沃总理哈希姆·萨奇 (Hashim Thaçi) 时，强调了塞科双方继续进行谈判的重要性，并确信塞尔维亚新政府会很快同意重启谈判。^①9月底和10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和阿什顿分别与科索沃、塞尔维亚的领导人进行会谈，重点讨论了重启塞科谈判的必要性和方式。在她们的联合推动下，塞科双方表示愿意重启谈判。10月19日，阿什顿在布鲁塞尔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察·达契奇 (Ivica Dačić) 和科索沃总理哈希姆·萨奇的会见成为新一轮谈判的开始。

① “Statement by the Spokesperson of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following the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of Kosovo Hashim Thaçi”, Brussels, July 25, 2012,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2034.pdf

两位总理成为双方新一轮谈判的负责人，谈判级别比 2011 年有较大的提高。新一轮谈判的调停人也由库珀换成了阿什顿本人。由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亲自调停，透露了两层意思：一是库珀认为谈判应尽快转向政治对话，而在欧盟看来这显然有些操之过急^①；二是充分体现了欧盟对谈判的重视。

第二次谈判于 11 月 7 日进行。谈判首先肯定了前九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边境一体化管理方面。其次，双方就塞尔维亚给科索沃塞族人提供资金的透明性以及如何保护科索沃境内塞族文化与宗教遗产展开了讨论。此外，双方还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对建设一条从尼什到普里什蒂纳的高速公路进行研究。^②在 12 月 4 日的第三次谈判中，边境一体化管理工作小组（IBM working group）成立，塞科双方各任命一名联络官，他们的办公室由欧盟驻贝尔格莱德代表团和欧盟驻普里什蒂纳办公室提供。科方还确认已经在科索沃警察局之下建立了一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特警部队，以保护文化与宗教遗产。此外，塞科双方还同意组成专家队伍来开展能源和电信工作，加强对失踪人口的调查与管理。^③到该年底，塞科边境已经开放了四个过境点。2013 年 1 月 17 日，第四次谈判进行。谈判充分肯定了边境一体化管理取得的成绩，并在税收、增值税以及关税的征收上达成了临时谅解。^④

可见，新一轮前四次谈判并没有急于在“关系正常化”上做文章，仍然在推进技术性的合作。这种方式对塞科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明显的例证是，2 月 6 日，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和科索沃总统阿蒂费特·亚希亚加（Atifete Jahjaga）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的首次最高领导人会谈。塞科双方均表示继续支持

① Pyotr Iskenderov, “Division of Kosovo: ‘pros’ and ‘cons’”, November 22, 2011, http://en.rian.ru/international_affairs/20111122/168930330.html

② “Statement by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fter the meeting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facilitated dialogue”, Brussels, November 7, 2012,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3370.pdf

③ “Statement by the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fter the third meeting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facilitated dialogue”, Brussels, December 4, 2012,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4038.pdf

④ “Statement by the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fter the fourth meeting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facilitated dialogue”, Brussels, January 17, 2013,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4784.pdf

和参与由欧盟发起的谈判进程。有报道认为，虽然这次会谈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极具象征意义，非常重要，意味着欧盟两年来的斡旋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①

然而，接下来2月19日、3月4日和3月20日的谈判将话题转移到实现塞科“关系正常化”，即如何解决科索沃北部塞族人问题上时，政治对话的困境立马显现。每次谈及此问题，塞方代表均表示需回国听取意见，但一直没有出现较大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讲，谈判在解决双方的核心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用塞尔维亚总理的话说，是“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②欧盟方面则继续“推力与压力”并用，将希望“压在”4月2日举行的第八次塞科谈判上。这次谈判的焦点仍然是如何解决科索沃北部塞族人问题。双方的态度虽有所变化，都同意北部塞族人自治，但在自治权的大小上存在分歧。用阿什顿的话说：“虽然双方分歧的领域不多，但这些分歧却根深蒂固。”^③4月8日，塞尔维亚方面以反对介入塞族人的警察权和司法权为由拒绝欧盟提出的协定草案^④，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

4月17日，第九次谈判进行，时间长达15个小时，可见讨论之激烈。讨论的议题包括建立科索沃塞族自治共同体、在科索沃北部组建警察部队和推选警监、在米特罗维察设立地区法院以及北约军队能否进入科北部地区等15个方面。由于塞科双方在塞族人警察权以及互不阻碍对方加入国际组织等内容上争执不下，第九次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定。不过，双方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再次进行谈判和对话。

4月18日，阿什顿向塞科双方总理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是双方的最

① “塞尔维亚总统和科索沃领导人举行科宣布独立后首次会谈”，国际在线，2013年2月7日，<http://gb.cri.cn/27824/2013/02/07/6611s4015660.htm>

② 参见“科索沃问题新一轮谈判结束 双方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在线，2013年3月22日，<http://gb.cri.cn/27824/2013/03/22/6611s4061693.htm>

③ “Brussels Serbia-Kosovo talks fail”，April 3, 2013, <http://www.euronews.com/2013/04/03/brussels-serbia-kosovo-talks-fail/>

④ “Hopes linger of a deal on Kosovo”，April 11, 2013, <http://www.europeanvoice.com/article/imported/hopes-linger-of-a-deal-on-kosovo/76918.aspx>

后一次机会，是一次毫无退路（last-ditch）的谈判。^①同时，欧盟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 2013 年 4 月 22 日欧盟外长会议之前塞科双方仍不能就协定达成一致，它们加入欧盟的进程将会被拖延。第九次谈判过后，德国立即表现出站在科索沃一边对塞尔维亚施加压力的姿态。德国方面表示，如果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未能达成协定，塞尔维亚的入盟进程肯定会延缓，同时建议欧盟将塞尔维亚入盟事宜搁置起来，而与科索沃签署《稳定与联系协定》。^②

紧接着在 19 日，第十次谈判举行。这次塞方的成员有总理伊维察·达契奇、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亚历山大·武契奇、塞尔维亚政府科索沃事务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大·伍林（Aleksandar Vulin）以及总统顾问马尔科·久里奇（Marko Đurić），成员之高级和数量之多表明塞尔维亚对此次谈判的重视。科索沃方面的成员没有变化。在谈判中，阿什顿一方面数次强调此次谈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力促双方以平衡和妥协的方式来处理最为棘手的问题。最后，在欧盟的“压力”下，经过妥协与让步，塞科双方草签了关系正常化协定，也称布鲁塞尔协定^③。协议保留了现存平行机构中关于警察权和任命地区警监的第 9 条，但对第 14 条作了修改，改为任何一方不阻碍对方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然而，塞科双方对于布鲁塞尔协定的签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科索沃“外交部长”恩维尔·霍克斯哈伊（Enver Hoxhaj）认为，“协定是独立的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意味着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主权的承认”。^④而这显然与塞尔维亚的立场和原则相悖，塞尔维亚领导人也多次在不

① “Ashton recalls Serbia, Kosovo leaders to Brussels for last-ditch talks”, April 18, 2013, <http://www.europeanvoice.com/article/2013/april/ashton-recalls-serbia-kosovo-leaders-to-brussels-for-last-ditch-talks/77028.aspx>

② “Germany sides with Kosovo against Serbia”, April 17, 2013, <http://euobserver.com/enlargement/119833>

③ 布鲁塞尔协议内容包含 15 点，尚未见到全文的官方文本，只能在一些媒体资源中找到有关内容，参见“First Agreement of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April 20, 2013, <http://www.rts.rs/upload/storyBoxFileData/2013/04/20/3224318/Originalni%20tekst%20Predloga%20sporazuma.pdf>; 中文内容参见李俊：“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协议略论”，《国际研究参考》，2013 年第 6 期。

④ “Serbia recognises Kosovo's sovereignty, says Kosovo minister”, April 19, 2013, <http://www.europeanvoice.com/article/2013/april/serbia-recognises-kosovo-s-sovereignty-says-kosovo-minister/77032.aspx>

同场合表示绝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科索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①。与此同时，在塞尔维亚看来，布鲁塞尔协定是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塞尔维亚议会也在4月26日以173票（议会共250席）赞成通过了该协定。可以讲，从有关方面致力于达成一项共识的角度来看，布鲁塞尔协定无疑达成了这样的效果，但它能否真正使塞科之间的问题彻底解决，还将取决于双方执行的力度与程度。难怪协定签订后阿什顿仍表示：“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②，这仅仅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落实。

表3 凯瑟琳·阿什顿主持下的十次塞科谈判

	时间	内容	结果
第一次	2012年10月19日	关系正常化	重启谈判
第二次	11月7日	边境一体化管理、塞尔维亚给科索沃塞族人提供资金的透明性以及保护科境内塞尔维亚文化与宗教遗产	成立一个工作组对建设一条从尼什到普里什蒂纳的高速公路进行研究
第三次	12月4日	边境一体化管理、能源、电信、失踪人口	成立边境一体化管理工作小组、组成专家队伍来开展能源和电信工作
第四次	2013年1月17日	边境一体化管理、征税	在税收、增值税以及关税的征收上达成了临时谅解
第五次	2月19日	关系正常化	——
第六次	3月4日	关系正常化	——
第七次	3月20日	关系正常化	——
第八次	4月2日	关系正常化	拒绝欧盟提出的协定草案
第九次	4月17日	关系正常化	没有达成协议，但同意继续进行谈判
第十次	4月19日	关系正常化	草签关系正常化协定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官网（http://eeas.europa.eu/kosovo/news/index_en.htm）关于科索沃的内容自行整理。

① “President: Kosovo will never become state,” May 3,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php?yyyy=2013&mm=05&dd=03&nav_id=85996

② “We should not celebrate just yet, EU’s Ashton says,” April 27,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php?yyyy=2013&mm=04&dd=27&nav_id=85918

三、科索沃问题的未来走向及相关思考

谈判与对话是有关各方在试图解决科索沃问题时遵行的首要原则。在 2006 到 2007 年期间阿赫蒂萨里主持的关于科索沃未来地位的谈判中，塞科双方在科索沃是否应该“独立”这个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且互不相让，使得谈判终止。虽然 2008 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加深了塞科关系的紧张，但欧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得双方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从 2011 年起，经欧盟调停，在库珀和阿什顿的主持下，塞科双方共进行了两轮共十九次谈判。库珀主持的九次谈判在推动塞科双方在具体技术上的合作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后阿什顿主持的前八次谈判，除了对此前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外，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基本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后两次谈判在各方的努力与妥协下，最终以布鲁塞尔协定的签订告终。

布鲁塞尔协定签订的过程尽管曲折，但它无疑是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欧盟来说，这是它实施西巴尔干政策和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意愿与能力的体现。从塞尔维亚方面来看，协定是塞尔维亚目前能争取到的最佳方案和结果，不仅使其入盟谈判的启动日期变得明朗，也为科索沃塞族居民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和生存权利。从科索沃方面来讲，一方面，许多内部“排他性”的权力得到了确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向欧盟和北约靠近了一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塞科关系的稳定对于其他未入盟的西巴尔干国家加快入盟进程也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不过，布鲁塞尔协定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科索沃问题的彻底解决，一定意义上讲谈判仍没有结束。从协定签订后塞科双方的反应以及协定的执行情况来看，双方在原则问题上都没有妥协的迹象，未来塞科关系的走向仍然扑朔迷离。协定签订不久就有评论指出，仓促缔结协定可能会使新问题再现而不是旧问题得到解决。协定充其量只是将塞科之间的问题搁置，从而使欧盟和美国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其他问题。^①撇开外部因素，就塞科双方而

^① Faton Tony Bislimi,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is compromising Kosovo’s future”, April 22, 2013, <http://www.euractiv.com/serbia/politics-compromise-compromising-analysis-519264>

言，签订该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妥协的结果。而且，协定的执行与实施远比签订些定更加重要，因为欧盟将协定的落实作为塞科双方向欧盟靠近的前提。布鲁塞尔协定签订后，阿什顿多次敦促双方领导人前往布鲁塞尔就协定实施展开对话。在欧盟的调停下，5月22日、26日塞科双方先后制定、批准了实施协定的路线图。表面上看，协定已经在两个实体内部获得合法化，但如何在技术环节上推进，则困难重重。

进入6月以后，围绕布鲁塞尔协定的具体实施，塞科双方在布鲁塞尔进行了多次谈判与对话，但只有互派联络官的事项得到落实，其他诸如大赦法（主要是科索沃北部塞族聚居区平行机构的废除）等问题仍在争论之中。原本议定在6月15日结束的电信与能源谈判，在布鲁塞尔协定签订后经历了近二十次磋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①。在6月28日举行的夏季峰会上，欧盟决定将在明年1月启动塞尔维亚入盟谈判，其具体进展则取决于布鲁塞尔协定的落实。简言之，一方面，布鲁塞尔协定的签订使塞科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塞尔维亚离入盟的目标似乎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②

早在2006年黑山共和国独立后不久，曾有人以“悲观”的口吻指出，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将成为欧洲的“毒瘤”或“不可挽回的悲剧”。^③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又有西方人士指出，科索沃实际上是一个“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因为这个实体的主权可能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美国和欧盟的被保护国。^④与此同时，人们还给科索沃附加了各种各样的称谓，比如“监督独立”（supervised independence）、“依赖独立”（dependent independence）、“没有主权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sovereignty）、“多样化主权”（polyvalent sovereignty）、“假国”（false state）以及美国和欧盟的殖民

① “No agreement in latest round of Kosovo talks”, August 27,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php?yyyy=2013&mm=08&dd=27&nav_id=87464

② Andrew MacDowall, “Serbia-Kosovo deal clears path to EU accession, but long road remains”, April 25, 2013,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3/0425/Serbia-Kosovo-deal-clears-path-to-EU-accession-but-long-road-remains>

③ “Independent Kosovo would be cancer of Europe - Kosovo bishop”, October 12, 2006, <http://www.interfax-religion.com/?act=news&div=2137>

④ John Laughland, “A postmodern declaration”, February 19,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8/feb/19/kosovo.eu>

地，等等。^①到 2013 年，科索沃不仅与塞尔维亚成为了平等对话的实体，并就许多技术性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也因此向欧洲化的道路迈进了一步。那么，科索沃到底会发展成为一个怎样的国际政治实体？它将给欧洲甚至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跟踪观察，不宜轻易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事态的发展进程来看，美国、欧盟努力将科索沃塑造成为它们需要的、适合美欧话语霸权的一个实体。

这样，有关影响未来塞科关系走向的因素，塞科双方的欧洲化进程，与科索沃局势有着密切关联的波黑、伏伊伏丁那等地区的状况，以及各大国在科索沃和西巴尔干地区的较量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跟踪观察。除了在这些现实问题的考察上具有意义以外，科索沃问题还具有较强的学理探讨价值，是国际政治、国际法、危机管理以及民族学等学科非常典型的案例之一。因此，跟踪观察科索沃以及巴尔干地区的未来走向时，以下一些问题就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未来塞科谈判中塞尔维亚的底线及其对塞国内政坛的影响分别是什么？布鲁塞尔协定的落实是塞尔维亚启动入盟谈判的前提。在进入第十九次谈判前，多个国家对塞尔维亚发出警告。^②这似乎将塞尔维亚推到了一个要么放弃欧盟要么承认科索沃的两难境地。在最后一次谈判进程中，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北部塞族人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软化，但不承认科索沃加入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即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底线没有改变。其中的原因容易理解：从经济上看，科索沃的矿产资源对塞尔维亚至关重要；从民族感情上说，科索沃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诞生地，谁放弃了它，谁就会在塞尔维亚人心中成为千古罪人。^③就连米洛舍维奇也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科索沃的独立。布鲁塞尔协定签订之后，就如何执行协定在塞尔维亚内部取得共识变得至关重要，而事实上，塞内部对于布鲁塞尔协定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塞尔维亚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领导人表示，布鲁塞尔协定将注定走向失败，

① 刘伯松：“科索沃独立：一个 21 世纪美欧联手制造的怪胎”，光明网，2008 年 2 月 28 日，http://guanacha.gmw.cn/content/2008-02/28/content_740410_3.htm

② “Germany sides with Kosovo against Serbia”，April 16, 2013, <http://euobserver.com/enlargement/119833>

③ 参见王逸舟主编：《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第 79 页。

并表示支持科索沃塞族人的和平抵抗。^①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也愤然指出：“不管是从内心角度还是历史角度来说，此协定造成的印象完全背弃了我们对领土的信念”，“贝尔格莱德会因此失去其在科索沃的最后地位”。^②所以，塞尔维亚内部政治较量与塞科关系的走向交织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的塞科谈判与塞科关系走向将成为塞内部各种力量展开较量的一个重要议题和筹码。

第二，科索沃北部塞族人对布鲁塞尔协定持什么样的态度？尽管有关各方均对布鲁塞尔协定的签订表示满意，但科索沃塞族居民对实施该协定持否定态度。协定签订后不久，科索沃北部四个塞族区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发起征集签名活动，要求就“是将科索沃保留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内还是接受强加条件换取入盟谈判启动日期”问题在塞尔维亚全国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同时，他们认为，塞尔维亚签署布鲁塞尔协定等于承认了科索沃独立，深有被塞尔维亚抛弃的感觉。^③5月10日由科索沃北部塞族领导人组织的抗议活动“空前壮观”，近万名抗议者“有意”聚集在塞尔维亚共和广场——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1999年联大通过1244决议后当地的情景。抗议队伍中不仅有政治人物、社会名流而且有宗教人士，写有“塞尔维亚是第一位的”、“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我们将解放科索沃”以及“我们不会放弃科索沃”等字样的标语布满整个广场。^④科索沃塞族人对塞科谈判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塞尔维亚妥协，主张回到联大1244决议的框架下进行谈判，主张生活在科索沃其他地区的塞族人联合起来，同时表示拒绝承认任何没有考虑他们利益的塞科协定。^⑤另外，塞尔维亚新闻网站B92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科索沃北部塞族人是否会执行布鲁塞尔协定”的在线调查显示，截至8月底，在

① “DSS leader ‘convinced’ Kosovo deal will fail”, April 25,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3&mm=04&dd=25&nav_id=85890

② “俄媒：塞尔维亚大主教批评政府同科索沃缔定协议”，中国网，2013年4月24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4/24/content_28645277.htm

③ “Landmark Belgrade-Pristina Deal Faces Hurdles In Northern Kosovo”, April 22, 2013, <http://www.rferl.org/content/serbia-kosovo-mitrovica-landmark-deal/24965062.html>

④ “‘Kosovo is Serbia’: Thousands protest implementation of ‘normalizing ties’ deal”, May 10, 2013, <http://rt.com/news/kosovo-serbia-deal-protest-117/>

⑤ “Belgrade and Pristina - No Compromise”, April 7, 2013, http://english.pravda.ru/hotspots/conflicts/07-04-2013/124220-belgrade_pristina-0

近 2400 个受访人中，有 1800 余人选择“不执行”，占接受调查人数的 78%；有 400 余人选择“执行”，只占 18%；还有 100 余人选择“不确定”，约占 4%。^①可见，对于科索沃北部塞族人的态度不能漠视，虽说他们维护其命运或者说改变本地区局势的能力有限，但他们的立场无疑会对有关各方产生影响，尤其是塞尔维亚方面。

第三，伏伊伏丁那、波黑是否会步科索沃后尘？与科索沃一样，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也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如果说科索沃在一定程度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科索沃，那么伏伊伏丁那则有点像“匈牙利族人的科索沃”^②。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就有评论认为，有着近 30 万匈牙利族人的伏伊伏丁那将成为下一个科索沃。^③特别是进入 2013 年后，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出现了数起不同民族间的暴力袭击事件。该地区一名公民社会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乃是源于塞尔维亚要求在科索沃北部建立塞族人自治体。^④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布鲁塞尔协定签订后，波黑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出支持科索沃塞族人的立场，反对布鲁塞尔协定的落实。^⑤波黑主席团塞族成员奈博伊沙·拉德马诺维奇（Nebojsa Radmanovic）在布鲁塞尔协定签订后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联合国一半以上的成员国承认科索沃，那么波黑塞族共和国也有权寻求独立”。更有一位塞尔维亚的研究人员表示：“塞科协定达成后，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独立问题也应被强化，因为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它已经没有了障碍”。^⑥可见，科索沃问

① “Will Serbs in northern Kosovo implement Brussels agreement?” <http://www.b92.net/eng/>

② Sam Vaknin, “Analysis: Vojvodina, the Hungarian Kosovo”, Oct. 11, 2002, http://www.upi.com/Business_News/2002/10/11/Analysis-Vojvodina-the-Hungarian-Kosovo/UPI-99251034366080/; Carl Savich, “Is Vojvodina Another Kosovo?”, <http://www.serbianna.com/columns/savich/064.shtml>

③ Fabienne Hernandaise, “The Next Kosovo: The Possibility of Independence in Vojvodina”, May 5, 2009, <http://voices.yahoo.com/the-next-kosovo-possibility-independence-in-3214725.html>

④ “Leaders call for action to halt ethnic violence in Vojvodina”, March 14, 2013, http://www.setimes.com/cocoon/setimes/xhtml/en_GB/features/setimes/features/2013/03/14/feature-04

⑤ Zeljka Jevtic, “Recall of municipality presidents possible”, April 30, 2013, <http://english.blic.rs/News/9604/Recall-of-municipality-presidents-possible>

⑥ Elvira M. Jukic, “Kosovo Deal Stokes Bosnian Serb Independence Fever”, April 25, 2013,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bosnian-serbs-mull-separation-after-kosovo-recognition>

题解决不当将具有连锁反应，它不仅关系科索沃本身，还与伏伊伏丁那甚至波黑都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

第四，科索沃的治理能力如何？不可否认，科索沃的政治、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还很难说它已经拥有一个成熟的政治运转体制。科索沃内部还有很多问题，例如，内部民族冲突的隐患没有消除，塞族和阿族的冲突远未结束，塞族人的安全感仍然脆弱^①；经济状况仍然很糟糕，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②；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严重等^③。另外，科索沃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客观地讲，布鲁塞尔协定的签订为欧盟同科索沃开启稳定与联系协议谈判奠定了基础，也使科索沃的欧洲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科索沃自身有相当多的治理难题要解决，更不要说它要达到欧盟的标准真正融入欧洲了。从这个方面讲，科索沃在内部治理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难度不亚于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正常化。

第五，欧盟的西巴尔干战略将遇到什么阻力？应当肯定，如果没有欧盟的介入和施加压力，塞科的对话与谈判将是一个死结。单靠两个对立民族对话协商而不给予明确的目标驱动，塞科谈判不可能取得进展。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所作所为的政策目标，就是通过提供经济合作和入盟前景来激励各国进行改革，实现民族和解，推动西巴尔干的欧洲化。为此，欧盟创造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如稳定与联系协议和共同体援助重建、发展和稳定计划（CARDS）（2007年被入盟前援助工具IPA所取代）等。^④同时，欧盟努力将冲突调解模式植入到西巴尔干冲突国家中，希望以此最终根除各种民族间矛盾和地区不稳定因素。塞科双方并无二致地将走向欧盟甚至加入北约作为

① Henry H.Perritt,Jr.,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for Kosovo: A Chronicle of Ahtisaari Plan*, pp.221-253.

② 江涛：“科索沃经济重建：背景、进程与展望”，《新远见》，2010年第1期，第30-36页。

③ 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176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科索沃排名第109，在中东欧国家中仅比阿尔巴尼亚排名高了4位。“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2”，<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2/results/>

④ 张学昆：“欧盟的西巴尔干政策及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前景”，《德国研究》，2011年第1期。

可能的目标。但是，这一进程仍然面临着一些阻力。其一，即使为了共同的入盟目标塞科双方可能达成妥协，但历史上尤其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仇恨记忆”难保不会发酵并对该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其二，科索沃“缺乏作为一个国家行为体进行统治和自我治理的能力，反而成为走私、贩毒、腐败和经济犯罪的中心，这无形之中给欧盟增加了难题”^①。欧盟为避免科索沃成为一个失败国家，本身就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②。所以，对于欧盟来讲，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科索沃问题将是其西巴尔干政策甚至是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大考验。

第六，美国在塞科谈判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欧盟主导了西巴尔干地区的和平构建，而美国因反恐战略需要已经明显从该地区抽离。换言之，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往昔。在整个塞科谈判的过程中，美国表示它只是个观察员，而不是参与者或调停人。^③然而，美国在整个巴尔干事务中的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有评论指出：“毫无疑问，欧盟现在是巴尔干政策的主导者，但当它遇到困难时，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④事实上，美欧在西巴尔干事务中存在着既彼此合作又相互争夺的复杂关系。^⑤与其说美国协助欧盟，还不如说是在监督欧盟；与其说是受欧盟之邀，还不如说是受科索沃之托。^⑥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美国通过科索沃问题来控制 and 分化欧洲。^⑦客观地讲，在欧盟主导塞科谈判进程的同时，美国的积极参与也是必要的。^⑧4月2日第八次谈判失败后，塞尔维亚总理

① 刘作奎：“欧盟对科索沃政策评析——欧盟东扩进程中的‘例外’”，《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孔田平：“巴尔干国际治理：科索沃案例”，《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Steven Woehrel, “Kosovo: Current Issues and U.S. Policy”, May 7, 2013,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1721.pdf>

④ Stefan Lehne, “Serbia-Kosovo Deal Should Boost the EU's Western Balkans Policy”, April 23, 2013, <http://carnegieeurope.eu/2013/04/23/serbia-kosovo-agreement-should-reenergize-eu-s-western-balkans-policy/g0q8>

⑤ 扈大威：“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

⑥ 王洪起：“美欧力促塞科对话 推动关系正常化”，《当代世界》，2012年第12期。

⑦ 陈志强：“当代科索沃问题的国际政治因素”，《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⑧ Stefan Lehne, “Kosovo and Serbia: Toward a Normal Relationship”, March 2012, <http://www.crees.ku.edu/~crees/news-events/press-releases/documents/Lehne%20.pdf>, p.13.

达契奇认为美国负有一定责任，因为塞尔维亚当局主张用塞南部普雷舍沃谷地的阿族人地区与科索沃北部塞族人地区进行土地交换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方案遭到了美国的反对。^①同样，布鲁塞尔协定中关于科索沃北部警察权的限定交由北约来保证也表明，科索沃的稳定需要美国的“关心”。作为首个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美国在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承认科索沃独立，同时对科索沃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与援助。总的来说，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在减弱，但未来塞科关系的演进甚至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仍然离不开美国和北约。

第七，俄罗斯在塞科谈判以及巴尔干事务中被边缘化了吗？应该讲，俄罗斯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塞尔维亚的支持者，俄罗斯人称南斯拉夫人为“斯拉夫兄弟”。早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表示这是个严重错误，早晚要跟美国人算账。^②随后俄罗斯在化解科索沃危机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俄罗斯一直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坚决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在过去几年的塞科谈判中，俄罗斯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它仍是塞尔维亚的主要支持方。俄罗斯的主要立场是坚持在安理会1244决议下解决科索沃问题。塞尔维亚也一直紧紧抱着俄罗斯。塞负责科索沃事务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大·伍林形象地指出，如果没有俄罗斯及其施加的影响，塞尔维亚的声音也就无法听到。^③俄罗斯驻塞尔维亚大使亚历山大·科努津（Aleksandr Konuzin）近日重申，俄罗斯一贯坚持科索沃问题在联大1244号决议下解决。^④但是，也不排除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出现软化的可能。正如一位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分析家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将接受任何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决定，同时要求俄罗斯充当塞尔维亚的角色

① “Serbia says US partly to blame for failure of Kosovo talks”, April 15, 2013, <http://euobserver.com/enlargement/119742>

② 参见孙云编著：《世纪末的热战——聚集科索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③ “EU cannot help you-join Russia's life force”, April 1,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3&mm=04&dd=01&nav_id=85461

④ “Russian ambassador: Decision on Kosovo shouldn't be rushed”, May 23,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3&mm=05&dd=23&nav_id=86309

是不公平的”。^①也就是说，俄罗斯在关键问题上与塞尔维亚保持一致的立场，但并非完全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俄罗斯主要依靠自身的国际定位来选择其作为，同时它还强调塞尔维亚自身应采取积极步骤解决科索沃问题^②。另外，为维护俄罗斯在巴尔干的传统影响，捍卫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安全利益，俄罗斯在巴尔干事务中不会袖手旁观，但也绝不会贸然与大国或大国集团搞对立。

第八，塞科谈判与“自然阿尔巴尼亚”的主张有何关联？在民族迁徙尤其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中，阿尔巴尼亚族人成为一个跨界民族，主要分布在阿尔巴尼亚（约 310 万）、科索沃（约 220 万）以及马其顿（约 51 万）等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尤其是 1913 年伦敦会议之后，阿族人一直谋求建立一个包括上述阿族聚居区在内的所谓“大阿尔巴尼亚”（Greater Albania）。这种改变巴尔干版图的大阿尔巴尼亚主义的主张没有市场，难以实现。于是，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人又推出了“自然阿尔巴尼亚”（Natural Albania）的理念，提出了“同一个民族，同一部历史，同一个立场，同一个国家”的口号，要求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建立阿族人唯一的民族国家。^③如果说前者具有很重的政治和地理倾向，那么后者则主要是精神上、意识上和民族传统上的指向。^④虽然这种转向大大降低了政治涵义和敏感性，但它仍旧指向一个统一的阿族人实体，不可避免会对有关国家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近几年来，在科索沃局势的变动中，阿尔巴尼亚并没有置身事外。主张“自然阿尔巴尼亚”的人更是将 2013 年作为一个“可以有所成就”的重要年份来看待。这是因为，一方面，2013 年是 1913 年伦敦会议召开一百周年；另一方面，塞

① “Russia will accept any decision of Serbia on Kosovo”, March 26, 2013,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13&mm=03&dd=26&nav_id=85363

② “俄罗斯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新华网，2013 年 4 月 1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10/c_115342596.htm

③ “Plans for 'Greater Albania' by 2015, South Serbia Leader Says”, November 3, 2010,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greater-albania-to-be-formed-by-2013-south-serbia-leader-say; Koço Danaj, "Platform for Natural Albania"](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greater-albania-to-be-formed-by-2013-south-serbia-leader-say; Koço Danaj, 'Platform for Natural Albania'), <http://www.Albaniapress.com/lajme/15394/Platform-for-Natural-Albania.html>

④ “Macedonia: Commentary says US to help creation of 'natural Albania'”, February 5, 2009, <http://www.slobodan-milosevic.org/news/fakti020509.htm>

科谈判后科索沃阿族人对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支持率越来越高。^①阿尔巴尼亚的这种心态在国际舞台上也有所展露。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3年5月底东南欧合作进程（South-East European Cooperation Process）峰会在马其顿召开，由于塞尔维亚的反对，科索沃没有被邀请参会，于是阿尔巴尼亚也拒绝与会，使得峰会被迫取消。阿尔巴尼亚提出的理由是塞尔维亚违背了布鲁塞尔协定第14条。^②从一定程度上讲，“自然阿尔巴尼亚”的主张很难有实现的土壤，但是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则会此起彼伏。同样，在巴尔干甚至中东欧地区，类似“自然族群疆域”或“大民族主义”的理念广泛存在，随时可能发酵并产生破坏性影响。^③

第九，科索沃一系列的进展意味着“科索沃模式”的胜利吗？1999年，北约首次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美其名曰“人道主义干涉”或实施“保护的责任”。一个危险的先例由此开始。这个先例被称之为“科索沃模式”。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使得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布鲁塞尔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甚至，西方媒体充斥着西亚北非的利比亚和叙利亚适用“科索沃模式”的言论。^④然而，有意思的是，“科索沃模式”的演进似乎伴随着这样一对矛盾：即“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的权利与欧美强调的民主自由在发生冲突。有学者就发出警示认为，科索沃的趋势很危险，因为北约为保护多民族的科索沃（multi-ethnic Kosovo）实际上却创造了一个单一民族的科索沃（mono-ethnic Kosovo）。^⑤换句话说，如果以科索沃模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欧美国家将如何对待本国长期存在的类似问题，诸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等。这也

① “The ‘natural Albania’, a further attempt to put merger with Kosovo in the political agenda”, April 30, 2013, <http://www.nationalia.info/en/news/1430>

② Miki Trajkovski, “Region can solve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June 7, 2013, http://www.setimes.com/cocoon/setimes/xhtml/en_GB/features/setimes/features/2013/06/07/feature-01

③ 徐刚：“东欧国家跨界民族问题探析：以匈牙利族人为例”，《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3期。

④ Peter Iskenderov, “NATO testing «Kosovo model» in Libya and Syria”, May 24, 2011, <http://en.interaffairs.ru/events/96-nato-testing-kosovo-model-in-libya-and-syria.html>

⑤ Damian Popolo, *A New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rnity, Complexity and the Kosovo Conflict*, Farnham: Ashgate, 2011, p.207.

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班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至今未承认科索沃独立以及加拿大持谨慎态度的原因。其他国家如斯洛伐克和印度尼西亚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而至今仍然表示不承认科索沃独立。普京形象地指出：“承认科索沃独立犹如一根棍子，棍子的另一头最终会反过来打到这些国家脸上”^①。事实证明，目前的科索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科索沃到底是一个“美英话语中的特例”，还是“危险的先例”，以及是否存在一种更好的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模式，均值得深入思考。此外，科索沃危机之后关于“保护的责任”问题也在国际社会以及学术领域引发了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这种“人道主义的干涉”到底是“真诚的人本主义”还是“大国霸权的扩张”^②，在仍然具有强权政治印记的国际格局中难以找到确凿的答案。除非干涉国公开它们的真实意图，否则人们只能在科索沃（后是伊拉克、达尔富尔等）的未来发展中期待“虚幻的证据”。

第十，类似科索沃塞族的跨界民族的权利边界是什么？塞科双方通过谈判与对话来解决问题符合联合国准则和国际法精神。但是，科索沃北部塞族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塞族人的哪些主张是合理的？后冷战时期民族自决权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合法？这些问题在数十次的塞科谈判以及布鲁塞尔协定中均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塞科关系的隐患。如果处理不当，又可能出现一个“科索沃的‘科索沃’”。自布鲁塞尔协定签订以来，科索沃北部塞族人的抗议活动从未间断。眼下，除了布鲁塞尔协定的落实以外，科索沃的焦点集中到即将于2013年11月进行的地方选举上。在1999年以来的各类选举中，科北部塞族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这次也不例外。就在为选举准备的这几个月里，科北部塞族人将抵制选举的声音频频出现。甚至，米特罗维察的政治家马尔科·亚克希奇（Marko Jaksic）正在发动一个反对选举的运动，声称在普里什蒂纳投票即意味着承认科索沃

① “普京：承认科独立将使西方反受其害”，《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2月24日，第4版。

② 何志鹏：“保护的责任：法治黎明还是暴政重现？”，《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

的独立。^①据塞尔维亚新闻网站B92 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科索沃北部塞族人是否会抵制 11 月 3 日的选举”的在线调查显示,截至 10 月底,在近 3400 个受访人中,有近 2600 人选择“会抵制”,占接受调查人数的 76%;近 700 人选择“不会抵制”,只占 20%;还有 100 余人选择“不确定”,占 4%。^②尽管这只是一项网络公开的而非针对科索沃北部塞族人的实际调查,但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关心科索沃选举的人的一种态度倾向。至少可以说,这次选举无论对于哪方来讲都非常重要,将对塞科关系的进展以及它们的欧洲化进程产生影响。同时,诸如选举等形式的政治参与是衡量公民权利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科索沃北部塞族人如何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较量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或者说,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充分反映非主体族群的权利主张?这些恐怕将是塞尔维亚、科索沃以及欧盟等有关方面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近些年来,一系列旨在解决科索沃及其北部问题的模式被提出,如两德模式(Two Germanys Model)——相互承认主权、南蒂罗尔模式(South Tyrol Model)——民族自治和香港模式(Hong Kong Model)——一国两制等,它们均因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一方或共同的反对而没有被选择。^③如何借鉴既往的国际经验和利用自身的力量(如规范、经济等)找到一个解决科索沃及其北部问题的最佳模式,是欧盟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考验。

① Igor Jovanovic and Linda Karadaku, “Kosovo’s elections prove to be a challenge to both sides”, August 19, 2013, http://www.setimes.com/cocoon/setimes/xhtml/en_GB/features/setimes/articles/2013/08/19/reportage-01

② “Will Serbs boycott the Nov. 3 elections in Kosovo?” <http://www.b92.net/eng/>

③ 参见 Harry de Quetteville, “Kosovo’s many models”, November 6, 2007,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harrydequetteville/3693771/Kosovos_many_models/; “‘Two Germanys Model’ Suggested for Kosovo”,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two-germanys-model-suggested-for-kosovo>; “Serbian deputy PM mulls ‘Hong Kong model’ for Kosovo”, March 10, 2011, <http://www.euractiv.com/enlargement/serbian-deputy-pm-mulls-hong-kon-news-502936>; 王洪起:“美欧力促塞科对话 推动关系正常化”,《当代世界》,2012年第12期。

【 Abstract 】 In February 2008, Kosovo unilaterally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Serbia. Seemingly, “Kosovo’s final status issues” was resolved, however, in reality the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tense and complex. Since 2011, with the EU’s mediation, the two sides have held nineteen rounds of negotiations. The content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o political dialogues, which came to an end on 19th April, 2013 when the agreement of relationship normalization was reached in Brussels. However, the Kosovo issue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resolved ye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decided to launch an accession negotiation for Serbia in January 2014, with a prerequisite that the Brussels agreement i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nd approved by the EU. From responses of both sides after the signing of agreement in addition to its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not any signs of compromise between both sides in principle. It is still uncertain for future Serbia-Kosovo relationships. The Kosovo issue has a strong chain reaction and accordingly, to a great extent, affects the whole Balkan region. Besides, it is also worthwhile for academic analysis, providing a typical cas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law, crisis management and ethnology, which requires follow-up observations.

【 Key Words 】 Serbia-Kosovo Negotiation, Final Status of Kosovo, Brussels Agreement, Kosovo Issue, Balkan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феврале 2008г. Косово 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м порядке заявило 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ербии,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кажется, что «вопрос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Косово» получил разрешение, а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ербии и Косово стали более напряжёнными и сложными. С 2011г. пр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е ЕС Сербия и Косово провели 19 раундов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одержание которых от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ерешло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диалогу и окончилось подписанием 19 апреля 2013г. в Брюссел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ербией и Косово. Однако

вопрос Косово не получил полного разрешения. ЕС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с января 2014г. начать обсуждения о вхождении Сербии в Союз, однако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эт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С Брюссель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акции Сербии и Косово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соглашения видно, что ни Сербия, ни Косово не идут на компромисс п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будущее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ербией и Косово остаётс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ым. Вопрос Косово обладает сильной цепной реакцией,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нерв» Балк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данный вопрос обладает глубокой научной ценностью,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случае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ризисом и этнологии, требующим присталь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и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ербией и Косов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Косово, Брюссель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вопрос Косово, Балканы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5 期

(总第 183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ISSN 1009-721X



9 771009 721135

定价：20.00 元